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熊子云 翁廷真 译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



重庆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0705/67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与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

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本序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之一。他的思想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同现实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经由费边社会主义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又同共产党决裂,成为自由的批判理论家的过程。

柯尔施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一个小县城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学生时代就憧憬着社会主义生活,在思想上倾向于改革的社会主义立场。1912年他到伦敦后参加了费边社。围绕着唤起实践的意志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主线,柯尔施给德国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之一《行动》撰稿20多篇,宣传费边社的思想与主张。

1914年夏柯尔施应征入伍,在部队里他仍然信奉和平、反战的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使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19年1月复员后,柯尔施应邀参加了临时政府下属的、以卡尔·考茨基为主席的“工业社会化委员会”。这时他积极参与推动在此期间蓬勃开展的工人委员会(Der Arbeiterrat)运动,并同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此活动中,他把自己的主张,即工业社会化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上的委员会制度,称作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到1920年初他撰文就社会化问题同爱·海曼(Edward Heimann)进行论战,标志着他放弃不符合实际需要的费边社会主义和首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出现。

柯尔施在投身德国现实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

重要的活动家。他于1919年1月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于次年10月随该党并入德国共产党而成为它的成员。此后柯尔施发表一系列文章,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与策略主张。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的问题上,主张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把理论和实践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两个方面,而反对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上,柯尔施认为,在1843—1848年的第一个阶段上,马克思主义是直接建立在现实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在1848年到世纪之交的第二个阶段上,由于缺乏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那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衰落成为一种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理论批判,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在20世纪初开始的第三个阶段上,工会改良主义、革命工团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企图恢复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但他反对和批判了“灌输论”。这本书的发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激烈的批判和反批判,最终导致柯尔施激烈地反对列宁主义和被开除出共产党。1923年,柯尔施曾经在短命的图林根工人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该政府迅即被推翻后他还被捕监禁达4月之久。1924年4月担任德共中央委员,主持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主编该党的理论刊物《国际》。在同年5—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柯尔施及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卢卡奇及其《历史和阶级意识》,被视为“极左”思潮的主要代表遭到指名的严厉批判。

1925年,柯尔施辞去德共中委和《国际》主编的职务,以左翼反对派的身份从事反莫斯科的活动。次年初正式组成以他为首的“坚定的左派”集团(它于1928年彻底瓦解)。同年6月柯尔施

被正式开除党籍。此后，他就在党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对工人的理论教育工作。迨至1933年秋由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迫害而被迫流亡国外，在此期间他撰写许多论著明确批判考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概括地说，柯尔施在20年代基于自己的“实践的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经历了一个对列宁主义的接受、信仰与批判、离弃的过程。

1934年初柯尔施在流亡伦敦时应莫·金兹堡和亚·华库哈逊的约请，为《现代社会学家》丛书撰写评传性著作——《卡尔·马克思》。大体来说，他的这部后期的重要著作的撰写过程经历了3年时光。同年秋他制订了结构草案，“计划对马克思主义从其历史的发展上进行广泛的论述与批判”。1935年晚秋他重返丹麦布莱希特所在的流亡地写作本书，到1936年秋他举家迁往美国后不久，大抵结束了英文本的草稿，同年底德文本的草稿亦告完工。1938年《卡尔·马克思》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它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除了从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中产生出来之外，又怎样地也是从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产生出来的。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他在其中无多大争辩地阐明他自己认为现今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德文版的《卡尔·马克思》与它的英文本对比，在整体上分三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在章节上有较大的变动。特别是第三部分由英文本的8节变成德文版的15节。三大部分有机地结合，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第一部分阐明了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或者说他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而后面两部分则分别解说了马克思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

在这里首先似有必要提到《卡尔·马克思》的个别研究者对该书(即柯尔施此时的思想理论状况)总的估价，即他们以为柯

尔施自这时起，已经开始批判并准备放弃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分析，对它作出了高度评价。柯尔施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节的结尾明确指出：马克思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以适应变化了历史境况的方式继续发展了社会学说古典创始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这种新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柯尔施在第一部分最后一节更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的理论按其一般性质来看，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它反对资产阶级的原则，代表着这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新的观点与要求，从而它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它详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探讨在其当前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倾向和对其进行实际的彻底变革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它作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可见，柯尔施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质与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明确而肯定的。不过也应提到，他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分析批判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忽略它们在工人运动的深远影响。他清晰表示：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革命阶级觉悟的发展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样具有持久的意义。他特别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优秀文化成果的批判继承。他指出，黑格尔庞博的思想资料仅仅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来源之一。他们从各个方面吸取有益东西。他们从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李嘉图那里吸取了从经济学上论证阶级对立；从蒲鲁东那里接受了宣告现代无产阶级是唯一实际革命的阶级；从封建的与基督教的、对由18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经济制度进行指控的人那里，获取了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

的无情揭露和充满仇恨的、激动人心的抨击；从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里吸收了对现代生产方式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敏锐剖析；从黑格尔左派始初的同路人特别是费尔巴哈那里，获取了人道主义和行动哲学；从同时代的工人政党——法国改良主义派和英国宪章派那里，汲取了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从法国的国民公会、布朗基和布朗基分子那里，接受了革命专政的学说；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吸收了他们新确定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全部内容。②外他们还汲取了19世纪史前史研究的、由摩尔根集其大成的成果。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典范。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由前人或同时代人的思想成果机械拼凑而成的，而是它的创始人通过批判地吸取和创造性运用它们的合理思想，对资产阶级社会作科学剖析和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产物。

柯尔施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明确地划清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社会理论的界限，阐释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他说明，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标志；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它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服务于一定的实际倾向。他阐明，早期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家对这个社会弊端的指责，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歌颂。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共同的缺陷，就是他们观察与分析问题的非历史主义观点。柯尔施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时，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看作一切社会生活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完全拘泥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范畴，把以前的社会形态看作是现今完善发展社会形态的“预备阶段”。他们希望未来的变革仅仅是“进化的”发展，因而他们把社会革命

看作是病态般地打断“正常的”社会发展；他们进而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在其实际活动上视为对正常的社会进化的干扰，在其理论形式上称作是非科学的幻想。柯尔施把这种理论概括为虚假的发展观，并尖锐指明，取得对封建制度胜利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非历史的方法，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是保守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与之截然相反。柯尔施在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性质与作用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性质作用进行了全面阐述。柯尔施运用翔实的资料阐明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原则与实质，同孔德的社会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历史学派”的根本对立。他援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的事例与言论，说明了马克思对历史分析原则的实际运用，及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通病所作的中肯批评。

柯尔施阐明，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在社会科学中普遍的规律只存在于发展之中，即从过去的特殊状况过渡到特殊的当前社会状况，并且又从这种状况过渡到由于它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所以在社会科学中唯一真正的规律是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按照他的唯物主义原则，探讨了现今唯一现实的形式——资产阶级社会，而根本不是注重于对未来社会制度的空想描绘。柯尔施还饶有风趣地指出，马克思把这件事让给新老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创立者去做。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也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

柯尔施在本书第二部分中论述了马克思理论的首要内容，或者无宁说它坚实的理论基础，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这对于研究与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史来说，是深有意义的，是极其关键的。

柯尔施在这一部分之首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作为其理论依据他援用了马克思的如下精辟论断：“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中去寻求。”^①这种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首要的基础性作用的想法，可以说已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质量的理解。

由此出发，柯尔施在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以及对其创立唯物史观的伟大成就与意义作全面阐释后简洁指出：正如马克思的新科学按其理论形式来看首先是严格经验的社会研究，那末就其内容而言首先是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值得提及的是，对于这一点，不仅在当时而且为后来的大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忽视。的确，马克思主义从其理论的根本性质来说，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科学认识和对由此提出解决其社会矛盾的基本途径作科学论证。因而无须赘述，运用经济理论科学地剖析与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经济运动规律，乃是创立马克思主义必不可缺的理论依据。如若不进行经济学研究，那末就完全不可能超过与克服当时还甚为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也不可彻底批判与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和全面制定唯物史观原理，从而也根本谈不上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柯尔施继而阐明，马克思高度重视经济学研究，决不意味着简单地接受由它迄今的发展所流传下来的结论，而是与它处于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自然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为开端。哪怕是它的无足轻重的模仿者，只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要他的某种新的言论(正确的或错误的)有益于研究某个社会经济问题,都会引起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诸流派之一;它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

柯尔施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表明马克思在此研究初期对经济学的评论还具有哲学的形式。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里,表现出马克思要运用经济学范畴全面阐释一切经济关系所作的初步努力。50年代初马克思流寓伦敦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使这种研究迈入一个新阶段。它把完全贯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体系同批判地超越它的一切阶段与形式结合起来。集数十年经济学研究批判的成果之大成的,是马克思呕心沥血创作的《资本论》。柯尔施对它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它是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柯尔施还翔实地论述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继承过程。他说明,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本质和局限性,以及它必然的蜕变及其原因。他详细阐释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商品、劳动与价值、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以及经济危机等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完善。柯尔施特别指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从而同时也包括了《资本论》所含有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柯

尔施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和手段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直接目的，就在于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对抗与剥削的形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它们。柯尔施最后还阐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的客观依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机制中并没有设立对于提高剩余价值率来说的客观限制，它的确定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在社会一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另一极同时的贫困积累，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最终爆发为公开的革命。由于马克思借助于经济学理论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社会革命必然性的结论，因而便把他的社会学说同“历史学派”、“社会契约论”、“暴力论”以及“教条”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柯尔施在本书第三部分中论述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这实际上也是进一步阐发了第一部分作为马克思社会理论基本原则之一的历史主义观点。柯尔施在这里首先提到，马克思是无条件地运用他在理论上批判的、在实践上革命的社会研究新的唯物主义原则，去研究新老科学探讨过的经验领域的一切现象。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社会事物与关系，都与物质生产各时期的历史形式有着一定的联系，并可能随着这种形式的变化而在实际上被改变。对于作为一切人类活动前提的自然界，马克思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它理解为“社会的自然界”、“被历史改变了自然界”。因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就同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相对立。柯尔施援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表明后者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不言而喻，马克思制定唯物史观就如他全部学说的创立一样，是批判汲取与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思想资料。柯尔施详细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的演变过程，即通常所说的他们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17与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杰出代表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学说^①对他们的思想转变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即使是与马克思同时代^②的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没有为社会历史的研究开创良好的开端，因为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用恩格斯后期提出的名言来说，费尔巴哈“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③。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他们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资产阶级古典哲学积极的继续。

作为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集中而概括的表述，柯尔施援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发表的著名论断^④。柯尔施解析：在这段名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的静态联系与动态联系统一起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表面上静态的关系不过是动态联系的特殊状况；通过这种动态联系把社会生活的各部分领域在其发展中彼此联结起来。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观点，就把他的社会学说同各种资产阶级的有关理论区别开来。

马克思在这里把社会历史解释为物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即主要地描述为一个客观过程。柯尔施把这称作是客观表述方式；并指出这种表述方式没有提到行动中的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史发展主体。他还指明，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社会对抗时亦未把它明确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也还没有把发展的目标具体确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柯尔施还提到《共产党宣言》里的主观表述方式与之作对比，即“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这种主观表达方式说明与补充了客观表达方式的含义，它表明了从事实际活动而实现客观发展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在当前历史发展阶段其真实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

柯尔施开辟六个专节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所阐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本身含义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别人对它们的曲解，并由此说明了上述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两种表述方式的一致性。柯尔施在其论述中特别指出，构成社会革命新的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如下认识：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同物质生产力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自行发展的，而必须由人们去进行变革，即需要有深入到现存社会制度根底——物质生产的社会革命。柯尔施据此明确指出，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物质生产整个历史发展和奠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形态隐蔽的推动力，不过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里阐明为社会阶级的对立与斗争的同一事物的如实表达。

柯尔施还开辟专节说明，随着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成熟和革命经验的丰富，他的革命理论形成了具有显著差别的两个阶段。大体说来，是以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关键性的1850年为阶段的分界线。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阐明1850年以后工人阶级运动形式的变化，即从直接的革命行动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5页。

柯尔施

到建立在客观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只是间接地针对革命目标的运动。阐释，这时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表现为一种必然的、由不可避免的规律迫使社会经济发展，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①柯尔施把这称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革命行动模式”的改变，即由工人阶级主体的反叛到客观的“生产力的反叛”赋有特征的重点转移。这种认识首次表达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秋对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形势的评论中^②。柯尔施还特别指明，马克思的这种成熟的革命理论，既不是那种相信经济力量盲目起作用的机械论，即以为旧的社会形态的衰亡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过渡是没有人们参与而自行发生的；也不同于那种纯粹的宿命论，即相信在应有的等待之后最终会无危险地和以绝对的必然性实现经济的发展过程，去替代工人阶级实际的革命行动。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成熟的革命理论的特征，就在于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并且还特别强调：这种前提是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良好愿望、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去取代的。

本书第三部分最后一节，实质上是柯尔施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概括。柯尔施总括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宝库的几点贡献；点明了它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剖析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阐明了马克思的新科学作为严格经验的社会研究其首要内容是经济学。指出：构成马克思新科学最后基础的，既不是黑格尔主义也不是李嘉图学说，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即从17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和19世纪无产阶级新的革命运动中，获得了它决定性的推动力。概言之，现实的革命运动与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源泉。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反过来把他们用新的方法论所总结的现实经验即理论认识，又以直接参与当时斗争的形式，把它们交还给历史。柯尔施由此指明，这种实际地参与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概念和任何理论阐述所服从的伟目。柯尔施在这里实际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实践性：这种理论的产生依赖于实践，反过来又为实践服务。

但另一方面，柯尔施在本书中又一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它从首要的根本原则是历史地详述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这种科学作为对社会进程的严格的经验的探讨，是不需要哲学依据的。柯尔施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正为国外许多柯尔施研究者所指出的，柯尔施在这里，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显然当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哲学基础的，严格的经验研究意义上的社会科学”^①，这显然是不恰当的。

译者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北京

^① 参见戈特：《卡尔·柯尔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1979年伦敦版，第142页。

本版编者说明

一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编者首先要感谢博士赫达·柯尔施(Hedda Kohsch)夫人,她将自己保管的她丈夫的遗著提供给研究所,致使本书的这个版本得以问世。卡尔·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这部著作的英文本^①在德国多年来几乎不可获得并继续不为人知,现在就有德文本可供使用了。

纳粹独裁统治意味着在德国有关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讨论的中断,这种情况也在柯尔施的流亡生活中传记式表现出来。当编者在开始准备这个版本时,他认为有必要在他的导言里,通过把柯尔施的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同更多的著作相联系。来弥补这一中断。

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作出尝试,确定柯尔施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倾向的社会主义理论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可能进行探讨,这部著作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首先在西德占支配地位的、学究般的马克思诠释在思想体系上的多方面联系。最后为了防止作草率的合并或划分,我们还致力于阐述在柯尔施那里马克思诠释的发展,以此作为“知识分子传记”的片

^① 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伦敦1938年,照相重印,纽约1963年,在此期间由奥塞穆·诺穆拉(Osamu Nomura)主持出版了日译本(东京1967年)。

段与开端。

埃里希·格拉赫(Erich Gerlach)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①的新版导言中，做过上述第二件事。在那里对于理解有关马克思的著作也是重要的柯尔施诸发展阶段已做过那样的叙述，对此就没必要再作重复了。

但是两种其他可能性之一的实现，在当时就意味着有关马克思的著作处于一种同时已超越了的联系。柯尔施最终在这样的时刻已突破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所限定的框框，即在那时他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②。从而，那种尽管以不断变换的形式然而总归是假定的、在相当的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同马克思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便消失了。理论与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对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成为按唯物主义理解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

通过这种具体剖解，这部有关马克思的著作的分析在外表上有时接近于学究般的马克思诠释的表现形态。作为对这种学究般诠释预先划清的界限，柯尔施在30年前对当时的马克思传记性著作所作的批评在今天必定是适用的，那类著作对马克思

①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由埃里希·格拉赫编辑和作序，法兰克福—维也纳1966年。还可参见论科西生平和理论发展的文章，埃·格拉赫的《卡尔·柯尔施和马克思主义》，《新评论》第十八期(1963年)第16—21页，他的《卡尔·柯尔施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主义》第十九期(1964/65)第22—27页；保·马第克，《卡尔·柯尔施——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论争》第1卷第1期(1962年)，第11—21页(还载于法文《马克思学研究》(7)，I'ISGA的备忘录增刊第140期1963年，第159—180页)；他的《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评论》第53期(1964年)第86—97页；个别观点的论述，参见巴内的《在“卢森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反对派》，《当代史季刊》第9卷(1961年)第359—383页；彼·冯·厄岑，《11月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杜塞尔多夫1963年，特别参见第242页以下；沃尔夫迪特里希·拉施，《贝托特·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墨丘利》第17年卷(1963年)，第988—1003页。

② 卡·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66年)，第34页以下。

主义“如同对任何某种其他的历史-哲学资料一样按照一定学派准则去看待。”^①正如马克思的广泛思想领域也受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并从而被历史地指明了局限性,因而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决不是被任意地当作对象。正如柯尔施看到,理论可理解为对于只达到表面平静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后续阶段来说的科学准备;作为这种理论的历史出发点之一,马克思始终保持着不仅是历史的相对意义。

导言打算适当地阐明柯尔施在这种客观态度与义务之间对立关系中所特有的思想。因而它不能选用这两个被提出的处事方法之一。它必须确立对这两种方法的关系,从而必然大大超出一篇导言的范围。

或者像在这里最终发生的那样,它可以从编辑者的角度提示主要问题,而在其他问题上相信,正是柯尔施所特有的倾向使得他的著作在撰写30年之后,不可能只具有过时的兴趣。

因而编辑者认为,不只是从马克思主义史中提出某个文献,从而帮助左派自我理解他们自己的历史。在编辑者看来,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同时可以视为对不单作历史理解的、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贡献;它通过从讨论开展以来的成果也不能被看作是过时的。

二

1934年柯尔施受约请为莫里斯·金兹堡(Morris Ginsberg)和亚历山大·华库哈逊(Alexander Farquharson)出版的

^① 卡尔·柯尔施新近的马克思传记性文献(未公开发表的),原稿存于遗著,第4页。

《现代社会学家》丛书，撰写马克思卷^①。产生于同年秋天的结构草稿使人清楚地看到^②，首先计划对马克思主义从其历史的发展上进行广泛的论述与批判。在此过程中柯尔施可能按照《有生命力的和衰亡的马克思主义》，援用对传统作批判检验的方法；他流亡之前的最后数年在其柏林讲演活动中，就曾运用过这种方法^③。

当柯尔施于1935年晚秋重新着手写作这本书时，他决定采取别的论述方法，而这种论述方法最好是表述为通过筛选作出的阐释。他本人说明自己的意图：他打算“以大约40个彼此随便排列的§§，无多大争辩地阐明我认为现今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④。在这项写作完结之后他针对着批判的指摘说明，在论述中有时出现困难的原因正在于：他“在这本书中没有任何地方想要直接地和明确地反对马克思、他的理论和他的策略”^⑤。

下一年柯尔施主要是在布莱希特的丹麦流亡地斯科博施兰德度过的。这一年的工作过程借助于在柯尔施遗著中存有的通

① 此外在这套丛书中发表的有：R.R.马雷特，《泰勒》(Trlon)；F. 博肯琺，《帕累托》(Parcto)；F. S. 马文，《孔德(Comte)——社会学的奠基者》；J. A. 霍布森，《凡勃伦》(Veblen)；上述各书伦敦，1936年。

② 柯尔施1934年9月28日致J. 卢姆耐(参见本书附录I，第211—214页)；卢姆耐负责编辑这套丛书；这封信和所有下面摘引的书信，原稿或者复印件存在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柯尔施遗著中。

③ 参见他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1932年/33年冬季纲领《有生命力的和衰亡的马克思主义》，重刊于《选择》——文献与讨论杂志，第8年卷，第41册(1965年4月)，第92页。

④ 柯尔施1935年8月29日致P. 马第克的信。保尔·马第克(Paul Mattick)生于1904年。1918年为自由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后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员，自1926年起生活于美国。在那里他从1934年到1943年相继出版了《国际支部通讯》、《活的马克思主义》和《新短评》等杂志。这些杂志是柯尔施在美国流亡时期保持的、可能发表作品的少有园地之一。

⑤ 柯尔施1938年12月7日致P·马第克的信。

讯和一系列准备性著作，可以把它完整地重现出来。这个过程表现为逐步地排除如下明确批判的一切因素的过程：即这种批判一方面针对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地限于针对马克思本人；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是提供了偶尔作历史“展望”的资料。

对于这一点，读者只要把柯尔施的《卡尔·马克思》，同他以前的、在其中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占主导位置的著作相对比，就会立即清楚地看出来。一系列准备性提纲的复印^①也可能是适应于这个消除明确批判的过程，这些提纲总的说来是致力于探讨柯尔施当时视为中心的、马克思理论以其传统（经济的）形式具有的实际—社会效力的问题。在这里答案的表达方式清楚表明：柯尔施的观点是怎样从理论没有的或者尚未做到的和不能做到的东西，后退到有利于论述通过理论将会取得的东西。

另一组主题则不是由于这种已改变了思想方法，而是因为柯尔施在1936年所受到的时间和篇幅限制而放弃了。在1935年底的计划中^②，已清晰地显现出后来所采取的形式；在此计划中预定在第二部里紧接“经济学”问题之后，专门论述“上层建筑”的问题。直到手稿完成时柯尔施基本上从未放弃这个打算^③。大概只是期待出版第二卷^④，使得他接受朋友的建议暂时结束这部书的写作；即使“社会主义理论会陷入危难，但绝不会经

① 参见附录I—V，第二一四—二二九页。

② 在遗著中的计划II，还可参见1936年2月5日柯尔施致P. 马第克的信；西比莱·柯尔施（埃莎罗娜）是柯尔施最大的女儿。

③ 帕尔托斯1936年6月22日致柯尔施的信和后者1936年6月26日的复信。保尔·帕尔托斯原籍匈牙利，1964年于伦敦逝世，是柯尔施的学生与朋友，参加了柯尔施的柏林研究会。在政治上他接近于无政府主义，1933年流亡和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除了别的还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西班牙委员会工作。

④ 柯尔施1936年6月26日致帕尔托斯的信。

历你关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学说可能要讲述的东西”^①。由于柯尔施1936年12月流寓美国之后他的志趣明显转到别的课题，没有继续这项工作，因此仅存有1935年12月结束的文本；这个文本显示出柯尔施打算论述“意识形态学说”的意向^②。对于“国家理论”来说则缺乏可供对照的文本。

在如此拟定的框架里，1936年10月著述工作显然已进展这样的程度，以致柯尔施可以考虑结束手稿。至少他向帕托斯探询了有关该书和在巴黎把该书翻译为英文的技术可能性。后者肯定的答复^③导致柯尔施于10月底抵达巴黎。当他于同年12月中离开那里时，德文本的工作已经结束，并计划为友人将它复印^④。同英文译者至少进行了“长时间预备性协商”^⑤甚至还可能完成了未加工的译文稿^⑥。

然而这本书最初完稿的文本，只是间接地用作1938年英文版的基础。这就是说，当1937年柯尔施从出版社得到用作校对的清样时，他发现译文是如此不完善，以致由他所作的修改就相当于重新改编^⑦。此外，他还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这在把眼前的德文本同最后分开发表的英文本作初步对照时就可看到。然而后来柯尔施把自己的译文断定为“在语言上有缺陷的”^⑧，他向

① 帕托斯1936年6月22日致柯尔施的信。

② 参见附录VI第229—232页。

③ 帕托斯1936年10月8日致柯尔施的信。

④ 参见帕托斯1936年12月17日和21日致柯尔施的信。

⑤ 柯尔施1952年5月1日致B. 霍塞利茨的信。柯尔施同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教授B. F. 霍塞利茨，由于一个后来未实现的出版计划于1952年进行过书信往来。

⑥ 帕托斯后来回忆了“英译文手稿的样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巴黎丢失的草稿上，“存有大量柯尔施的和在一些地方我自己的注释”。帕托斯1962年5月23日致赫达·柯尔施的信。

⑦ 柯尔施1952年5月1日致B. 霍塞利茨的信，以及1962年5月15日出自赫·柯尔施手笔致S. 巴内的信。

⑧ 柯尔施1952年5月1日致B. 霍塞利茨的信。

布莱希特说明了该书的缺陷：“当我翻译它时，我试图只使用美国方言通行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说，我试图以一种无法复述文雅思想的方式，去复述马克思和黑格尔等等的文雅思想。”^①

将近10年之后，即于1947年秋，柯尔施再次更加认真地修订了该书德文本。关于其缘由他本人曾告诉帕托斯的“正如你所知，我在墨西哥旅行之前用一点时间拜访了布莱希特，在那里我们对他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美妙诗篇进一步作了加工。他对理念的热忱连同这一事实——卡蒂以令人诧异与激动的方式，即她用从急风暴雨中抢救的、我的关于马克思著作德文的（巴黎的）完整样本接待了我，促使我暂时作出有关德文版的计划；这个版本没有改动，因为在今天我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这本书了”^②。

对柯尔施在这里所讲的“没有改动”版本，那只能理解为无改变地保持1936年总的提纲。同手稿相比在细节上表明，他在文字上作了彻底的修改。除了大量修辞上的改正，还有部分地与该书英文本次序相适合的顺序上的变动^③。最后有些段落完全删去了^④。于是便产生了第二个（在美国的）德文稿本，布莱希特带着它的样稿抵达欧洲，以便在那里为此书找到出版者。

当布莱希特于次年4月把他在瑞士所作努力的失败告诉柯

① 柯尔施1942年11月13日致B. 布莱希特的信。

② 1948年6月4日致帕托斯的信。墨西哥旅行是发生在1947年9月初。卡蒂·霍内是帕托斯的前妻，她居住在那里。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的诗篇》参见H·邦格的《贝托特·布莱希特的宣言》，《感知与形式》，第15年卷（1963年）第184—203页和《选择》，第8年卷第41册，第45、54—57页刊载的书信。

③ 例如在第一部分把以前的第7和8节合并为论述“革命的理论”的一节，这类似于在英译本中所作的调整，即把以前的第9—11节调整为题为《革命的批判》的一节。

④ 例如巴黎稿本第一部分第4节，参见附录《异文参考资料》，第3节（6），第242页以下。

尔施时^①，后者的兴趣已明显地转到了别的计划，因而他回答说：“在此时期由于其他的、完全积极的原因我自己作出决定，现在我不想再公开发表我的《卡尔·马克思》一书了。因而请您心安地停止有关的商谈。”^②虽然在往后数年柯尔施还不时地在其手稿上添加了笔记和修改，但是他从未再度明显地返回到执行发表德文本的计划。

三

对于本版来说，两个德文原稿的主要稿本被用作正文的基础。

1. 巴黎稿本（在异文参考资料中标明为P）是总共有270页的打印字体原稿的副本，它产生于1936年晚秋^③。眼前的样本是保尔·帕托斯的赠送本，它是柯尔施于1947年在墨西哥从K. 霍内尔那里获得的。这个样本可以由帕托斯手笔所作的校正得到证实，柯尔施与帕托斯的通信谈论过这种校订^④。可以假定，这个样本应作为1936年计划中德文复印本的基础，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已提到的帕托斯的校订是改正明显的笔误，首先是在注释中的补充。在异文参考资料中重现异文的情况下，就不必考虑这些校正了。柯尔施本人于1947年秋所作的校订，以及同时他在底稿标题页上所作的编辑加工记录，是更加丰富的。一般地

① 布莱希特1984年4月致柯尔施的信。

② 柯尔施1948年5月12日致布莱希特的信。

③ 这个底稿的原件（在通信中被称作为“主要的稿本”），是由柯尔施带到美国去的（1936年12月17日帕托斯致柯尔施的信），它没有保留下来。另一个稿本给了编辑者莫里斯·金兹堡。（帕托斯1937年1月13日致柯尔施的信）。

④ 例如，P稿第三部分，第66页和帕托斯1936年12月21日致柯尔施的信。

说，首先就它们所涉及修辞上的改订而言，直接转变为第二个主要稿本。以其内容上的差异而论，它们在异文重刊中用P^c作为标记。

2. 美国稿本——在异文参考资料中标志为A

原稿A-1和1947年修改过的副本的复印件A-2各有打印字体稿235页。由贝特·布莱希特带到欧洲的稿本A-3，在布莱希特的档案中只发现第一部分的第七节和第三部分的第九节^①。

在所有的A稿本中都带有详细的校改。在校改的最初阶段上所有的稿本是一致的。这些校正显然是紧接在副本完成后进行的^②。可见这个校订阶段(在异文参考资料中标记为A-1/2^c)，可看作是柯尔施于1947年想要用以作为他著作的德文版的稿本。此外，在A-1稿中还有一系列内容上的修改与评注。按照柯尔施的笔记它们产生于1948—1950年。它在异文参考资料中标记为A-1^c。

可见，可以明确地区分为既在文体上又在内容上彼此相异的五个修改阶段^③。无区别地介绍所有这些差异是不可能的；如不更多地介绍有益的哲学资料，那末这种介绍就会大大地损害迄今未发表的文字的可读性。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遗著中的这个版本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迄今尚不知悉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而且还可能并应该使他们获得有关柯尔施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发展的启迪。

① 布莱希特卷宗BA977/64—78；这一小节(§§)包括了布莱希特后来补上的，柯尔施1948年5月12日给他的信。

② 至少是在布莱希特旅行之前，柯尔施在1948年5月12日的信中写到，他在这里得到“完全同样的稿本”。这涉及到A-2。

③ P—PC—A—A-1/2^c—A-1^c。

因而便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柯尔施本人为更广泛的读者范围所确定的两个结构之一^①，被用作行文的出发点。如若不考虑在其他结构中文体上更好的处理方法，这种文本状况应彻底地保留下来。在异文参考资料中我们只能局限于介绍内容上的变异；在其中任何不明显地带有文体性质的变异，都应看作内容上的变异^②。在英文本中的差异，只有当它们被柯尔施在编辑加工笔记中指出的，才予以考虑^③。

在此前提下后来的和在文体上经修饰的美国稿本A—1/2^c被选用作行文的基础。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未加特别说明而与这个文本有所不同：

明显的笔误被改正了。对引文作了核对，在引文中无关紧要的内容错误得到了更正。引文中凡不是由柯尔施本人所作的删除与增补，均清楚标明^④。最后在美国稿本上清楚指明它计划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00年之际公开发表的标题，全都被删除了^⑤，尽管它在这一年偶而有用；但原先的（对英文版也适用的）标题被保留下来。

在正文中通过带括号的数字指明这种差异。在一节里如若数字只一次出现，那末表明数字之前的词句有改动；如若数字被两次使用，它则标明改动的开头与结尾。在异文参考资料里

① P和A—1/2^c。

② 有关的例子（如乍看起来显得是“文体上”的变化，却带有“内容的”性质），可提到在第三部分里排除“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注解§2(1)—(4)，§3(2)，见本书第265页。

③ 当这本长时期几乎无法弄到的书几年来以新版出现时，这种考虑的方式就显得更为合理了。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纽约1963年。这些差异在异文参考资料中用E标明。

④ 在几乎全部出自柯尔施手笔的引文中的斜体字，无改变地（即未作注明地）保留下来。

⑤ 《马克思的一百年——对他的著作历史与批判的论述》。

有关的差异除了通过数字，还通过差异产生的修改阶段的标记来表明。假如在一页上面有许多差异，那它们就按时间顺序排列。在异文参考资料是原则上舍弃重现异文中存有的脚注；只有在重现柯尔施在美国稿本中删除的段落时，才离弃这一原则。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必须放弃介绍存在对脚注中的差异。在英译本的导言里柯尔施表明了他的意图：通过写作注释给读者“直接为每一引文的历史情况提供必要资料”^①。就这一点表明其目的在于从书目方面使注释规格统一而言，那末相应地要注意到，这仍然保存了柯尔施关于引文写作时间及其首次公开发表等的资料。如果在其他某个稿本中还看到补充的这类资料，那它们是后加的。由于被柯尔施接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的很大部分在现今仍难于看到，因而尽可能地补充指明迄今最完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版书^②。

最后，编辑者对F·诺文特内和F·希根多夫把柯尔施速记体的注释进行编写表示感谢。编者的同事F·蒂舍曼和H.P.哈斯蒂克通过建议和会意的批评对编者给予了支持。还要感谢乌苏拉·朗格考—阿莱克斯参与校对和编制人名索引。

阿姆斯特丹，1967年9月

格茨·朗格考

① 参见前引用书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以下，柏林1957年以后。编写为MEW。

目 录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徐崇温(1)	(1)
中译本序.....	(1)
本版编者说明.....	(1)
第一部分 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	(1)
第二节 历史的论述.....	(6)
第三节 历史的论述(续篇)(1).....	(14)
第四节 发展的理论I: 虚假的发展(1).....	(19)
第五节 发展的理论II: 现实的变化(1).....	(23)
第六节 革命的批判(1).....	(28)
第七节 革命的理论(1).....	(40)
第八节 革命的实践.....	(47)
第二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51)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56)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61)
第四节 哲学和科学的批判.....	(67)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阶段.....	(71)

第六节	论《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	(76)
第七节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83)
第八节	价值规律	(89)
第九节	价值和剩余价值	(92)
第十节	“社会契约论”	(99)
第十一节	结论、修正、展望	(103)
第三部分 历史		
第一节	自然界和历史	(111)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17)
第三节	特殊的运用	(122)
第四节	哲学的唯物主义	(127)
第五节	费尔巴哈	(132)
第六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I: 社会的领域	(138)
第七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II: 社会的发展	(142)
第八节	物质的生产力I: 概念	(147)
第九节	物质的生产力II: 进步的规律	(151)
第十节	社会的生产关系	(155)
第十一节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两个阶段(1)	(159)
第十二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I: 经济主义(1)	(162)
第十三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II: 所谓的相互作用	(166)
第十四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III: 校正	(173)
第十五节	结论	(178)
附录		
附录I		(184)
附录II		(188)
附录III		(194)
附录IV		(196)

附录V	(199)
附录VI	(202)
附录VII	(206)
异文参考资料	(213)

第一部分 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代社会科学处于怎样的关系？如若人们考虑到由孔德(Comte)创始的和被他首先命名的“社会学”，即作为在已建立的科学体系中的一个特别学科，那末在这里存在的只是陌生和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未注重这个名称，也未注重它所指的事物。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教程》在30年代出版之后，由于“对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得马克思获悉这部著作，这时他在谈到“实证主义”和“孔德主义”时说，对这件事他“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①。这种否定在理论与历史上是很有理由的。马克思的理论同由孔德创立的、由穆勒(Mill)和斯宾塞(Spencer)传播的19与20世纪的“社会学”，毫无共同之处。更正确地说，人们可以反过来把社会学理解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只有由此出发才可能把各种各

^① 参见马克思1866年7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6页；马克思1871年6月13日致爱·斯·比斯利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7页；关于赫伯特·斯宾塞，马克思1868年5月23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90页；还可参见讽刺地否定“孔德主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的调味单”，马克思对巴黎《实证论者评论》的《资本论》批评者的答复，载《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页。以及恩格斯1895年1月24日致斐迪南·滕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4页。

样的理论与实际倾向(它们在上个世纪在这门科学中获得它们的表现),尽管它们有各种其他差别,理解为统一的现象。正如对与圣西门决裂后的孔德一样,对于迄至今日的后来的社会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以另一种对社会主义始初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论争形式,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从而同其实践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同这些由现代历史发展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与孔德、斯宾塞及其后继者全部所谓“社会学”相比较,处于一种更自然和更直接的关系。

因而在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同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之间,从根本上来说不存在理论上的关系。资产者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作是理论与政治“非科学的”结合。反过来,社会主义者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称之为纯粹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的理论同17与18世纪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时期的社会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在此时期里虽然“社会学”(Soziologie)的名称尚未制定出来,但是“社会”(Gesellschaft)作为知识与行动特殊的与独立的领域已经被发现,并且它的完整的意义已经被认识。

按照马克思自己1859年的记述^①,他早在16年前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阐述他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他当时在作为1842/43年《莱茵报》主编的实践活动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他着手去研究“经济问题”,并且对“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有了不确定的了解。他同黑格尔的论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①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下面引文简略为《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11页。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人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对于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过渡到他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获得了决定性意义。由于马克思把他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深入的唯心主义批判，奠定在由他在黑格尔那里发现的、不可期待唯心主义哲学家作出的、关于市民社会性质切实确证的基础上^①，因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达到了接近于卓越地探讨人的社会本性；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反对过时的封建的经济与国家制度的斗争中，通过这种探讨首先提出了市民社会这个新概念作为革命的口号，并且在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中，剖析了犹如这种新的市民社会形态的骨架的物质基础^②。

黑格尔的那种切合实际的认识，使得他的法哲学中研究“市民社会”的那一部分，比起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显得卓尔不群。他不是独自地从当时极其落后的德国发展状况中获得这种认识，他是现成地从法国的与英国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里，接受了他的“市民社会”的名称与内容^③。正如马克思所说，站立在黑格尔后面的是具有对社会结构与运动新的认识的“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这种新的认识从这方面反映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5—404页。

② 例如参见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爱丁堡1767年，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伦敦1776年。

③ 参见G、W F.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0年，〔下面摘引称作法哲学，按照全集第8卷，柏林1833〕第三部分第2章，特别是第188节以下（需要的体系），第230节以下（警察）。

实际的历史发展；这种发展在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英国“产业革命”中，和自1789年至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达到了它的终结。

马克思在创立他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时，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这种（首先他借助于黑格尔著作而了解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出发点。特别是在方法论上他以充分的自觉性钻研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从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经过魁奈和斯密到李嘉图），把它当作在大量资产阶级研究者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他敏锐地反复强调，晚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被他称作是“庸俗的经济学”），在任何重要点上都没有超越李嘉图，并且在许多点上落后于李嘉图^①。面对像孔德的“实证主义”这样的现象立即同样敏锐地指出，这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综合在整体上与黑格尔“无比宏伟”的成就相比，是多么“可悲地”相形见绌^②。正是这种敏锐性再次表明了，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思想较早阶段的成就对于马克思理论始终保持的伟大意义；在他适应现今独立兴起的无产阶级新的成果（1）与目的而远远超过它们的结果的地方也是如此。就此而言由马克思理论所指引的工人阶级，不仅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③；它同样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社会研究的继承者。作为这样的继承者，它适应变化了的历史状况，发展了资产阶级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

马克思不再是从市民社会最初发展阶段和同封建中世纪

① 参见《剩余价值论》第3卷，斯图加特1910年，第571-576页。

② 1866年7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27页。

③ 参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结尾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3页。相类似的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中补充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是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的脚注。

社会(2)相对立的立场，去看待市民社会。使他感兴趣的不仅是它存在的规律。他把市民社会当作按其全部特征而言，是历史的从而也是历史上暂时的社会组织来看待。他研究它的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及在其中所包含的和导致使其产生革命变革的不断发展趋向。他双重地发现了这些趋向：客观上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主观上在正是从这种经济基础而不是从政治、法律、道德中产生的社会阶级新的对立之中。从而在以前本身是统一的并且只同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市民社会整体，现在分裂为两个彼此对立的“党派”，马克思把所谓的“文明社会”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即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产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行使经济的并从而也行使政治的和文化的统治。于是最后在社会认识扩展了的视野里，出现了“越是勤劳的阶级就越加贫困”，马克思的理论认识到，在当前社会中受剥削和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斗争，是为了废除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它作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发展的唯物主义科学，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社会的实际指导。

那种后来人为地使特别的专门学科封闭起来的作法(这个科学起源可追溯到孔德，它同样把早先时期在此领域进行过创造性劳动的最初的伟大思想家视为“先驱者”。)，只是逃避实际的并同时也理论的、当前历史时代的任务。马克思新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科学，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境况的方式继续发展了社会学说古典创始者的革命理论。马克思的这种新科学是我们时代真正的社会科学。

第二节 历史的论述(Spezifizierung)

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是对一切社会关系作历史论述的原则。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上去理解它的一切制度与关系。他批判了在其中抹煞这种特殊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一切范畴。从这种意义上他已在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中，反对在其他情况下被他称颂的李嘉图，即指责后者把特殊的资产阶级地租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带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①

一

历史论述原则的意义由这个例子特别清晰地表现出来。地产(Grundeigentum)在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历史时代，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质，占有完全不同的位置。原始公社土地所有制解体的不同形式，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不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②。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在中世纪与农业相联系的地产，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一样^③，构成中心的和支配其他的生产范畴(die Kategorie der Produktion)。在不同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方式取得胜利的过程

① 参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86页。

②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2页。

③ 载《新时代》第二一卷，第一期，第七一〇页以下。1903年重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注明日期1857年8月25日，下面引文略为《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3页以下。(1)。

中，资本是以不同的方式征服封建地产；地租之变成资本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农业之变为工业，也是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些不同方式对于如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甚至对于与之相对立的工人运动的形式和向无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都总是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在他的晚年还特别认真地研究了一方面是美国的，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地产和地租的历史。同样，在世纪转折之交列宁在他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著作中，特别分析了这种过渡的特殊历史形式^①。尽管如此，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列宁那里，对这些不同历史形式的全面研究，只是构成了阐述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地租的特殊性质的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全面的分析。在致力于研究真实的生产过程的第一和基本的部分里（第一卷），还根本没有出现“地租”这个范畴。在这里除了讨论土地（《土地》）对于劳动过程本身^②的一般的意义，仅讨论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反作用：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③，另一方面在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的国家如爱尔兰^④和在真正殖民地国家^⑤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按照整部著作的计划，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分析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历史形式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分

① 这部著作是在西伯利亚监禁中自1896年以来撰写的，1899年出版了俄文第1版，1907年第2版，德文载于《列宁全集》，第3卷，维也纳—柏林1929年。

② 参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五章第1节《劳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以下。

③ 出处同上，第23章第5节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第738页以下。

④ 出处同上，第23章第5节f《爱尔兰》，第764页以下。

⑤ 参见整个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和随后的一章《现代殖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845页。

配的特殊形式的一节里^①，才构成特定的研讨《地租》的地方。甚至这一节里也没有段落单独论述早先的历史形式。只有个别零散的注释着重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地产形式同其过去的历史形式的对比；并且在紧接着的一章（仔细看来这一章也只有一部分）致力于研究历史的“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②。马克思在他著作的这一章的开头说明，他只是研究“特殊的历史形式”，即研究封建地产和基于自己占有土地的小农农业，通过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而变为的特殊历史形式。“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范围。”^③

二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对资本本身各种历史形式进行探讨的方式，提供了运用这种历史论述原则的另一个例子。正如在当前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代里的工业资本那样，在以往时期并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最早阶段里“商人资本”及其孪生兄弟“生息资本”（“高利贷资本”），以其不同的、由马克思精确阐明的形式——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即真正的借贷资本，具有独立的并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具有占统治的地位。在现今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仍然一样，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旁还有商人和银行家，虽然他们不参与真正的生产，然而对于资本主义业务的繁荣（2）从整体上来说多少要发挥重要的职能（2）；因而，在由资本所有者和土地占有者整

①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3—917页。

② 出处同上，第881—917页。

③ 出处同上，第693页。

个阶级所支配“总剩余价值”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商人利润”和“利息”分给他们。这完全象各个生产时期总利润的另一部分，作为“地租”分给同样不参加生产本身的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甚至以其新的表现形式，即作为现代集中的、从私人的与国有化的银行资本同托拉斯化与国有化的工业资本相结合中产生的所谓“金融资本”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在垄断资本主义当前发展阶段上在资本主义经济整体中，占有重要的、即使不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简直是决定性的地位(3)①。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这一历史事实还在理论的分析中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②但是，不仅“资本是怎样生产”而且“资本是怎样被生产”的秘密，或者用更为朴直的语词来表达即“赚钱的秘密”（“Geheimnis der Plusmacher-ei”）③，决不能通过如下方式来予以揭露（从而也不能揭示铲除与这种理论上的秘密相联系的、剥削与雇佣奴隶制的实际事实的道路）：即通过任意延伸地分析资本的“补充”形式在流通领域里所实现的职能，以及分析鉴于参与这个领域活动的资本家在其中的“业绩”而赋予他们的收入。马克思说：“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

① 参见希法亭，《金融资本》，维也纳1910年，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17页以下。

②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

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这就是说，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真正的生产过程时，卡尔·柯尔施〕根本不提资本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①即使他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里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返回过来探讨资本的这种“洪水期前的形态”时，他所探讨的主要题目不是它们的历史发展，而是资本的那些早先形态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通过现代产业资本的出现而引起变化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②在这里正如在论述地租时一样，贯串于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历史分析，和有关两篇的末尾两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的考察》与《生息资本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态》，^③其目的则在于阐明这样的巨大历史过程：通过这一历时几百和几千年的过程交易和借助货币的交易，从它们以前占支配的地位越来越下降，直到它们现今的地位，即作为纯粹的、“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④

三

总的说来只存在一种观点，即在这种观点下在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中，既可把地租也可把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当作主要课题来研讨。按照最初的、后来经马克思不断缩减了的并且最后在此缩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86页。

② 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1—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资本论》，第3卷第16—19章、第21—35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③ 《资本论》第3卷第20和36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④ 参见《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67页。

范围内不再完全执行的全面计划，在《资本论》里在论述生产、流通、分配的狭义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阶级问题等等之后，还应当探讨更高序列的经济问题，例如“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和“生产的国际关系”^①。只是在后来的研究中马克思的分析才达到这一点；在那里已进展到分析无论是地产对资本的，还是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不同的历史地位；前者是当作农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是作为纯粹的农业国与主要为工业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后者是当作纯粹商业城市同工业城市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范围内是作为商业国家同工业国家之间关系。

四

正像对待地产和资本的不同形式一样，马克思对一切其他经济学范畴都是按照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联系去理解。马克思并不把经济学的概念理解为不受时代限制而普遍有效的范畴。他的主题不是货币、商品交换、雇佣劳动的历史发展，或者协作与分工的历史发展等等；所有这些在以前的历史时代已经以不同的特殊形式和以对当时生产方式的整体不同的特殊关系而出现。他只是在对于他的主要课题有必要的情况下，才讨论这些不同的历史形式；即分析这些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所采取的特殊形式^②。

^① 参见《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9页，和《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在那里马克思清楚说明：“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城乡的分离；然而对这种分离，“我们不在这里多谈”。关于在《资本论》计划中后来的这种变化，在我出版的《资本论》导言里有更详细的探讨。

^② 参见《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3页以下。

在这个方面在马克思同其先驱者们之间存在的对立，经过对比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最后的代表者大卫·李嘉图，让他的著作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而马克思则把他的经济学研究主题明确地表述为“现代资产阶级生产”^①。马克思在很长时间里想使他的主要理论著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标题出版。由于上述理由他最后简练而明确地冠以《资本论》的标题^②。如果说李嘉图是用一般的概念“价值”开始他的体系，那末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的批判研究，是以分析外部的对象，即显而易见的东西“商品”为发端。李嘉图使传统的经济学价值概念摆脱在他的先驱者们那里所固有的、最后的、尘世的污点；而对马克思来说孤立的商品，即以不同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的商品，成为过于抽象的对象；他特别地把它确定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的因素，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的元素^③。只是在这种特殊的规定性上“商品”才构成他的研究对象；只有作为这样的商品的特性，随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经济学体系的其他概念，才使他产生兴趣。我们在后面即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详细地了解到，这种在马克思的同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概念之间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区别所产生的深刻结论。在这里我们只录下一个实际上最重要的结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这一概念，从它在当前普遍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所表现出

① 参见《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② 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个和唯一出版的1859年分册，和作为它的续篇出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后者以改变了形式包括了1859年已发表的部分。

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页。

④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

来的特殊规定性来看，具有如此奇特本性的商品伊始就包括了在雇佣劳动者的肉和血、手与脑中所体现的劳动力商品^①。这些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②不仅如此，这种特殊商品的出售者在商定他们商品的销售条件时始终不采取诓骗办法，因为他们“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③

一些心怀善意的即肤浅的马克思诠释者，把最一般的、同作为其外部表现形态有区别^④的概念——“价值”，当作所谓带有烦琐哲学的、概念唯实论(Begriffsrealismus)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谁知道还带什么味道的、对于“唯物主义”科学来说不受欢迎的概念，他们希图最好用魔术般的手法完全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消除掉。在这种最一般的“价值”概念里，完全像在商品、劳动力商品、货币、资本等等那里一样，总是涉及到某些在历史的社会现实(它构成一切经济研究的材料)中实际地、明确地和经验地可证实的东西^⑤；这些东西同其他的规定性是具体地相联系。“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3页。

② 出处同上，第473页。

③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51页。

④ 马克思在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是这样说的：“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页。

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①。

第三节 历史的论述(续篇)(1)

(2) 历史论述的原则除了对于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来说的理论意义,还具有(3)其他重要的(3)意义。它在辩护的、即维护现存制度的派别同社会批判的、在其倾向上是革命的派别之间政治论争中,加强了攻击者的地位。这次我们借助于一系列主要不是取自经济而是取自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另外的例子,说明了(4)这种对马克思新的理论原则论战性的运用,为此并利用了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②、“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备”的回答。(2)

所有这些回答的基本形式在于:对于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所有制、个性、自由、教育、法律、家庭、祖国等等的指责所作出的回答,是在这一争论中对于双方来说,根本不是涉及一切社会生活的共同基础,而只是涉及在当今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生活特别的历史形式。在争论中谈到了资产阶级关系的这种特别历史性质所表现出来经济的、阶级的和其他特别的规定性。这种历史论述原则的不同形式首先被运用于论争之中,并总是得出结论:所谓一切社会秩序共同的和自然必要的基础的维护者,被降低为对符合他们特别需要的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特别关系充当偏私的卫护者角色。

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第一个指责在于: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对此作了这样的反驳:

^① 《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8页,还可参见469页以下。

“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哪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然后继续作了进一步阐述：那种“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按照资产阶级理论代言人的意识形态观念，它“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而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共产主义者并不需要去消灭它，“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在现今社会里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它对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彼此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具有特别不同的意义。“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同样，雇佣劳动即无产者的劳动并不给他们创造个人财产。它创造了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社会力量。因而在“消灭所有制”时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资产阶级提出的第二个指责，是共产主义者想要消灭个性和自由。共产主义者给予的驳斥是：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所涉及的只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性与自由。”

“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可是，买卖一旦消灭，自由的买卖也就会随之消灭。我们的资产者高谈自由买卖的论调，也如同他们其他所有一切高谈自由的大话一样，本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对于资产者阶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对于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存在。正如资产者把“消灭私有制”称作是“消灭所有制”一样，当劳动不能再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的时候起，简单地说，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时，他们就宣称：“个性就被消灭了”。可见他们供认，他们“所认为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即不外是资产阶级的所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该被消灭”。

同样，资产阶级把一般的劳动和活动，同雇佣劳动即无财产的雇佣劳动者为不劳动的资本占有者而进行强制性劳动的、特别的资产阶级形式混为一谈。当他们宣称“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起”的恐惧时，《宣言》反驳道：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当资产阶级紧接着抱怨共产主义造成“教育”灭亡的危险时，对这种责难马克思特别予以驳斥：

“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为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正如在个性、自由和教育方面的情况一样，在共产主义威胁国家与法的方面也不涉及在当前时代由国家与法律不得不履行的、在不断发展中越来越有缺陷的、社会统一联系的一般职能；而仅仅涉及现今国家政权特殊的资产阶级形式。这种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至于说现代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那它“不过是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图表示愤慨。”对这种责难《宣言》给予的特别回驳是：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共产主义者承认，他们“要废止父母对子女的剥削”。

他们对所谓共产主义者想要实行公妻制这种不朽的愚蠢之谈的答复是，倒不说现今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①。

^① 参见休谟(Hume)对伏尔泰(Voltaire)谈到的一位土耳其公使的意见：“基督教徒们”用别人的钱在他们的朋友家里保持了他们的后宫。(参见《论……》格林和格罗斯版本，伦敦1875年，第1卷第234页)以及在龚古尔兄弟那里关于当时婚姻制度的类似描述。

相反地不言而喻，“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消灭。”

对于民族主义分子关于共产主义者想要“废除祖国”的指责，《宣言》的回答是在当今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①与此相反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是“真正的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②。

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对所谓民族利益的态度，取决于它在民族范围内正开始的和在国际范围内将结束的革命运动各时期特别的发展阶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对于“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提出的种种责难”，《宣言》借助于概括指出一切人们思想的特别历史性质作了同样的回答：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① 人民的大多数“没有祖国”，因为没有财产就没有祖国，没有祖国一切就反对它，在它方面必然武装起来反对一切。这个原理早已由资产阶级革命家布里索(Brissot)在他的《关于共和制度同各省行政体制之差别的考察》中已经讲明。后来由蒲鲁东重复的论断，财产就是盗窃也是首先由他作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口号提出来的。(5)

② 参见恩格斯：《马尔克》；它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的附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3页。

.....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赞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修正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观念等等，但是却指责共产主义：它要消除一切社会制度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它消除宗教和道德并创立新的替代之。那末共产主义则回答：采取这种普遍形式的传统观念，总是包含着特别的历史特征。它们不再与在社会发展一定时代的阶级对立所采取的特定形式相联系。然而它们却同经历所有这些时代以各种形式持续的阶级对立的事实联系在一起。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

第四节 发展的理论I：虚假的发展(1)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从事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它把这种社会关系或多或少无所顾忌地看作一切社会生活的不可更

改的自然规律。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在表面上谈论其他的社会形式时，他们的实际对象仍然总是资产阶级社会特别的历史形式；这个社会从经验上可感知的特征他们可以在其他社会形式中重新发现。当他们一般地讲到“社会”时，这种只稍加改变的一般社会，在面貌上显现出来的只是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通常特征。这种情况在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伟大奠基人那里和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是以质朴的形式发生的：“市民社会”这一术语作为无时间限制的概念运用于全部社会^①。

同样，当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谈论历史的发展时，一般地说他们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的魔力范围。他们把以前的社会形式看作是现今或多或少完善发展形式的、不独立的“预备阶段”。他们把从当前社会制度推引出来的概念，无条件地运用于历史上以前出现的社会形式。他们直到19世纪把用现今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国家、家庭等范畴根本不可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历史(Urgeschichte)，称作是纯粹的“史前史”(“Vorgeschichte”)。(2) 尽管有各种“世界史”(“Universalgeschichte”)的言论(这对于这个时代不可动摇的资产阶级性来说，只意味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却只是零散地存在着对那种实际普遍观点的猜想，即这种观点把完全非资本主义的、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在空间与时间上毫无关联地相分离的社会制度，当作有充分价值的组成部分连同前资本主义各个时代一起包括在人类历史之中。在法国革命之前和之中由著名的世界旅行家C·F·沃尔内(Volney)^②所撰写的报道，包

^① 参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1页。

^② 参见《叙利亚和埃及游记(1783—85)》，巴黎1787年和《废墟或各大帝国革命概论》，巴黎1791年。

括了在这种倾向上的一个突进。并且早在几十年前，一位旅行路程较短但在精神与视野上并不逊色的学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2)：“在我们可能意识与思考之前大概经历了多少时代！腓尼基时代？或者是埃及时代？中国时代？阿拉伯时代？埃塞俄比亚时代？或者所有这些时代都不是！以致我们同我们的摩西一起站立在合适的位置上！”^①

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朝前分析社会发展的当前趋向时，也像它在向后分析时一样依然拘泥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它希望面临的未来变革仅仅是“进化的”发展，而不是设想为同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进行彻底决裂。它把社会革命看作是病态般地打断“正常的”社会发展，并且期望在经历革命“周期”的完整过程之后，例如通过革命前的政治制度的复辟，使革命前的社会制度在其基础上无改变地重建起来。它把一切超出上述设想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倾向，在其实际活动上视为对正常的社会进步的干扰，在其理论形式上称作是非科学的幻想。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同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传统观念，在各方面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然而这种对立在性质上并不是那么简单，以致可以把它归结为圣经般的公式，你们的言论是：是，是——否，否。从主要之点开始来看，如果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学说，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论则必然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那末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本不是描绘未来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把这件事让给老的和新

^① 参见J·G·赫德尔，《我的旅行日记》，1769年，《赫德尔全集》，编辑者海因里希·丁策尔，第24卷，柏林〔1879年〕，第405页。

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创立者去做。他本人按照他的唯物主义原则，探讨了现今的和在这里唯一现实的形式：资产阶级社会。他严格地真实于经验地去理解这种现存的社会制度，他甚至极大地超过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总是喜爱从他们所揭示的事实，采取某种方式作出一般性结论），并且无宁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处事方法。然而在其他方面他通过严格地坚持理论的科学形式，越来越多地同他们区别开来。

同样，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社会”的历史形式，同当前“资产阶级社会”联系起来，概括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系列，虽然他不像资产阶级理论家那样，以“资产阶级社会”当前已达到的形式结束人类社会的历史，但是确实以它结束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①。他在原则上也不反对把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中得出的概念，运用于以往历史时代的状况。他甚至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在作为“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畴中，同时包含着理解社会经济形态以前时代的钥匙^②。他至少在他的初期赞同这种“真实思想”，即它的依据是“18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③。18世纪的革命思想在19世纪史前史研究最初的伟大发现者时代，还一度经历了正式的文艺复兴运动；资产阶级的研究后来无替代地放弃了这种革命思想。而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正如我们将看到，以批判地澄清问题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并获得了新的卓有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③ 参见《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页；“所有这些奇谈怪论都是以这样一种真实思想为根据的，即原始状况只是一幅描绘人类真正状态的纯朴的尼德兰图画。”

成效的运用。最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中，同样不是被简单地勾销，而是以一定方式进行了修改；正如从历史的和史前的过去随着一切在其中出现的革命，并且正是借助所有这些革命，一个进步的发展导致了当前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同样，未来的、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3)，同时是以一定方式(包括同资产阶级社会原则相决裂)继续发展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形式。(3)

第五节 发展的理论II：现实的变化(1)

(2)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在(2)对那种“所谓的历史发展”虚假性质的批判认识的基础上，即这种发展是“……建立这样的基础上；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对过去的形式总是作片面的理解。”^①像卡尔·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完全陷入了那种质朴虚假的达尔文发展的形而上学^②，并且正因为如此像若尔日·索列尔这样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拒绝在科学的社会学里运用发展的原则^③。正是在马克思表面上认可这种质朴虚假的达尔文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地方，(3)实际上他把它的思想结构完全颠倒过来，从而扬弃了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3)当包括斯宾塞(Spencer)在内的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理论家，设想从较低级动物(和社会形态)的较简单的构造可以解释较高级动物

殺

① 《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② 参见我的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卡尔·考茨基的论争》，莱比锡1929年第32页以下。

③ 参见若·索列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巴黎1911年以及他的《发展的幻想》巴黎1921年，第239—244页。

(和社会形态)较复杂的构造,马克思用似非而是的下述论断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这种质朴发展的形而上学的全部魔力便被这种批判的意识打破了。“发展”由一种先验有效的公理变成了各自可由经验确证的研究原则。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分析古代社会的钥匙,那末决不可由此得出结论,像商品、货币、国家、法这样的范畴对于古代社会及其生产方式来说,必定具有它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奠立于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同样的意义。(4)随着先验的发展公理被破除,便为经验的研究开辟了自由的场所。马克思清楚说明,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效用对于一切其他社会形态来说“是应打折扣来看待的”。(4)资产阶级社会能够以继续发展的方式包括以往社会形态的关系。但是它只能退化地,萎缩地、讽刺般地包括它们(正如在俄国的公社里以讽刺的形式包括了原始时代的公有制)。②它同时在自身中已包含了现今社会形态继续发展的趋向,但是这完全不是预先确定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发展概念从两个方面都是封闭的,并且在过去与未来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基本上只是自身的重现。马克思新的、批判的和唯物主义的发展概念在两个方面都是开放的。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以往历史时代:亚西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社会,尤其是在一切成文史之前的原始社会,不只是当作“预备阶段”。从其整体上来看,它们是独立的、从它们自身的范畴^③可以把握的历史形态。同

① 《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② 《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页。

③ 自然不是从它们的思想体系。对此可首先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脚注33。在这部著作的第3卷还精确地讨论了这一点。

样他在对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下定义时，不仅把它释义为资产阶级社会继续发展的形式，而且还解释为用资产阶级的范畴基本上不能再理解新的社会类型。他在批驳空想社会主义时不像某些人那样，设想一种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教条主义的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在于：它在试图描绘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时，只是不自觉地绘制当前现实社会无阴暗面的图样；而在使其具体化和付诸实现时不过是重新把这种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再造出来^①。他本人在他关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唯物主义理论中，已考虑到超过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入的过渡阶段直至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继续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正如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产阶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情况一样，在它的经济、政治、法权、精神、道德的结构上还多方面地由资产阶级的原则来决定。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它已在自身基础上得到发展，它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已相距如此遥远，这恰如朝后看一样，在那原始时代的过去，是无阶级的和无国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视野，并实现了它最初的、由“空想的”先驱者在19世纪之初以抽象形式宣布的口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

马克思还对黑格尔哲学辩证法（而在其他方面被他视为合乎发展地对社会作论述的完满(6)形式)提出指责：它以在黑格尔那里出现的“神秘形式”上成为“德国的时髦东西”，“似乎使现存事情显得光彩”。(7)相反，它在马克思社会研究新的“合理

^① 参见马克思，《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

形态上”，(7)“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

实际上在作更详细的理论分析之前，就可认识到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黑格尔是现存制度和在当时普鲁士国家狭小范围内温和进步的颂扬者② 他把他的辩证原则的有效性明确地限于过去的社会发展，并把未来继续的发展以有意识的非理性方式交给“田老鼠在内部继续挖掘”③。按照所谓“囊括的假说”(Einschachtelungs-Hypothese)，一切未来的形式实际上竟然已包括在以往的形式之中。黑格尔在对这种假说的全部批判中，同时强调了“这一假说的正确东西”；依照他的意见这种正确的东西就在于社会的发展在其过程中“仍停留于自身之中，……〔通过这种发展〕从内容上来看没有产生任何新东西，而只是引起了形式的改变。”因而发展似乎“只应看作是一种游戏，通过它将产生的其他东西，实际上不是其他东西。”④ 不言而喻，从这种立场出发(它以其在黑格尔那里鲜明的表述使人感到几乎就像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运

①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参见黑格尔于1818年10月22日在柏林发表讲演时对听众的致辞，《全集》，第6卷，柏林1840年，第XXXV页以下。

③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结尾语(1817—1830)，《全集》第15卷，柏林1836年，第684页以下。

④ 参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下面引用时称作《全书》〕，根据《全集》，第6卷，柏林1840年〕第161页。

用的发展原则所作的不自愿的批评), 对于要彻底改变与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自觉的人类-社会的行动来说, 不留有任何活动余地。黑格尔的某些学生后来实际上想把他的辩证方法用作彻底的革命变革的手段。与此相反, 黑格尔把他的哲学的实际任务, 更确切地看作“重新恢复”“任何无偏颇的意识”所由出发的信念: “凡是合理的东西, 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 都是合理的。”并从而在“作为自我意识的精神的理性”同“作为现存的实际的理性”之间, 实现了最终的“调和”^①。与之相反, 马克思和恩格斯突出了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形式上已包含的批判的与革命的原则, 并且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以一定的形式, 运用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关系和无产阶级的斗争。

(5) 由马克思的批判科学打破资产阶级发展的形而上学而达到的最重要结果, 就在于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现实性。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状况, 看作是正在变化的, 更精确地说由人们的行动改变了状况。从而他同时把一切, 也把最普遍的社会科学范畴理解为可变的和应当改变的范畴。他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的全部范畴。他们以某种方式把当前的社会形态从事物恒久的长河中抽出来: 他们或者是把现今的资产阶级状况当作“自然的”, 即永远存在的状况来看待, 他们或者相反地在过去的社会制度同现今的资产阶级制度之间, 划下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们仅仅承认对于迄今历史来说的实际变化, 并且以目前已达到的资产阶级制度, 结束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资产阶级社会在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普遍的本性, 即这种本性可能通过某种非历史的称号而成为完全合理的。它只是历史的运动在当前时代达到的、对于这个特定时代

^① 参见黑格尔, 《法哲学序言》, 1820年〔出处同上页④第17页〕。

暂时有效的、然后将由其他社会取代的阶段。它同时还只是导致社会革命的社会阶级斗争一个早先阶段的当前结果，和一个新阶段的出发点。(5)

第六节 革命的批判(1)

对作为一定历史发展时代特别关系的现存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关系进行论述，包含了科学地批判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和在实际上对它实行彻底变革的基础。任何不是从这种基础出发的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上是教条的，和在实际上是想空的。反过来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后来发展中出现的、朝向历史的自我批判的萌芽，只有由新的、通过资产阶级本身造就的社会阶级才能完全展开和无所顾忌地推行。

(一)

倘若我们姑且不论如下稀有的情况，即在那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某个孤独的思想家，预先就对在实际中尚未实行的资产阶级原则进行过批判(例如在实际的历史上在以往每个伟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出现了作为潜流的、现代无产阶级多少已发展的先驱者这一阶级的独立活动)，那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的理解和与此相联的自我批判，只是在资产阶级原则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取得最终胜利和在19世纪初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完全建立之后才开始的。

· 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状况(或者说，他带有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通常幻想把全部社会状况)，描绘为反对一切人的世界战争。它首先是

通过国家的铁血专政，即通过它才获得有效的和最终的满足，而后来的“自由竞争”的颂扬者用被误解了达尔文的公式（它本身是从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无理由地搬用于自然界而产生的），可笑地为这种观念制造根据。这些决不是批判，而是歌颂，在18世纪孟德维尔(Mandeville)在他奇特的方程式《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中，描述了符合十分机巧的天意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这是对社会的颂扬。在这个世纪末之前不久，伊曼努尔·康德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在于“不合群的社交性的对抗”(Antagonismus der ungeselligen Geselligkeit)，通过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常地迫使”人类迈出“由原始状况走向文明的真正的第一步”，和“赞同结成社会”；这同样是颂扬。“装饰着人类的一切文明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不合群性的产物，它通过自身而必须使自己遵守纪律，并通过强制的手段而使自然的萌芽得以完全地发展。”^①

至于说资产阶级的经济竞争同达尔文的“生存斗争”之间关系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达尔文所作的声明：“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对于整个动物界和整个植物界的应用。”^②反过来说更加确切：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通过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竞争而实现的劳动分工的特殊历史形式，同在共产主义社会自觉地调整分工相比较，可以被称为社会进行自我保持的动物般的不自觉形式。黑格尔曾经把资产阶级社会称作是“精神的动物界”^③。马克思

①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1651年，孟德维尔《蜜蜂寓言——私人的罪过，公众的利益》，1706年，康德，《世界主义意图中的世界史观念》，1784年。

② 参见达尔文，《物种起源》(2)伦敦1860年，第五页：“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对于整个动物界和整个植物界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28页。

③ 参见G. W. 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面摘引称作《现象学》，按照《全集》，第2卷，柏林1832年]，《精神的动物界和谎言、或者事物本身》，第295—314页。

在《资本论》同样说明：“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①似乎最好是摈弃这些从来没有完全切合的类似事物。达尔文把资产阶级经济竞争作为“生存斗争”的绝对规律搬用于自然界，和克鲁泡特金宣称共产主义社会相对立的原则是全面有效的“在动物界和人类中相互帮助的规律”，但无论如何它们同一个曾经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企图把由他发现的、关于当今社会“自然平衡”特殊的进化原则（它在此社会中并不有效），运用于（它在其中同样无效的）整个动物与植物界^②，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在这个时代一切有关社会的重要论述（包括卢梭的学说、资产阶级的鲁滨逊小说和在当时产生的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科学）所固有的基本缺点，就在于非历史的性质，即它们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关系、它的生产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法律，看作是最終达到的、自此在其特征上不可改变的、有无限完善能力的、自然的与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形式。马克思在他反对蒲鲁东的《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中，抨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此种方法；他以尖锐的论断击中了这种倾向的要害：“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③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采用这种确实的极端方法，把所有从前

①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4—395页。

② 有关整个问题参见恩格斯1865年3月29日致F. A. 朗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8页。马克思1870年6月27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71页。以及我的《同考茨基的论争》第40页以下。

③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

的社会形态看作他们自己最终建立的和文明化社会的“野蛮的”预备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他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同封建的社会形态进行斗争，那末这种方法就是必不可免的。只要它自身还带有革命的火花，那末在尚未建成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它实际上是进步的，从而在理论上是合情入理的。这就像那些质朴的形式，即运用这些形式在农民战争和英国革命中把在圣经里描绘的“人类史前史”，和在法国革命中把自然状况同按封建制伪造的中世纪社会制度相对立，在理论中错误地但在政治上正确地表述为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口号。“当亚当垦殖和夏娃纺织时，哪里会有贵族呢？”

但是在下述另一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非历史的方法，在实际上是反动的，和在科学上是守旧的；即在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原则早就最终地取得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时获胜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由对一种过时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进攻者，猝然地变成了反对继续推进发展倾向的现存制度的卫护者。(2)在这里可以听听例如资产阶级“观念学”的学术奠基人德斯杜德·德·特拉西在他的于法国大革命胜利结束后出版的著作中所作的赋有特征的评论，按此评论在旧的，即在现今已开始的“法兰西时代”以前的一切时代，“就赋予其帝国的这种高级文明状况和确保真正警察化的民族存在的这种牢固组织来说，社会艺术从来就不是那么完美的”^①，(2)或者看看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科学纲领；他们明确地提出了把世界史当作资产阶级的历史来撰写的任务。

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实际进步不再存在于资产阶级原则

^① 德斯杜德·德·特拉西，《观念学原理》，(2)巴黎1817—1818年，第2卷，第5—6页。

肯定的继续发展之中，而是存在于对它的批判之中。(3)但是，早在这种批判作为社会主义的批判从外部对资产阶级的观念开展之前，它就已在惊人广泛的范围里以极其明确与独创的形式，由两个最后的伟大代表预先进行了；这就是国民经济学现今临近终结的古典时期的代表(李嘉图)和它好学的门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黑格尔)。(3)

(二)

黑格尔体系作为古典德国哲学的最后体系，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理论所有以前阶段的概括和扼要重述。(4)类似于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李嘉图最后古典体系，它在自身中已包含着对在那种理论中显露出来的矛盾的尖锐明确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中一切危险的紧张关系，已被孟德维尔、弗格森、亚当·斯密、康德等等或多或少清楚地看到；但是在他们那里它们总是在“较高的”或“较深刻的”统一中重又被克服掉。所有那些紧张关系在这里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4)黑格尔也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由于在其中已广泛暴露的和在实际上没有被重新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如现今在经济学上由李嘉图，在哲学上由黑格尔所阐明的那样)，极大地不同于以往的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意识形态上对它所美化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在李嘉图的经济体系和黑格尔哲学中，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批判的自我认识不超出它自己的原则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的时期里，即在资本主义最广泛发展的国家——英国与法国，在实际与理论上与它相对立的，已有了“从外部”对资产阶级体制进行的无产阶级的批判。正如在西斯蒙第那里同最

后一位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对峙的，是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自觉的社会主义批判者；同样，黑格尔（部分地在李嘉图的直接影响下）在他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哲学论述中，已经认识到那种地下的震动；这种当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发生的震动，是由它本身造就新的、“束缚”于现代“工业”中进行“特殊”劳动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所引起的。他按照现实主义把这个新的阶级，描述为生活于“依赖与贫困”中的和被排斥于享受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之外的阶级，描述为降低到为享受社会权利所必要的“维持生计方式”的程度之下的大量群众；这个阶级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原则引起的必不可免的发展，随着“财富过量”的不断增长，越来越下降到“贫困过度”^①。

他还清楚地阐明，在此场合不是论及“贫困”本身，（它在以往各时代由于自然的匮乏也是不可避免地产生的），而是探讨属于现代社会并应由它解决的、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地说没有人可能有权力反对自然，但是在社会境况里贫困同时获得了使这一或那一阶级遭受到不法行为的形式。像要消除贫困这种重要问题，是一个主要激励与困扰现代社会的问题。”^②他还把与这种产业工人广大群众由社会条件决定的贫困相联系的“见解”，用赋有特征的言词表述为“内在的反抗财富，反抗社会、政府等等”^③。

对于黑格尔犹如对一切其他资产阶级社会认识来说一样，不可超越的界限在于：他把这个新的社会阶级仅仅消极地理解为“民众”（pöbel），而不是同时积极地理解为“无产阶级”，他

① 参见《法哲学》，第243页 45节。

②③ 出处同上，第244节

“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而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①。

批判的因素在黑格尔哲学方法上比在其内容中更清晰地表现出来。辩证的方法对于黑格尔来说是重大的手段，他运用这种手段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显露出来的矛盾，不像李嘉图所作的那样，使它们在理论上无中介地相并列地存在着，而是通过带有大量不确定性、尖锐性和任意性的、毕竟是天才地创立的逻辑中介体系，强制地使它们“在观念中”融合为被看作活生生发展的“矛盾中的统一”；然而他同时适应那种急迫地结束革命运动和“复辟”的阶级需要，借助表面上完全“恢复”全部陈旧的、被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业已克服的包括基督教教义学在内的形而上学，使这种统一过渡到一种新的“绝对的”形而上学^②。这是在容纳“矛盾”方面有如此巨大能力的方法。如若人们把它“过早地”同资产阶级社会，它的国家和它的哲学、宗教与艺术的决裂，在黑格尔那里看作保守体系的创立者同他本人的革命方法的冲突，那末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被看作对于接受完全相矛盾的新的、例如像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与革命的内容来说，是敞开门的。拉萨尔和较长时期还有蒲鲁东，都认真地对它提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这个对非革命地理解无产阶级所作的指责，形式上是反对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首先是蒲鲁东）的，并且在这种运用方式上并不是完全击中要害的。它与马克思在此数年前〔参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38页〕，以更充分的理由反对来自黑格尔左派当时的同路人所提出的指责是相同的。不过他当时相反地借此维护了蒲鲁东的革命观点，反对仍然停留于资产阶级基地上的“批判的批判”。从实质来看在这些言论中同古典形式划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分界线。

②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复辟”形式，参见MEGA（老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部分第1卷上册第LXXIV—V，刊载的马克思1843年笔记，以及在黑格尔逝世100周年之际我发表在德文与法文杂志上的详细论纲《黑格尔和革命》〔《反对者》1932年卷，第3册，1932年2月5日第11页以下〕。

出过这种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辩证法陈旧的酒器，对于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新酒来说已不再适用了。尽管他们对于由他们在自己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制定的、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还保持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综合的名称，并且有时在论述的外在形式上还“卖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①。但是，从实质上来看他们是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完全决裂了。他们把辩证法建立在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们在这种按唯物主义观点“颠倒”黑格尔的方法时，还从它们的形式上摆脱了一切符合它作为复辟哲学性质的东西；马克思在他最初彻底研究尚为流行的黑格尔辩证法时，就已批判了它的“神秘方面”^②。19世纪新的革命运动的理论不再需要像黑格尔复辟哲学那样，不断巧妙地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地活动，为的是把它新的内容当作旧内容的恢复来进行阐述。新的理论“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清弄自己的内容。”^③它作为无产阶级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也在形式上具有新的、不再是哲理的，而是严格的科学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按唯物主义方式颠倒的并揭晓其神秘方面的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中，阐发了他们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的特殊方法。

① 参见《〈资本论〉187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参见现已公开表明的、马克思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内容丰富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5—404页〕以及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1873年版中着重援用了这一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③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4页。

(三)

(5) 马克思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李嘉图与黑格尔的态度对待另一种批判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在此期间同古典的与古典之后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相对立，以所谓的“历史学派”为形式发展起来的。这个浪漫主义的历史学派在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同社会主义者一起和部分地已在他们之前，对获胜的资产阶级原则发起了最初的理论的攻击。马克思从自己新的立场出发一开始就看透这个流派的性质。(5)他在他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和迄至今日并且正是在今日仍然具有极高现实意义的，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中，揭露了这个表面上“反资产阶级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流派归根结底所具有极端的资产阶级性质；它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倒不如说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①。(6)

对于历史学派在其反对迄今的、主要是理论的社会研究派别的斗争中所宣传的“纯粹历史”方法的口号，他同样还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这种斗争并不针对资产阶级的前提；这些前提不自觉地包括在古典资产阶级理论家在形式上完成的抽象之中（和已经充分自觉地并以辩护为目的包括在他们后继者更不彻底的抽象理念之中）。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这些前提是与他们具有十足信念的“历史”批评家所共有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斗争是针对将这些理论原则无所顾忌地运用于当前情势而产生的、并且现在已由像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和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2页。

家以令人惊异的明确性所表达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结论。这种“危险的思想”以萌芽的形式已包含在17与18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社会研究者的理论之中，并且它们“否定的”与“破坏的”力量在此期间已曾在用恐怖行动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过程中获得证实。按照这些性格来摆脱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惊恐的“历史学家”的天真想象，这些危险思想在现今可能很容易重新成为令人可怖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上面引自《共产党宣言》关于由封建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提出指责的含意的言论，经过适当的变动运用于历史学派在基本原则上对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敌对立场：这个学派责备古典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与其说它一般地产生了一种理论，倒不如说它产生了一种危害资产阶级制度继续存在的理论。

马克思在所有这些严厉否定由历史学派所维护的理论与政治原则时，也看到了这个新的流派出现在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理论进步。它通过首先认真研究封建主义的中世纪社会，然后研究远远上推的远古社会制度，即所谓文化、艺术、经济的“起源”，而扩大了社会研究的领域。马克思关于新学派的这种爱好在1842年就已讽刺般地说过，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①他在后来不仅发现了纯粹理论的进步，而且还首先揭示了批判的和指明未来的倾向；这种倾向存在于向历史的和原始历史的过去的倒转之中。(6)他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做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页。

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①

从这些句子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还提供了数以百计的类似句子)，人们可以认识到对于如下特殊意义来说的决定性理由，即当时尚处于它的伟大发现者时期的原始历史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社会科学的形成也具有的特殊意义。

在此时期那种与现代世界相距如此遥远的、与当今的状况如此深刻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迄至当时充其量表现在传奇与诗歌之中)，第一次郑重地向客观的科学研究敞开大门。这一事实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成为这样的预兆：即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当前发展的阶段上，已在自身中生气勃勃地包含着比起历史时代全部以往革命所达到的变革更加彻底的变革趋向。相反，在这里由马克思颇带幽默地说明的在原始社会的“平等”状况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比，总的说来使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只具有极为有限的意义。假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种“原始的”社会状况中实际上预先看到了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并且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在现今早已逝去的制度的实际恢复，(7)这与马克思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原则(7)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历史阐释为物质生产力由低级到高级的组织形式不断的发展。他把远远超过以往一切时代使生产力巨大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看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必不可缺的物质基础；这种过渡是由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所引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突破单轨的通常的进步观念，对先于现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页。

资产阶级的与文明的社会，存在于过去史前世界的、远古的“蒙昧制度”和“野蛮制度”，除了指出它们的匮乏性、愚昧性和不发展性之外，还指出了由现代“文明”制度衬托出来的某些优越形式；与此同时他们继续进行了对“文明制度的批判”。早在他们之前，第一批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尤其是沙尔·傅立叶，运用这种批判开始对资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自我满足的可靠性进行了抨击^①。他们把对史前史的研究，还看作是他们用唯物主义研究当今社会必不可缺的基础。他们强调，只有通过精确地研究原始社会、它的发展与解体，以及它过渡到基于私有制与阶级对立新的社会体制的不同形式，才能科学地弄清当前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形式。例如，为了科学地说明经过历史时代的公有制重要残余和希腊、罗马、日耳曼、马尔特、斯拉夫的私有制的不同原型，就必须追溯到史前时代公有制和由此决定的它解体的不同形式。但首先只有那种有关史前社会的非资产阶级形式的认识，才使得现代的研究者有可能设想当前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以进化的方式在这一或那一点上超越现今资产阶级制度，而且以革命的方式导致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未来集体制度(Gesamtzustand)。这种变化的结果按照它与当前资产阶级制度相距的远近程度，不仅不再与中世纪和古代社会相类似，而且与相距更遥远的、完全非资产阶级的过去毫不相同。(6)这个论断在马克思理论范围内完成了两个重要任务。它反对了那种幻想就在明天，也就是说最终只要通过较少的斗争与破坏，就可实现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它以更加明确的观

^①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2页。在那里的脚注中，傅立叶对文明社会与史前的生活方式之间对立的深刻见解被概括地援用。还可参见该书1891年第四版序言《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6—259页。

点把共产主义社会推移到虽然还很遥远的、但毕竟是历史上一定的即所谓可确定年代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时代；这完全就象一切资产阶级形式以前的那些社会制度尽管存在于如此遥远的过去，然而却存在于人类现实社会之内，而不是存在于其外。但是还不止于此，这个如此确定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那些史前的制度不必具有最微小的相似性。这完全就像从另一方面来看，今日的所谓“自然民族”的“原始”状况，或者说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人们内心结构的“目前”“未被意识的”部分的联系，同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上与其相适应的、原始社会的状况以及未来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通常不会是完全一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内容和实际形式，不能通过某种类比法，这就像一切其他现实一样只能通过经验来确定；这在这里意味着通过历史的发展和人的社会行动。

第七节 革命的理论(1)

(2)在我们转到探讨马克思社会科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内容上最重要的问题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我们论述的这一部分论及两个较一般的问题：一方面是由马克思制定的可供理解革命的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概念构成的新类型；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一切科学理论的论述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实践的自觉联系。

(2) 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家的肤浅而随意的处事方法；他们采用这种方法对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特殊关系，作同样抽象的一般理解；在此当中“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in abstracto〔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

偷地塞了进来。”^①他同样批判了被“法的历史学派”和非理性主义者当作崇高目标的、对任何理论的概念构成的一概否定。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社会研究同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历史与理论的联系。黑格尔不仅对理论家通常的(被他称作“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处事方法，而且也对历史学家“无抽象的”(begrifflos)处事方法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真正的一般”(“Wahrhaft Allgemeinen”)与之相对立^②。他把这种真正的一般与特殊和个别“辩证的”同一性，在这样的似非而是的文句中作了表述：“真理是具体的”。以这种哲理的形式已表现出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通常抽象处事方法相对立。(3)这个论断作为批判的原则至少保持了对于马克思革命的社会批判来说的适用性。正如马克思在抨击恒定的、已成为科学认识桎梏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抽象化时，是通过把它同其特殊的历史内容作对照，那末对于黑格尔来说辩证发展的继续就在于：把“具体的”在其中包括现今的内容作反题，同各时已达到阶段“抽象”的正题相对立。正如黑格尔在他辩证方法无情的继续不断的运动中，否定并在较高的新概念中“扬弃”任何现存的概念；同样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继续在于：消除那种对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错误的绝对化，并把它从而被否定的存在形式，在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新的无产阶级存在的内容里加以扬弃。(4)就在这种“具体的”，即现存社会关系现实的、社会的、经济的、阶级的内容，同其抽象形式的对立中，以及在无产阶级生成的大部分未成型的内容同资产阶级存在业已完全形成的内容的对立中，存在着新的、革命的马克

① 参见《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7页。

② 参见《哲学全书》第1卷，第163节和《法哲学》，第24节。

思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倾向之一。(3/4)

资产阶级的科学把现存社会的财富称作是“国民财富”^①或者“共同财产”^②，把国家称作是一个社会统一的必要形式，马克思主义也并不否定这些定义“抽象的”真理性。它仅仅加以补充：在国民财富具体的、当今现存条件下，占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并同样是现今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以同样的方式马克思并不否定“抽象的”必然性：“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③但是他针对那种抽象提出的论断，指明了在现今社会组织“具体的”状况下，对社会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指挥对于当时的雇佣劳动者来说所具有的、在其内容上为剥削的、在其形式上为专制的性质。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把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领导的地位与职能同乐队指挥的地位与职能相类比时，马克思则把如下具体形式，即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状况下以资本主义所有者的名义通过由经理、领班、监工、工长构成的完整的等级制度，对集中在工厂里劳动的工人群众行使指挥所采用的形式，同一支军队通过它的高级军官和下级军官来进行的指挥相对比。正如这里的情况一样，在那里尽管有劳动合同表面的“自由”，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涉及把劳动大军自愿地置于为共同利益所必要的最高指挥之下。“资本家所以是资

① 参见例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著作的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部，《精神哲学》(下面引文称作《哲学全书》第3部，根据《全集》第7卷下册，柏林1845年)，第524节，和《法哲学》第199—200节(《共同的财产》)。

③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7页。

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①这种统一的调节最高指挥权，在资产阶级社会具体的现实中只对于单个企业才存在；这些企业处于在整体上无调节的、通过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经济竞争的斗争才事后出现必要的平衡的社会生产之中。(5) (6) 权威与任意，计划与无计划彼此处于争斗之中。在这种场合显得需要共同的准则；(6) 在个别企业和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社会劳动所行使的权威，彼此处于反比之中；正是那种人为了个别企业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于资本，最响亮地称颂为促进生产的“劳动组织”的形式；他们同样又高声地把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与调节，从整体上指责为对个体资本家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精神”的干预。“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②“国家”和“权威”这些抽象概念同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当前形式中产生的、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具体形式，以及建立于这种基础之上的特殊国家形式的这种严重对立，其自然的终结是由在思想上过渡到新的、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的形式；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过去的死的劳动作为资本统治着当今活的劳动，那末在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以往各世代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③。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5页。

③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1页，有关整个问题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页以下；《资本

(7/8)真理必然是具体的这一黑格尔的假设，对于具体的运用来说在理论上是夸大其词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而这就导致了由马克思批判地继续深化为社会科学概念构成的新原则，在其中一切社会关系特殊的历史性质和历史变化的现实性以概括方式保留下来。(8)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研讨过，马克思在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中，把这个社会的一切关系及其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当作历史特殊的关系与阶段来论述。他在从资产阶级社会一定的历史形式前进到一系列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普遍观念时，仍然总是保持了这种特别的观点。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一般概念本身，而在于特殊的性质；通过这种特性而使每个特定的历史的社会，与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区分开来^①，并且它的发展就表现于此。以同样的方式，对作为任何这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础的物质结构，不是当作“经济”一般，而且当作物质生产特别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待；同样对在物质基础与政治的、法律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从其特别的与任何时代不同的形式去进行探讨。(7)

借助于资产阶级社会理论家用通常抽象的处理方法而构成的、所谓的“一般”概念，无法理解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通过合理地改造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原则，获得了作一般概括的(Verallgemeinerung)唯一形式；这种概括在作为严格的科

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6以下、第395以下；《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9页以下。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3页以下。以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16页以下。

① 参见《导言》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736页。

学按照在方法上发展最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样板而从事的社会科学中，是完全可能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在表面上从事研究社会一般，却始终拘束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范畴。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历史形式，并从而达到了超越这种形式对社会发展的更一般的认识。

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从在经验中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料里，希图通过逐渐地剔除越来越多的具体规定性，升华到“社会”一般的抽象普遍概念，并且在其中经常从由经验摄取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定性中，无意识地(或为了辩护的目的)正是把最个别的规定性当作“普遍的”规定性来坚持。马克思唯独在研究社会的实际的历史变化中，看到了认识现存社会形式的普遍规律的可能性。

正如现代自然科学不再是按照陈旧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方式，把从某个对象中发现的任何一个特征加以一般概括，例如从正在下落的石头得出石头下落的普遍规律的结论，而是从其整个特殊性上分析个别的情况，或者从在精确地规定试验条件下个别的试验中，进展到阐述普遍的万有引力的规律(这种规律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便带来相应变化的外部结果，因而它对于下落的石头和打基础的石头，以及对于这样的其他事物如气球、行星和彗星，都是适用的)。同样，一种严肃的社会科学不能通过简单地舍弃某些和坚持另一些多少是任意选择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存历史形式的特征，而构成它的一般的概念。它通过精确地研究从另一种同样特殊的历史形式中历史地产生的这种特殊历史形式，也可能通过在一定的、严格确定的条件下而引起的它当前形式的变化，而达到认识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所包含的一般性。社会研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成为准确的、**基于观察与实验的科学。**

正如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来说，普遍的规律只存在于由它支配的特殊情况下的整个种类，同样在社会科学中普遍的规律只存在于发展之中，即从过去的特殊状况过渡到特殊的当前社会状况，并且从这种状况过渡到由于它的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形态。可见在社会科学中唯一真正的规律是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里摘引并掌握了俄国的《资本论》评论家的论述^①。这位评论家中肯地讲明了新的马克思社会研究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特征。他指出，尽管马克思论述的外表形式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在唯心主义哲学（并同样在通常抽象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中，把一种特别的社会状况的事实同任何“观念”相对比；而马克思的批判则限于把现存的事实，“不是与观念，而是与其他事实”相对照，并通过尽可能精确地研究这两种事实，把这一事实与另一事实相对立地作为“不同发展因素”来加以论述。旧经济学家提出了竟然要同样地适用于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经济生活的抽象的普遍规律，而按照马克思历史发展的原则，这样的普遍规律对于经济生活来说恰恰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指出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

^① 参见I. I. 考夫曼载于彼得堡《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页以下。

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①

第八节 革命的实践

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联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有的标志。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在它的一切发展阶段上都服务于一种实际倾向。在它最初的伟大时期它就是同时作为革命地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表现与杠杆。在资产阶级原则获胜以后，它部分地改造为所谓“纯粹的”和“无偏颇的”科学，并以此伪装卫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无产阶级的进攻；部分地与在孔德那里表现出来的倾向相结合，服务于多少自觉的反革命纲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象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的和德国纳粹主义的这类运动，就企图实际地贯彻这种纲领。

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真正的特征仅仅在于：它维护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它以合理的（不是以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荒谬化的）形式意识到并信奉它的阶级性质。“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② 与此相联的，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理论真理性要求的任何放弃。自由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人物直到不久之前还头脑简单地采取相反的观点，这使人

① 参见马克思，《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页。

回想起神学家的处事方法，即他们把任何不是自己的宗教看作是人们的臆造，而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则视为上帝的启示。唯物主义的批判把一切理论的真理性的真理性，精确地阐释为受历史与阶级限制的“历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通过唯物主义的批判只不过使资产阶级科学的绝对的真理概念在历史与社会意义上相对化了。从严肃的科学立场对真实原理必须提出的正式要求，通过过渡到唯物主义的真理概念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不是降低而甚至是提高。

在这里问题涉及到重复同样的如下过程：即在此过程里在资产阶级社会开端首先通过世俗思想反对中世纪宗教形而上学体系的斗争，然后通过经验主义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斗争，现今整个“资产阶级的”科学才得以创立起来。培根早在新的资产阶级世纪的初阶在他的《新工具论》（它必定有助于当时正在产生中资产阶级科学（1）完全贯彻它新的研究方法）里，宣告了任何科学的历史性质：“Recte enim veritas temporis filia dicitur non auctoritatis”（真正的受时间检验的真理，据说不是强权的产物）。他依据所有权威们的这种权威，创立了新的资产阶级经验科学对于中世纪教义科学来说的优越性与时代。^①

这一次只涉及传统的历史的意识形态进一步的变化。不仅是神学和形而上学，而且哲学和一切历史的和社会的真理都被夺去了它们幻想的独立性，并被卷入了事物的长河和斗争的折磨。这种无条件的此岸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成为了不仅是被认识的内容的属性，而且也是认识形式本身的属性。马克思的理论对当前社会的一切关系和观念，毫无例外地从它们与一定的

^① 参见《新工具论》I，第84页。

历史时代和特殊的、表明这个时代特性的社会形式的现实联系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也意识到自身是作为历史的产物，同社会的历史发展一定的阶段和一定的社会阶级有着现实的联系。只有以此方式才可理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科学称之为“批判的和唯物主义的”性质的东西。无产阶级的新科学突破了资产阶级研究者的狭隘性；他们按这种狭隘性把他们的摆脱了中世纪教义学和形而上学特别桎梏的科学，阐释为永远“自由的”和脱离一切实际利益冲突的科学。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当前时代的社会意识的特别形式，甚至构成这种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唯物主义理论甚至是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表现与杠杆。

由于这个补充，我们在前面用以说明马克思理论的批判与革命的职能的事例，获得了已变化的意义。理论的论断有时还良好地适合于论证无产阶级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实际进攻，那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理论论断了；像国家与法这种表面上超越于阶级的社会研究的对象，从它们特殊的历史规定性上被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当作资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律，即当作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法律来探讨。同样，社会的财富从它的特殊形式上被看作“资产阶级的财富”，这就是说当作“商品”的堆积(eine Menge von“Waren”)；商品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即为了利润而被生产出来。从而它同时是作为把无产阶级排斥在外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当作对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贫困的、资产阶级的富余，当作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按照拉萨尔出色的说法)是“异己性”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此外，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物质生产从其特殊的规定性上被看作“资

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或者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同时当作不断扩大的“孵化剩余价值”的资本表面上自我增殖的过程，当作在其后面隐藏着由社会生产资料垄断的占有者剥削实际生产者的现实过程，并且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范畴进行的。唯物主义理论无条件地对一切现存的社会关系从它们变化的长河中去理解，并且把一切关于事物的静止观念消融于变动的过程和实际的阶级斗争之中。唯物主义科学通过对现存资产阶级制度历史地详细说明和对从它目前暂时的形态中产生的发展倾向所作的论证，只不过是以其特别的理论方式做了无产阶级与此同时的现实历史运动在实践中所做的同样的事。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以充分的理论意识，承担了在整个说来针对变革现存社会的运动中赋予它的部分职能。从而它是作为与现代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相联系的、批判的(2)和革命的科学而建立起来。

统治阶级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而否认它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把它原理的更加全面而深刻的真理性，奠立在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基础上。

马克思的理论按照它一般的、在此被阐明的性质来看，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这种新科学在这样的时代，即这时与在资产阶级社会、它的国家和它的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是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独立运动。它反对资产阶级的原则，代表着这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新的观点与要求。就这一点而言，它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科学。它详细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研究在其当前发展中显然可见的倾向和走向它面临的实际的彻底变革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它作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第二部分 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1) 马克思在从其青年时期一般的革命唯心主义达到更精确地确定他自己理论的和实际的任务之初(1),就赋予政治经济学对于研究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首要的意义。他在几星期之前还给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朋友卢格(Ruge)的信中写过赋有特征的言论: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①而现时他最初的唯物主义的脱毛过程(Mausserangsprozess)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②他随着这种从理论上过渡到“政治经济学”,同时在实际上实现了从雅各宾资产阶级革命(它希望从政治角度解决劳动者阶级的社会问题和需要),过渡到现代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现代无产阶级已决心在政治经济学中探索它遭受压迫的特别根源和求得自身解放的特别道路,并且把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行动的一切其他形式仅仅当作它的经济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② 参见《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行动的次要手段^{①a}。然而，青年马克思这个理论纲领——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对市民社会的剖解，决不(2)意味着简单地接受由经济科学迄今发展所流传下来的结论。(2)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实践中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基本原则分离以来，他们在理论上也不再拘执于这样的幻想：资产阶级在它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所创立的那种政治经济学新科学，借助于使它本身已包含的原理简单地继续“进化”，现在可能再次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反对在现今社会中在经济与政治上占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理论上的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于无产阶级就像政治国家一样，或者从新的唯物主义立场来看甚至比起超越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以更彻底的方式，首先和特别地曾经是敌对的领域。而且还并不由于无产阶级的理论突击队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就会丧失这种性质。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对于新的阶级的代表人物来说，从这种立场出发首先就是作出关于这个敌对者的说明。

马克思毕生都反对这样的误解：他在关于价值的经济学研究中，是要研究不同于资产阶级关系的别的东西^②。他通过使价值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在形式上只不

①^a 对这种新的认识最初的、还采取哲学形式的开端，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7页。它充分显露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2页以下。它最成熟的表述在由马克思撰写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

② 除了别的可参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44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页；以及《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6页以下。

过把在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内容上几乎已完成的现有概念统一地综合起来^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在马克思逝世后详细地阐明^②，以及后来从马克思遗著中公开发表的三卷本《剩余价值理论》^③详尽地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容忍那种肤浅的意见：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的新内容，纯粹是从魁奈、斯密和李嘉图地道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推导出来的逻辑结论。他们把在1820—30年最初的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那里，在欧文共产主义的经济学的论争中，在蒲鲁东、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那里所遇到的观点，阐释为“经济学上的错误理论”、唯心主义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和从实际结论上来看是反动的“空论”^④。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时代里已形成的并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规律”中表达出来的平等理想，本身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因而它同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只是在思想上但并非在实际上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设想，对经济学家可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和运用他们自己的武器”进行抨击，并且根据“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原则，一切人都希望变成为直接的、交换等量劳动的劳动者。马克思对他们之中的优秀者之一(布雷)作了这样的回驳：

“这个平均主义的体系，即他想应用到世界上去的这个具有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2页以下。此外马克思1867年8月24日和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0页，第32卷，第11页。(均见人民出版社版)。

② 参见《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5页以下；《资本论》第2卷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1页以下。

③ (3)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未公开发表的原始手稿，(3)由考茨基于1904—1910年编辑出版。

④ 参见恩格斯，《〈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序言》，188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7页以下，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第3卷，第3部分。

纠正作用理想本身，只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因此，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随着这个影子重新成为具体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决不是梦想中的一个变了形的社会，而是现代社会的实体。”^①

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地推导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②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状况，人们必须不是把经济学作别样的解释，而是通过实际地变革社会来造成一种状况，即在这种状况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停止发生作用，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成为无对象的。

尽管政治经济学获得了对于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来说巨大的、基础性的意义，并通过这种理论全部的继续发展而维护了这种意义，那末正是在这里特别明显地展示出唯物主义观点对于那种肤浅见解的优越性；当时乃至现今某些“革命的”理论家肤浅地幻想：他们借助自己新的理论认识，或者最终通过自己纯粹善良愿望的努力，就可以简单地无视这种客观实况，或者说由经济科学所研究的、现存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正如现代工人阶级独立的社会运动依靠了历史上在它之前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成果，并同时它正是把这个资产阶级以及由它创立的新的经济方式，它的国家和它的一切其他制度，认作是敌人，而它自己的行动完全与之相分离，并最终在决定性的斗争中要把这个敌人消灭。同样无产阶级在创立它自己的、适应

^① 参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

其目标的革命理论时，必须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开始，正如在它的唯物主义实践中不能跳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存在，同样它也不能跳过在当前时代历史地存在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定思想形式。随着物质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经历长时期、多阶段的、同时是实际与理论的批判，有关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最终地被完全消除。

马克思早在把他的唯物主义原则的这个结论在《资本论》中运用于经济学科学之前很久，青年马克思于40年代在不同的青年黑格尔派关于黑格尔哲学对于面临的实际革命的意义的论争中，就把这个结论运用于哲学科学。正如当时哲学的批评家把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与不同的哲学派别相对立；这些派别中的一派希图从哲学原则中(不与哲学在理论上相决裂)直接推导出革命，另一派同样直接地(不与哲学在理论上进行争论)摆脱哲学。同样当今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评家向一个派别(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等等，他们希图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中推导出作为直接结论的社会主义)呼唤：你们不(在理论上)扬弃经济学，就不可能(在实际上)实现经济学，并向另一派(对经济学无知的“纯粹历史学家”、“纯粹社会学家”、“纯粹革命的暴力论者”等等)呼唤：你们不(从理论上)实现经济学，就不能(在实际上)扬弃经济学^①。

^① 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页；在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中(莱比锡1930年，第93页)有较详细的解释。在马克思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也有类似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在它后来的发展中，即在19世纪“庸俗经济学家”那里，尤其是在现今的、一般地说不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纯粹的”经济学代表人物那里，才退化为不再满足共同的社会利益的专门学科。它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新科学的一部分而历史地产生的，这种新科学是由资产阶级在它争取实现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斗争中创立的。它构成了对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心理学的、法学的和政治学的伟大启蒙运动现实的补充；在此启蒙运动中当时兴起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首先表达了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变化了的现实以及与此实际变化相适应的新的资产阶级意识。政治经济学新的科学在其发展的这个最初时期，并且还在重农学派^①最初的伟大体系里，在理论上同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整体联结为无偏颇的统一。亚当·斯密把他经济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外表上已同道德哲学上的《道德情操论》区分开来。(1)在他那里从事实上来看经济学已经包括了从全部(1)商品交换与分工中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秩序的社会关系。李嘉图体系作为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剖解”，只是敏锐地分析了似乎是社会躯体的骨骼的、社会组织物质基础。在这个体系中至少以抽象的形式还保持了经济学同社会生活整体的有机联系。但是，在19世纪开始之际，在这位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后完成者那里，已显出开始狭窄化的最初征兆。(2)尤其是在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3)理论上的退化(3)中，表露出现实变

^① 参见例如被马克思在这种观点下作过摘要的魁奈的著作：《自然的利权》(E·德尔，《重农学派》巴黎1846年)；MEGA1，第6卷，第612—613页。

化必不可免的思想结果；通过这种变化在此时期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越来越多地丧失它起初作为社会生产力无与伦比的解放者与促进者的职能，并在它这方面反而变为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且甚至是现存生产力的桎梏。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社会职能上的这种现实变化，自那时以来虽然有暂时的停顿，但从整体来看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现实变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在周期性反复的危机中扰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迄今的一切比例；这种比例的扰乱自它在1825年第一次现代经济危机中首次明显地出现以来，在随后的世纪里尽管有暂时的削弱，但从整体上来看采取了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且在它的顶点上已使得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成为问题。这种变化在社会上直接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开展处于一种不是在任何一点上但在整体上却是真实地反映同一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过程的曲线（4）无产阶级运动暂时的倒退与低落按这种曲线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周期暂时的高涨与繁荣），而从整个过程来看同样沿着上升的直线运动。最近百年的历史表明，在此期间这种反复被击败的、但同样持续不断重新开展的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经受住了随失败而来的残酷镇压与一切现存的工人组织实际遭受破坏的、或长或短的时期。历史表明：在这种斗争和失败中，最初为分散的与多少是自发的工人反抗行动，是怎样逐渐地成长为规模越来越大的、更加有效的和更具威胁的运动形式，即成为一种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开展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者阶级之间（4）的现实战斗；这种战斗甚至经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的民族的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再也不会持久地偏离它自己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它引起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和在当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出现的重复并超过全部以往恐慌的危

机中资本主义均势随着表面恢复而产生新的破裂，最终地打破了一切如下幻想：在这种不平静发展的每个“平静的”间歇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尾随其后的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幻想通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从现时起“摆脱危机的”继续发展，以及在民主主义的或者新近在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国家里最终克服阶级的对立，去历史地“驳倒”马克思主义的预断。甚至那些对有产与统治的阶级曾经是无限美好与有益的东西例如机器和货币，由社会财富的生产力蜕变为社会生活的破坏力。（5）政治的和精神的上层建筑与这种变化了的物质状况相适应。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上升发展阶段中产生的民主主义的政体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到处陷于动荡之中。“紧急状况”和“非常状况”成为常规，战争和国内战争成为当前生活秩序“正常的”存在形式。

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积极的社会职能的破灭，政治经济学在第一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包括社会进步整体的特征也就丧失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以极度的逻辑严肃性与一贯性，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全部内在联系溯源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从而把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置于一个基本原理下进行论述。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只是在形式方面意味着对亚当·斯密来说的一个进步。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以史诗般的广度和不顾逻辑上的矛盾，把政治经济学发展为巨大的整体。在李嘉图的《原理》中特别是它的头两章（按照马克思的说明它们包括了全部著作内容），通过它们的独特性、基本观点的统一性、简洁性、集中性、深刻性、新颖性和概括众多方面的精辟性而获得理论上的满足；^①而这种满足是以丧失丰富内容

^①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I，第8页。

和开始形式主义的僵化为代价的。李嘉图的体系仅仅追求科学形式的普遍性。它不再像斯密《工业体系》那样，要完成共同的社会任务。历史赋予他的特别职能仅仅在于：总结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时期伟大的创造性成果，并从而也在形式上结束事实上已完成的发展。

如果说，就完成这个特别的任务而言在李嘉图那里形式上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历史的根据，并因而在他那里在理论上是合情入理的，那末相反在继续发展中资产阶级经济学持续不断的形式主义的空洞化，则不再带有那种重大的理论特征了；对于这种特征现今“纯粹的”经济学的怀疑论者和嘲讽者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们为此甚至无异议地接受对他们的科学在理论上排除任何可能的运用因而毫无实际意义而提出的指责（他们想要按照某些现代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物理学家拙劣的榜样，但又远不是紧紧跟上由这些科学获得的正式成果，并且在他们通过特别的纯粹性而著称否则就默默无闻的领域里，根本不再（6）为了实际的目的，而只是作为单纯的消遣或者“为了上帝的威严”，去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就他所处的时代作出了论证，并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运用微少的学识就可把这种论证推行到现在：① 在这时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社会职能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便丧失了它起初全面的和社会的趋向，同时它迄今的科学性质——无偏颇性、一贯性和有效性，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② 从现时起，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的实际发展，就排除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的科学发生任何意义重大的（7）深化。

① 参见例如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

② 参见《跋》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在资产阶级的古典学家那里在这个社会的较早发展阶段上,自然产生了政治经济学同一般社会科学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在较高的阶段上使这种联系得到恢复。经济学理论从整体上使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产生兴趣和对它采取的特别态度,只是建立上述基础之上。由于这个缘故,当有人为下述问题绞尽脑汁时伊始就是平淡无味的:为什么马克思对那种所谓全新的倾向(它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主体价值学说和边际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新的经济科学),正如人们可以看到在任何地方都未予以最微小的注意(虽然他譬如对杰文斯无疑是了解的)。马克思甚至注意到了古典经济学最无足轻重的模仿者,只要他的某些新的言论(正确的或错误的)有益于研究某个社会经济问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在他的后期对另一个流派给予了充分的注意:这个流派是在边际效用理论家之前和之旁,并同样地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企图在经济科学中创立新的开端(这就是所谓历史学派和它的从洛贝尔图斯到阿道夫·瓦格纳的“讲坛社会主义的”继续)。但是,马克思对这样一些人的思想,即他们把自己的科学虽然还称作是“经济学”,但是他们却希望根本不再涉及经验历史地研究曾经构成古典经济学课题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与对任何其他“辅助科学”相比而言,基本上不再感兴趣了;这些辅助科学从事研究对于社会的历史变化与发展来说不特别重要的、有关自然和技术的实际领域。只有当这样的经济学说脱离“纯粹的”理论而后转到实际的有效应用,并从而例如像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样在工人运动内部找到追随者时,它才会获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社会理论的关注。但是涉及边际效用理论的这种情况,马克思在世时还未出现过。在马克思逝世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乔治·肖伯纳及其同伙在“杰文斯—门路尔的使用价值与边际效用论

的基础上”，建立了“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以求“在这块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恩格斯后来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3卷时简略地与轻蔑地提及了这个理论流派^①。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正如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它的政治经济学新科学中，宣告了它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一样，着手变革这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阐明了它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个别结论的批判。它是从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上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社会阶级的新立场，在决定性的观点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批判。它研究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伊始就包含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使得无产阶级争取变革这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斗争，在客观上成为可能和在主观上成为必要。在政治经济学以往的发展中，任何发展阶段也都受到随后阶段的“批判”。在这里“批判”也不具有纯粹的理论意义，而是同时意味着历史现实的相对立的立场。就这样，重商主义受到重农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受到亚当·斯密的“批判”，亚当·斯密受到李嘉图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当于这种理论批判的各个阶段。然而在所有这些阶段中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始终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生产的过时形式的革命斗争中，把它自己解放和发展的特殊利益无偏颇地与普遍的

^① 《资本论》第3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4页。

社会进步等量齐观。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只要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产生的新的阶级对立尚处于潜伏状况，资产阶级就充分坦率地把自己看作社会共同利益的科学代表者。政治经济学在这个不发展的阶级斗争阶段还以科学的无党派性，参与解决随着工人阶级的登台而对经济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在由于1825年的经济危机和1830年巨大的政治变化而开始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在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就不再容许在资产阶级的视野内不偏不倚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联系了。从这时起，对社会发展严肃的科学研究只有从这样一个阶级的立场才是可能的，即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最终地消灭阶级^①。

李嘉图体系构成转折点。在这位古典的资产阶级(1)经济学最后代表人物那里，以一种面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后来的发展真正令人惊异的、并使同时代人已感到超凡的纯朴精神，保持了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无偏颇性。“李嘉图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布鲁姆勋爵)。这位19世纪初的英国银行家没有在任何点上超越市民性(Bürgerlichkeit)的界限^②，以毫不隐瞒的明确性在他的科学体系中除了阐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谐与进步的方面，还阐述了在其中所包括的不一致性，首先是阶级的对立。他宣称“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确定土地占有者、资本所有者和无财产的劳动者参与社会总产品的份额^③，从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

① 参见1873年《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页。

② “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0—51页。

③ 参见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全集》，编辑者麦克库洛赫，伦敦1846年，第5页。

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①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已历史地处于资产阶级发展的革命进攻阶段与辩护性的防卫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上。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受其直接影响的黑格尔哲学体系；这完全就像以前的一个发展阶段上，康德的体系相当于亚当·斯密的体系。资产阶级科学在某一整个历史时期完全脱离全部“哲学”和同样脱离一切真正的经济学理论之前，在某个历史时刻它获得了进行自我批判的特殊能力。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体系中所进行的科学的自我批判，不仅是从它的形式的普遍性上，而且还从它的内容的全面性上，超过了他的先驱者对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阴暗面偶而进行的批判。它跟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不再建立在对新的世界秩序原则上的完满性和无限的完善化能力的天真信念的基础上。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在它的初创时期乐观地对进步的坚信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它能够做到，通过颂扬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而供认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②对于亚当·斯密来说相当容易的是：他在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关于增加社会财富的可能性的研究中，在维护资产者阶层利益的同时，还维护着（在反对地租的斗争中在主要事务上与前者相协调的）劳动者阶层的利益，在他所处时期还表现为例外的情况下，即在那时发迹的资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垄断在共同斗争中赢得的进步，他甚至能够坚定地把遭受两个“高等阶层”（地租与利润）压迫的“低等阶层”的利益，摆在这两个其他

^① 参见1873年《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还参见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3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3页。

阶层利益之前。从而，在迄今联合起来的两个阶级之间新产生的、危害资产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得到描述。在李嘉图那里情况则是别样：人们可阅读《原理》中第31章关于《机器对不同社会阶级利益的影响》。在那里他坦率地撤回了他以前的、由西斯蒙第在此期间向他指明的关于通过机器（“这些不说话的工具有始终不过是它们要取代的东西的产物”^①）带来普遍福利效用的错误，并且讲明了作为精确地衡量不同阶级利益的结果的意见：“劳工阶级认为机器的采用往往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的。”^②因而后来的伪科学的资本主义辩护者把他诬称为共产主义之父，这就不足为怪了：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它具有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制造敌意的倾向……他的书是那些力图通过均分土地、战争和掠夺而谋取政权的煽动者适用的手册。”^③

在李嘉图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发展中直接和间接地表现出的事实：这时取代资产阶级（2）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爆发的、占统治的资产阶级同被压迫的与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时期以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为出发点的不同派别的第一个流派，通过那种在较长时间被遗忘后由马克

① D·李嘉图，《全集》，由麦克库洛赫编辑，伦敦1846年，第27页。

② 出处同上。第239页。

③ 参见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伦敦1848年，第74—75页：“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它的总体趋向是要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制造敌对状态……他的这本书是企图靠土地改革战争和掠夺而谋取政权的煽动者的指南。”——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6年9月纽伦堡国家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上，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李嘉图”进行了完全类似的谩骂〔《党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慕尼黑1936年，第105页〕。

思为经济科学重新揭示的论战被取代了；这次论战大部分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之中。紧接着在李嘉图逝世之后，他的理论在这次论战中经过出色的竞赛取得了^①对李嘉图之前的各经济学派别的胜利；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②这次论战大致贯串于1820—1830年10年间，并以和缓的形式持续到1846年皮尔·罗伯特自由贸易立法和1848—1849年欧洲大陆革命。在这次论战中李嘉图理论例外地，即在我们早在上面已提到的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手中（他们企图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出反资产阶级的结论），被用作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进攻武器。^③第二个流派是被马克思称作“庸俗经济学”的模仿者科学；在这种科学中由古典经济学取得的理论成果不断地得到传播和肤浅化，并且逐渐地完全消失了。这个流派的首脑是李嘉图著作的编辑出版者、“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迄至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在它的科学分析中已觉察到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从而为论述它的起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此时期的后期，“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发生了分化，它作为现象的观念是同一现象单纯的再生产，它的庸俗原理从它开始是作为经济学的特殊表现”。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现实对立的发展，经济科学本身同样也显现出对立；此外（在西斯蒙第、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那里）还有他们自己的矛盾，以或多或少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或革命的形式与这种对立相对应。在与此同样的程度上庸俗经济学自觉地更带有辩护性。随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发展中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每一进展，庸俗经济学越来越拚

^① 参见1873年《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② 出处同上和更详尽的论述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的有关章节。

命地致力于从它对这种现实的论述中避开其中所包含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用古典经济学的概念以理论的形式被作出说明的地方，它便事后通过某种错误的解释予以抹煞。同时它在其理论内容上变得越来越贫乏。如果说它在其较早阶段（例如在萨伊那里是作为亚当·斯密的庸俗化者）还找不到完全加工整理好的资料，这就是说它还或多或少从经济学立场参与解决经济学问题；那末在后来的阶段即在麦克库洛赫、巴师夏和其他的李嘉图庸俗化者那里，他们的行动仅仅限于：剽窃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和剔除其令人讨厌的方面①

由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者用不充分的理论手段追求的、为庸俗经济学竭力否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才由第三个流派得出来；这个流派相隔刚好50年而与李嘉图著作相联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包括的对古典经济学实际的完善与批判，是李嘉图以后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达到的。在马克思的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阶段同它的以往阶段的对立，而是经济科学的、历史与理论的主题变换。同时它所涉及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它的全面彻底的变革②。（3）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主要著作称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③。

①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71页以下。

② 参见罗莎·卢森堡，《新时代》第18卷，第2期，第182页：“古典国民经济学以不可逾越的逻辑最终导致转变为自我批判，转变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批判。在英国李嘉图成为一个英国社会主义者（汤普逊、格雷、布雷和其他人）完整派别直接的出发点；在法国紧紧跟着古典经济学第一个庸俗化萨伊的是西斯蒙第；在德国我们在劳（Rau）和随他之后的杜能与洛贝尔图斯那里看到了对社会主义的赞同。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实现了转变为它的反面，即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分析”

③ 参见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6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且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的所有革命者，都在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使用“批判”这一名词^①。在宪章运动破灭和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失败以及随之在整个欧洲开始的反革命胜利以后，便出现了可悲的衰亡时期。在此时期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实际倾向的最后残余被遗忘，资产阶级理论的这种革命的“批判”倾向也同时被遗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长时间内，也希望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直接的”的继续。在他们所抱有的这种希望最终破灭之后唯有他们两人除了把已中断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成果之外，还把这种革命的“批判”（事业与表达方式）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中“保全”下来。

第四节 哲学和科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的。他在对黑格尔法哲学作批判时首次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对市民社会的剖解”的意义。但是在达到这一时刻之后，直到这种立场由一般革命的转变为特别的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

^① 参见在此时期出版的卢格、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以及其他左派黑格尔分子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都在书名上以越来越新的、一个超过另一个的变换手法，标明了“批判”的主题。我们可例举属于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二者发表在由卢格和马克思编辑出版的《德法年鉴》（原文有误！在《德法年鉴》上只发表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译者（1844年巴黎第一和唯一的一期上。《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法兰克福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学哲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

的、由哲学唯心主义的转变唯物主义科学的立场，还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讲明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①；在其中他还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政治经济学看作一种本身就是革命的进步。他提出合乎时代的形式——“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世界”对“政治界”的关系，同当时德国人用以研究“现代主要问题”的那种贫乏的和反动的形式相对比：“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②

但是在此后不久他对（在此时期曾被他称赞为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提出指责：他在自己的著作《什么是财产？》中只是“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因而“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③，蒲鲁东著作便被科学地超过了。马克思本人这时站在激进地超越于经济科学的立场上。产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哲学手稿^④在内容上几乎预示了《资本论》全部批判的革命的认识。然而在这个时期他对经济学的超越基本说来（1）还具有哲学的形式。（2）他把经济学的概念（1）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相对照。马克思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⑤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仍表现为争取“扬弃人的自我异化”^⑥旧唯心主义的哲学斗争的（唯物主义转变的）继续。马克思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6页以下。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7页。当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当时整个经济学更广泛地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

③ 参见《神圣家族》，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

④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181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⑥ 出处同上，第120页。

还把他在这个时期对蒲鲁东的批判归结为这样一句话：蒲鲁东只是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克服了国民经济学的异化。”^① (2) 马克思在从这种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形式达到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之前，还经历了较长远的道路：从这种科学立场出发他在后来的著作里实际地超过了政治经济学的界限。

马克思在他随后的发展阶段里借助于全面地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哲学，达到了完全克服他的哲学唯心主义的影响。他这时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始合作的第一个成果，表现在同他们的来自黑格尔左派以前的朋友（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以及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②哲学的美文学派别的全面论争。他们在这部著作中阐明了他们自己的、唯物主义科学的观点同德国哲学的思想体系见解的对立，并以此同时最终地清算一下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③ 在此后不久公开发表的、反对于此期间出版的蒲鲁东的主要经济著作的论战性文章中，马克思从他的新历史观的立场出发，已完全按照唯物主义批判了蒲鲁东经济学一般的哲学方法。^④ 他指出，由于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视为“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因而他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⑤。相反，马克思在这时对蒲鲁东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② 参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③ 参见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④ 参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第2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198页。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讨论了同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6页。

⑤ 参见马克思于1865年1月24日致施韦泽的信，在信中马克思重述了他以前对蒲鲁东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1页。

著作特别的经济学内容的批判，基本上满足于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完整的形式即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去与蒲鲁东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越改越糟的形式相联系的批判原理相对立^①。可见这时马克思不再像在以前阶段那样，指责蒲鲁东还没有（在哲学上）超越国民经济学。他这时指责蒲鲁东抱有“思辨哲学的幻想”，还没有站立在实际的（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上。（3）由这时开始形成的、独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于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报告《雇佣劳动与资本》中^②，获得了首次肯定的表达。它的结构与内容使人不难认识到，在这里我们涉及到的，是对那种要全面阐释一切经济关系（它构成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基础）所作的、初步与片断的论述；这种全面阐释经多次完全的重新整理加工后作为《资本论》发表^③。不过它已带有了这样的区别：在这里的论述不再是在“商品”的一般观点下，而是在“雇佣劳动商品”（“Ware Lohnarbeit”）并由此直接产生雇佣劳动者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特殊观点下进行的。在这种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对资本卓越的、在其尖刻性上即便马克思后来的说法都未曾超过的表述，即它不是作为人对自然界的关系，而是作为基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而存在于

① 参见D. 梁赞诺夫对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德译文的前言，载《新时代》第31卷第1期，第82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35—660页。马克思后来在1848年革命第二阶段为了在《新莱茵报》上（1849年4月11—5日）发表这个演讲，重新进行编辑加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3—506页。

③ 对此可参见在1849年4月4日《新莱茵报》社论中，马克思当时考虑到发表这部著作总的计划的概述。这篇社论由于形式上的原因没有被收录在《MEGA》（《梅佳》）第一部分第六卷之中。它由恩格斯作为这个演讲1891年单行本的序言首次公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4—243页。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这种最初的对资本批判的分析的继续(完全类似于在后来的一个世界历史时期,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论述),由于二月革命的爆发而遭受“妨碍”②。马克思在此期间在参加1848/49年革命之后在伦敦“完全重新开始”他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研究③,自50年代以来他才制定出他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它既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把完全贯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体系同批判地超越它的一切阶段与形式结合起来。它揭示经济学的、包括其最一般的所有概念和基本原理,是现存社会关系“拜物教式”掩饰的表达方式,仅仅是社会经济形态一定时代历史地有效的规律。它说明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即在此过程中由政治经济学阐明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且它宣告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实现的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这种意义上可以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著作;它作为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革命批判的结合物,同时也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个阶段

在上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1)的概要中,除了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以下,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以下。

② 参见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的《跋》,带有对于理解两位作者相同性质问题的结语:“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9页。

③ 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以下。

判的革命立场不断发展的主线以外，人们还不难发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与其背道而驰的第二条线索。随着马克思革命的社会理论唯物主义的成熟，便出现了越来越强调狭义的经济理论。经济学以其传统的形式，就像它由伟大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阐发的那样，对于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和彻底变革这个社会的实际通路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长达数十年里深入研究巨量的、被模仿者忽略的经济学研究古典时代的资料的过程中，似乎令人印象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意义。正如在1848年巴黎工人失败之后取代以前高涨的革命发展，出现了无比巨大的压制与停滞，在50年代纯粹从外部使得这位唯物主义研究者长期有暇从事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经济学研究^①，(2)因而与此相联，对更多地力求行动的革命能量，实际作用的强暴压制使得这种能量的痕迹只遗留于被客观地运用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之中。现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表现为(2)一种必然的、由不可避免的规律迫使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其中“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②不言而喻，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由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判者及其改良主义追随者反复“发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倾向。正如在马克思发展的一切其他阶段一样，他在这个从革命立场来看最黑暗的时代里^③同样远离任何的宿命论。(3)但是这确乎涉

① 参见《资本论》的一个脚注对这个平静时期的回忆(只有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才使这个时期产生某些运动)：“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② 《资本论》第24章，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上述引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③ 参见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里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印象深刻的描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页以下。

及到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预料的、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中革命行动模式的一定的改变。(3)关于这种改变是否意味着革命实践的增强或者削弱这一问题,从唯物主义立场来看只能依照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在其中可能包括“当时”整个历史时代)来作出回答。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提到,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革命理论的这种后来形式和在此理论中现今经济学开始占有的地位相对应的(正如经济学是从特别的历史情况中产生的一样)^①,是在实际上一种与这种特别历史情况相适合的行动方式。这种客观的、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显得给对他们最初(4)狂热的、空想的、唯意志论的(4)进攻意志感到失望的工人,指出了新的道路。他们在此道路上虽然是漫长的和迂回曲折的,但是因而以一种与第一次冲锋的机会相比更有把握地接近成功的可能性,为未来面临的决定性的阶级搏斗进行准备、组织和奋战到底。(5)这不是第一次:在革命的整个运动的发展中,首先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随后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跟着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出现的,便是冷静的“第二”阶段。在由1848年失败造成的特别情势的同时,现代欧洲革命的一切以往的经验,在产生于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新形式中获得了它总括性的表现。正如在法国革命中那样,随着1789年热情奔放的第一阶段作为冷静的第二阶段出现的,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颂扬为最高的政治智慧与能量的)革命的国民公会的政体;那末从更远的前景来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历史地相继出现,从整体上可以视为同样地向“不断的”革命运动现实的第二

^① 参见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于伦敦流亡者的《人民报》1859年8月6日第14期,“〔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5页。

阶段的过渡。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阶段还作过阐述。当他还受到表面上毁灭性的工人失败的新近影响时，他把这一失败本身称赞为未来更彻底行动的必经阶段，并且从这种意义上把“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当作不再是陶醉的与幻想的、而是清醒的与唯物主义的、获得它自身内容的运动^①，同从短暂的唯心主义的陶醉中经长期持续的悲痛而觉醒的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对立。这样，在当时工人运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除了自己失败的实际经验（“受到打击的军队善于学习”）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即雅各宾阶段的、被马克思主义者几乎视为自己经验的教训，一开始还同时包括一部分普遍的“清醒认识”。它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首先由反革命的法国理论家，然后由德国的浪漫学派宣告的，它特别是经过黑格尔著作对马克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5）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与“经济”的革命理论同一切其他革命理论相比较，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的理论的特殊性质，并且事实上它在工人运动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革命理论的一切国家里，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入门途径。甚至在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它首次（6）爆发为伟大的世界历史行动；（6）在这里在类似的历史状况下，它被最早地接受下来。1883年公开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开始在俄国传播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按照如此老练的评论家如梁赞诺夫的论述，它在这里“给遭受打击的革命运动〔民粹派（Narodnik）〕指明了新的道路，在此道路上它面临着可靠的即使不是立刻的胜利；在俄国实际的本身中，它证实了正在缓慢地

^①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5页。

但不可抗拒地暗中破坏旧制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它预断，俄国工人阶级正如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在不断发展，它将以同样的无情性给俄国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并且它将作为具有同等权利的一部分出现在无产阶级国际大军的行列之中，”^① 马克思本人已在较早时和特别是恩格斯在其最后10年中，完全类似地作出了有关如下特别联系的判断：即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成熟”到接受他们经济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有关的工人运动在乌托邦式幻想的较早阶段和直接的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经验之间存在的联系。从现代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阶段向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过渡，由恩格斯以一种表明这种观点特征的形式直截了当地定义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②。无论其原因如何，但是实况本身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越来越明确地不仅是予以批判，而且在经济学上肯定地与之相联系。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才由恩格斯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中，以及在后来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手稿中，同样在由马克思本人完成的《资本论》第一卷里有很长的篇幅，是采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用以作为他们论述基础的相同的经济范畴，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在其中不乏出现这样的现象：似乎马克思的批判一般地说不再是针对古典学家的科学概念，而仅仅是反对古典学家之后“庸俗经济学”未发展的与重又倒退的、肤浅的和辩护性掩饰的

^① 参见普列汉诺夫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新德文的出版者的前言，维也纳—柏林1929年，第5页。

^② 参见自1880年起在这个书名下以大量的版本在全世界传播的通俗的纲要性著作；它对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获得了相同于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与《共同章程》对于马克思主义运动较早阶段来说的意义。

概念^①。

第六节 论《资本论》的经济学理论

我们在阐述《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时，只限于一些表面上非常抽象的、并且对于一般的意识来说直至今日只有以极度的努力才能了解的、马克思思维活动的结论。它们包含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核心并从而具有其基础性的与划时代的意义。那些自近百年以来使得这一学说今天在世界各地赢得千百万革命工人的实际拥护的东西，在现今甚至也迫使无产阶级运动恼怒的反对者不得不作出非自愿地承认：他们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宣布为他们反动的与反革命的意图的目标。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出版后不久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把下述几点称作是他的著作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①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②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下，第48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9页以下；《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VII-7节，第571页以下。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现象，马克思以二个详细的评注精确地阐明了他的理论同古典经济学的真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99页脚注31—33。

③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①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创新，对于被我们称之为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核心的东西——在关于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的、直接的历史与社会的科学中，批判地扬弃经济学——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所有这三个要素中，并不同时涉及突破经济科学的形式，而只是涉及进一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与基本原理；这种发展使得经济学的形式同借此所理解的内容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总的说来，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的“秘密”。在马克思通过使经济学范畴进一步精炼、概括、深刻和更坚定贯彻，而在形式上只是继续了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地方，他的论述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了批判的倾向。这些论述服务于把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引导到这样的界限，即在此界限上使得在其中所隐藏的社会历史实在的事实成为显而易见和可加抨击的。达到这种界限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的：这也许是把观察的角度从现成的劳动产品转移到用于制造它的劳动，或者从商品交换的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以及在那里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这或许是通过表面上纯粹谜语的改变对传统的经济学观念即把劳动工资释义为“劳动的价值”，作出精确的表达，即雇佣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出卖了“劳动力”②。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的完善，是直接地以古典经济学用以结束它的发展的下述两个规定性作

① 参见马克思1868年1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1页。

② 关于这一观点实质性的意义，特别可参见恩格斯的《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解释性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5页。

为出发点，通过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对“价值”的分析，以及将“价值”溯源于“劳动”。这两个定义以其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它作论述的形式，其一对于经济科学来说必然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另一定义只不过导致它的概念体系片面地拘泥于形式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两个定义，从而为理解政治经济学赢得了“枢纽”。^① 同样，两个其他的、包含在《资本论》中算作所谓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善的“崭新的因素”：统一地概括与彻底地坚持由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最初的社会主义对立者在内容上已大部分预先认识到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在经济学上把现代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合同”归结为“劳动力商品”的买与卖，只有通过从商品交换的领域和由此产生的关于“公平”与“不公平”法律与道德的观念，转移到从完全的社会意义上理解的物资生产领域，这就是说，从以商品与货币的形式出现的和由不同的索求者尚在争议的“剩余价值”，过渡到由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实际劳动者在那里存在的统治与压迫的社会关系下所从事的“剩余劳动”，才能获得它们的决定性力量。

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存在抽象形式（并且它以抽象形式早已被亚里士多德运用于古代的商品生产），并不包含着认识作为生产特别社会形式的资产阶级商品生产适用的出发点。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充分的。在这里使用价值只是在形式上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前提，然后把它完全置之度外，只有交换价值被当作经济范畴来对待^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页。

^② 参见李嘉图《原理》开头的三段。在第一段采用摘自斯密的引文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作了区分，在第二段把使用价值称作是交换价值“绝对必要的”前提，和在第三段彻底地撇开了这个前提（李嘉图著作，第一章第一页以下）。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经济学中并不涉及一般的使用价值，而是涉及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它的“价值”来说不仅是（经济学之外的）前提。它是价值的要素并且甚至是经济学的（从而像商品和交换价值一样，同时是历史的和社会的）范畴。物品对于任何人例如对于它本身的制造者来说具有某种可使用性，这一事实并得不出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定义。只有物品具有社会的可使用性（对于“别人”的可使用性），这一事实才得出作为商品特性的“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定义^①。

既然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经济学上被确定为社会的使用价值（“对于别人”来说的使用价值），那末创造这种使用价值的特别有用的劳动在经济学上同样被确定为社会的劳动（“为了别人”的劳动）。可见生产商品的劳动显得是双重意义上的社会劳动^②。它（同其他社会的生产发展阶段的劳动一起）作为创造社会的“使用价值”一定类型的“特别有用的劳动”，具有一般的社会性质。它作为创造一定量的“交换价值”的“一般社会劳动”，具有特别的历史性质。社会劳动的创造一定的人们有用物品（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的能力，表现为使用价值；社会劳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这种特性是从当前的历史时代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社会化的特殊形式中产生的）的能力，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的这两种社会性质的结合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或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7页和马克思在1881—82年摘录笔记《经济学笔记总号X》³¹，在对洛贝尔图斯和阿道夫·瓦格纳的论战中关于他的这一观点的精确论述。这个手稿即马克思最后的经济学著作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作为附录公开发表在1932年《资本论》普及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9页以下，特别是412—420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2节：《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页。

“商品形态”。

只有在这种批判的完善的形式上劳动价值理论，才成为经济学理论合适的出发点。在这种理论中劳动不仅是从形式上和从一方面被考虑，而是从它全面的物质现实性上被当作研究的主要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把价值溯源于劳动时，虽然在其始初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于脱离它的物质内容的过程中，因而是混杂的和摇摆的，但是他们考虑到了现实劳动的不同形式。因而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等等先后把用于出口工业、贸易和航海业的劳动，把农业劳动等，宣称为财富的真正源泉。亚当·斯密从不同的劳动部门最终地过渡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一般形式；在他那里除了拘泥于形式地、与李嘉图共同地把劳动规定为抽象的、从来不表现为“价值”(交换价值)本质，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规定性。他给劳动下定义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他又把同一劳动首尾不一贯地宣称为物质财富的或者说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这种在庸俗的社会主义中迄今无可挽救地继续存在的，并由敌对者不合理地强加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的。如果说，劳动在其特别的规定性上被视为有用的劳动，同样财富在其物质形态上被看作使用的对象，那末劳动就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然后就无须再作说明，为什么在今日之资本主义社会里正是那些迄今唯独支配着财产的这种源泉的人是贫穷的，尤其是无须说明，为什么他们总是“失业”和贫穷的，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为自己创造财富。)但正是在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这种不一致性中，存在着对人类劳动的现实性的回忆。斯密在称颂“劳动”的创造性力量时，并不是注意于把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和带来资本主义利润的、现代雇佣劳动者的强制劳动，看作是人类劳动的一般的

自然必然性。正如他对“大型手工工场”里的“分工”（他把这种手工工场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整体）无批判的颂扬，非常不适用于极端不完善的（通过商品生产为中介的）、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工形式，即不适用于从而以不易理解的方式变得模糊起来的、**人类劳动的一般社会形态**① 马克思后来说过：“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②

经济学理论在李嘉图那里的发展是较为首尾一贯的和片面的。它现时也不否认包含在“商品”即资产阶级财富元素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两个特性。但是它仅仅把交换价值算作是真正的经济学的“价值”。它潜心钻研它的“经济学”上“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根本不再回想到由较老的经济学家至少无意识地同时考虑到的、作为特殊有用劳动的另一方面，这种有用劳动在其产品中创造一个特定的有用对象：使用价值。更谈不上它似乎已将在较晚的经济学中模糊地彼此交错地、商品生产劳动的这两个规定性，用明确的方法论的意识彼此区分开来，并从两个方面在经济学上给劳动下定义。马克思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③

马克思重新把具体现实的劳动引入政治经济学。但它不再是以在较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呈现出的不确定与模棱两可的形式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即作为在物质上与形式上自由的、独立手工业师傅的劳动，他们拥有自己实际的生产资料，

① 参见《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以下，和《资本论》第1卷第12章，特别是脚注57和70，以及在那里引自斯密和弗格森著作的一些段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3页以下。

②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40—141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脚注31。

并将其劳动的产品作为商品为了充分的价值而与其他相等的劳动产品相交换。更确切地说，它在马克思那里以它当前的、一定的和明确的形式，表现了生产“别人的商品”的劳动；这就是说，它是同物质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它在形式上是按其充分的价值获酬的，实际上是受剥削的；形式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被奴役的；形式上是孤立的，实际上是社会的劳动。这种雇佣劳动者实际的劳动资料，从而他们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他们劳动的通过社会分工而成千倍增加的生产力，以资本的形式同他们相对立^①。政治经济学现在不再是关于商品的科学，并从而仅仅间接地是关于抽象与片面地理解的“劳动”的科学。它成为关于社会劳动，这种劳动的生产力，关于这种劳动通过当前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与束缚以及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这种关系以革命方式进行破坏的直接的科学。为了确信经济科学的这种完全改变了的性质，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足够了。同时最初对一般的经济学范畴“商品”与“货币”以及“由货币转化为资本”细致入微的分析，仍然在表面上还停留于“嘈杂的、表面的和有目共睹的商品交换或流通的领域”。实际上它彻头彻尾地服务于批判地澄清这些一般的经济学范畴，揭示它们的“拜物教的”表象和指明在其后面隐藏的、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它在它的最后一节论述具有完全特别性质的“商品”：劳动力商品的买和卖，已在极高的程度上变得明朗化，并最终离开商品交换的领域完全过渡到另一个范围：“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②。作为《资本论》经济

① 参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308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

理论的对象从这时起不仅在专门为此所设置的第五、八、十一、十二、十三等章里(它们合在一起在数量上已占第一卷的一半),更精确地看来而且在全部著作中,①表现为劳动过程;或者不过是有关它的另一个名称:在其自然的与历史的、即同时在其经济的与社会的发展中的物质生产。只是在名义上“资本”(就象霍布斯的政治著作以《利维坦》命名一样)构成马克思新的经济理论的对象。它实际的对象是“劳动”;它当前处于资本压迫的经济形式之下,它朝向一种新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解放的、直接社会的与社会主义的形式发展。

第七节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正如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的完善是从商品的价值这一概念出发一样,我们从狭义上称作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东西,即从经济学范畴过渡到在其后面隐藏的历史与社会的联系,则围绕着“商品”;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看作是最終取得的与对一切时代有效的、理性的与合乎自然的经济制度;它在结束它的理论体系时把一切经济概念溯源于价值,把一切经济规律溯源于价值规律。它把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买与卖)中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解释为不依赖于它特定的有用性(使用价值)、而只取决于为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量。它坚持这个定义,在原则上不考虑多方面同它相矛盾的表面现象。但是它并不超出这个范围。正是它最杰出和最彻底的、认清了价值和价值量的经济内容的代表人物(不像那些认识肤浅的人当时所做的那样,把“价值”只看作任意的社会形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9页以下。

式)，对这样的实际情况，即劳动表现为价值、由它的时间长短来衡量的相对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关紧要的。

只有对于在理论与倾向上真正超出资产阶级视野的研究来说才可能做到：把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视为最后总结的范畴继续进行划阶段的概括，并从而把它作为经济学范畴加以扬弃。在马克思批判的理论中表现为最一般的经济学范畴不再是“价值”或由劳动时间衡量的“价值量”，而是商品生产的劳动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或者商品本身的形式。这个最抽象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经济学理论范围内实际上构成概括的最后界限；它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反过来形成特别的标志，通过这种标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被历史地评述为社会生产的特别方式，并从而同时表明了它的阶级特性。从一种研究方法向另一种研究方法的过渡，内在地构成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著作的基础；而这种过渡是明显地在马克思对经济学表态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论》第一卷重要的一节里实现的。这一节甚至带有相当深奥莫测的标题：《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①。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按其最简单的表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1章4节。《资本论》现有的正文中两个其他有关的主要段落〔第3卷下第48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9页以下）和《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VII节I，带有由编辑者考茨基本人加上的标题《资本偶像》〕只是不完全地表达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这里也像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人们可正确地只把马克思本人完成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以及恩格斯在由他从马克思较晚的手稿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中对它所作的补充，看作是马克思观点完全有权威的论述，而其他作为《资本论》续篇的著作（这就是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3卷和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仅按照它们的实际状况来看待：来自较早手稿的较旧表述，而这些表述已被在《资本论》第1卷里完成的论述部分地超过了。由恩格斯和考茨基所利用的、作为临时性笔记的较老的手稿，通常并不包括马克思为结束编辑加工而习惯于保持的对其思想最精确的表达（对此参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的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页。由马克思本人在最后时

述就是：人手的产物虽不是（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自然地，但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别社会的条件下会具有奇特的性质；这种特性以根本的方式影响着参与的人们的全部行为。劳动产品一旦不再直接为了使用而是为了出卖作为“商品”被制造出来，它便带有这种特性，并被政治经济学家称之为它的“价值”；这种特性既不是产生于劳动产品的质料，也不是产生于它特别的有用性，也还不是产生于为制造它所耗费的劳动的特殊质量。在劳动产品作为商品交换中显示出来的价值关系，根本不表达物的特性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在商品生产中进行合作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是特别的社会形式，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发生的基本关系，在事后正是以这种颠倒的形式使参与者认作物的关系。由于他们使自己有意识的行动取决于这种观念，因而事实上他们像野蛮人仰赖于偶像一样，受到自己双手制作品的统治。商品，以及以更加奇特的形式充当一般的交换手段的特殊商品——货币，此外一切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资本、雇佣劳动等等，都表现为当前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拜物教的形式。

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的东西，只不过是科学地表达了同一事物，即他以前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

刻所作的改动，对于正文中所探讨的题目具有特别重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对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阐发经常保留于脚注中。在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可供付印的手稿时，关于《商品》的第1章情况就是这样；它后来在《资本论》里用作论述这个题目的样板，它却是在最后时刻加进原稿中去的；这个原稿关于这个题目只是在最后的有关《价值》的一节里包括了一些简短概述主要论点的句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0页和305页）。另外，在《批判》第1章里用以论及在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商品的神秘化”新题目的几句话，同样是在最后加工时扩展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独立的研究；它现今构成了《资本论》第1卷第1章结尾的一节。

时期把它称为“人类的自我异化”^①，并且它实际上还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对于这种特别的、使哲学“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遭受的困境来说的基础^②。但是马克思已在当时远比费尔巴哈和其他探究“自我异化”的左派黑格尔分子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哲学“范畴”在当今社会里所表现出来各种形式，如“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涉及“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涉及“十分实际的、十分具体的”事物^③。如果说譬如这种“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里表现为拥有和不拥有的对立，那末在这里所涉及的决不是思维的范畴。“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④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① 哲学概念“异化”最初明确地运用于货币、价值、信贷等等经济现象，存在于马克思1844年的摘录笔记中对老穆勒一本著作的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42页，和有关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同上书第49页以下，特别是89页以下）。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里一方面阐明，劳动者的异化、外化，不仅存在于他同其劳动产品的关系中，而且还存在于生产行为之中，生产性活动本身范围之内（参见同上书93页）；另一方面明确地强调这样的事实：表面上如此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形式如信用和银行业，被圣西门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美化为“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分离的各个阶段”，而实际上这却是“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1—22页）。在此时期马克思摘录了（同上书第59、71页）对于他后来的关于剩余价值（即关于特别不合情理的形式，商品拜物教把它称作是“商品劳动力”）理论来说特别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贝魁尔关于创造财富的“魔力”的表述。这种创造力是通过劳动即通过人赋予材料的死的要素的。

② 参见黑格尔《现象学》，出处同上，第594页，马克思对这一段落批判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6—181页。

③ 参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④ 出处同上52页。

只通过思想上的“扬弃其对象性”，这就是仅仅对于哲学的思想家的意识来说，扬弃这种异化的对象化的形式^①。与此相反，唯物主义辩证法家马克思当时讲明，为了扬弃这种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的”观念中表达出来的现实的异化，纯粹的思想是不够的，为此首先需要通过社会的行动实际地、具体地扬弃作为基础的现实制度^②他还提到必然进行这种彻底变革行动的社会主体：“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以及由他们建立的“团体”^③

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并已在1859年《批判》等著作）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虽然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批判地抨击的真正要点，在现今仍然构成对人的自我异化作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中直接的自我外化所采取的最显著形式的揭示；但是在其后面隐藏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阶级性质的商品劳动力的特殊拜物教，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后表述中仅表现为在商品本身形式中已包含的一般拜物教的派生形式。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抨击由部分地扩展为全面地对在一切经济范畴的拜物教形式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即整个当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奠立其上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9页以下，特别是170页。

② 出处同上，170页以下。在这里引用的上述两部1844年的著作，对于从经济学上运用“自我异化”这一概念，预先作了这样的批判，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年之后在其共同德国的意识形态的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对左派黑格尔分子在此期间，关于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总是包括现实内核的哲学概念“异化”所作的一切思想阐释，普遍地进行了批判。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66页以下。

端的抨击。马克思只有通过将全部经济学范畴作为唯一的巨大偶像加以揭露，才能在他新的理论中真正超过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一切形式和阶段。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在其较后的发展中，对这种个别的拜物教观念例如原始的货币体系的观念，它“不把金和银看作它们作为货币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和重农主义关于“地租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幻想”。通过有关这里呈现出来的关系的批判观念已把它们克服了。它在其发展的顶点上(在李嘉图那里)，已经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以致二者都归结为剩余价值”。然而，甚至它最杰出的代言人仍然拘守于或重新陷于由他们批判地剖析的资产阶级的现象世界之中。这是由于他们从来都未曾达到，借助于派生的形式同时批判地分析经济拜物教最普遍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表现在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的价值形态和商品本身的价值关系之中^①。古典政治经济学卓越的理论技能在这里遇到了它的历史的局限性。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的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②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这个基本形式，表述为(1) 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在物质生产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出现，并且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从而也对于这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2页以下，和《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18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种资产阶级意识的科学形式——政治经济学来说，它在表面的商品价值关系(1)中，颠倒地即以拜物教的方式反映出来。就此而言，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包含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从而也同时包括了在《资本论》中含有的全部理论的核心以及对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表述。

第八节 价值规律

在商品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劳动实际上的社会化，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是不依决于单个商品生产者的意愿与认识而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同时既是私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有调节的又是无调节的生产。在每个经济阶段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社会有用的物品，这似乎是按照未认识的和不可认识的命运(“运气”或“境况”)安排来确定的；但是单个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只是在事后通过他的商品有销路或无销路、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在破产和危机中对他有利或者有害才得以了解：他在行动上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与那种资本主义理性的未认识的法则、经济“计划”相一致。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以类似的方式谈论着这种它从未识破的联系。它谈到了自由竞争的“游戏”，谈到了市场的“自动控制”或者说“价值规律”，这个规律对于生产和流通的运动来说，就像重力定律对于物体自由降落来说，以同样的方式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在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中起作用的是一种未成文的价值规律，即等同价值的产品相交换的规律。然而它不是作为永恒的和不变化的自然规律，而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一定的历史时代有效的“社会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论述“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

指出：为了促成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这种经济基本规律和由此导发的其他“永恒自然规律”的产生，这就是说为了要一度通过或多或少暴力行动导致建立它们发挥作用的实际基础，这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努力（对劳动者的实际的劳动手段的剥夺构成整个过程的基础）马克思同样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也只是在不断的摩擦、波动、损失、危机和破产中实现的。他说：“在私人劳动产品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①

首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特别是各个流派的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者，现今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危机状况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与国务活动家本人，也企图通过改善“资本主义的组织”以“自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始形式，去挽救有弊病的社会劳动的组织；这种企图只不过是幻想而已（虽然它像资本主义那样由来以久，并且不顾在理论上受到反驳和在实际上遭到破产而顽固地反复出现）。

通过那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经济调整在现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危急的发展阶段，到处在老的和“新的”、极权主义（1）和仍然是民主主义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对那种孤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只是通过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合作的客观形式（它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也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理想典型的、在日常现实中从未完全实现的形式），只不过是进行“补充”、“改正”和“遏制”。这种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经济调整的日益增长的部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作暂时缩减资本主义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生产无政府状况个别严重的后果。因此这并不会触动以商品生产的“拜物教”形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性。倒不如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在整体上迄今实行“社会化”所采取的唯一形式，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可能的“劳动组织”将会被废止。

在当今时代通过资本主义本身必然的发展，将会使得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范围内唯一可能的社会经济组织(2)形式日益遭受破坏。它决不会通过在“国家”和“社会舆论”中组织起来的总资本家的、日益增长的集体理性，逐渐地消除资产阶级社会里孤立的商品生产者动物般的争取生存的斗争。它的实现是通过资本日益增强的积聚与集中、巨大的工业与金融康采恩不断增长的垄断倾向、国家越来越理所当然地对在经济危机中破产的企业进行整顿的要求以及相对于和平生产来说越来越加强的直接与间接的军事生产对国库资助日益提高的要求。在逃避威胁性越来越大地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成为问题的危机和拼命地企图克服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现存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越来越被迫通过不断翻新地和更深入地“干预”它自己的生产方式的内部法则和不断增强地改变它“自己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因而准备着越来越全面和更为巨大的危机，并且同时减少了(3)以前所支配的为暂时克服危机的手段(3)。采用“和平”的组织它组织了战争。尽管如此，只要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那末一切拜物教性质的经济学范畴：商品、货币、资本、雇佣劳动、生产和出口贸易增长与减少的价值总额、企业主的赢利、信贷等等，简言之马克思在其哲学阶段称之为“人的自我异化”和在其批判的科学阶段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所有东西，从而还有拜物教的价值的“社会自然规律”，对于现今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来说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依然

是无改变地存在着。一切在此基础上为完善(lucus a non lucendo!)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企图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在其中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性质更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越来越充分地把单个资本主义企业和康采恩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无组织性在整体上更清晰地表现出来；最后已有正式的因素逐个地从这种发展中摆脱出来，它们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全面变革现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后，在消除它们现今不可避免地带有拜物教特征的情况下，可运用于建设一个真正的生产与劳动的社会组织。

由于物质生产不完善的社会组织，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暂时还存在着“颠倒的”形式；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参与者的意识中就是以这种形式经过“商品”的“价值关系”、“货币”的“价值”等等曲折道路反映出来，并且以或多或少完善的形式，也以经济科学的范畴重复出现。只有通过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而全面地消除商品生产，商品的拜物教现象才会随之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①

第九节 价值和剩余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借助于商品的一般拜物教性质，揭露了这种拜物教通过把劳动者变为商品而采取的其他发展了的形式。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页。

它借助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历史与社会的性质，首先揭示了它的阶级性质。

一旦在较早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古代生产中)偶尔出现的商品生产，扩展为普遍的商品生产，这就是说，扩展为在其中产品一般地都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制度，那末在作为商品制造、出卖和使用的物品当中便出现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为了工资而把自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的直接生产者的、人的劳动力。一般的商品生产在时间与事实上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恰好相吻合。它在历史上是开始于农村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者同他们实际的劳动资料相分离，以及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变成非劳动者的“资本”。在这种事态下甚至还存有法律上的幻想：劳动者还能够“自由地”支配着他自己的劳动力，这或者由单个劳动者或者由劳动力商品的拥有者联盟(工会)来支配。这种个人的和集体的、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售条件的讨价还价，完全属于拜物教的现象世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无产的雇佣劳动者作为单个人通过“自由的劳动合同”把他们的劳动力按时间售与资本主义企业主，而他们作为阶级随同实际的生产手段一起，则从来和永远属于支配着实际劳动手段的有产者阶级的财产。

可见，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宣告的东西，并不是完全真实的。① 资产阶级通过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还不是以露骨的“公开的剥削”取代虔诚的、骑士般的和小市民的中世纪掩饰了的剥削形式。它只不过是另一种狡诈的与难于揭露的、掩饰了的剥削形式，取代用宗教与政治幻想遮盖的剥削。如果说，在以前时代公开宣告的统治与奴役的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

关系显得是生产的动力，那末在“贸易自由”的资产阶级时代则恰恰相反，劳动产品的生产对于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压迫与剥削关系来说成为了托辞与掩饰物^①。掩饰这种实况的科学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会明了下述特殊意义，即从理论上揭示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对于在当前社会中受压迫和奋起反抗对它压迫的阶级的实际斗争所具有的意义。在现实中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工人作为纯粹的商品这种实际状况与在意识形态中同样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善良意图与纸上声明(按其观点工人不应被当作纯粹的商品来看待)之间^②，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种矛盾不加掩饰的表述将导致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它在实际上对维持这种矛盾状况的利益，反对它在理论上对保持那种拜物教现象的利益；这种现象说明了因此在社会生产力现今阶段上已存在的、在重大经济危机中带来灾难的发展障碍和生活干扰，由人的行动的领域转移到自然存在的、不可改变的、物的关系领域之中，从这种实况中使得社会科学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和为了改变由其表达的社会状况的实际趋向，在通过当前社会制度享有特权的和其利益在于维持这种制度的阶级中，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者。由社会直接地组织劳动和克服商品拜物教，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这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表现并同时作为它的手段之一，则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只是由此出发才产生(1)价值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② 参见《临时政府法令》第56号1848年3月2日，它决定：“废除由……包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和1919年国际联盟条约(凡尔赛条约，第427条)，它提出下述规定作为调整劳动关系新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劳动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商品或交易货品”。

剩余价值学说充分的历史与社会的意义。不同质的劳动的“等同性”是作为“一般劳动”总额中数量上有区别的部分数额，“一般劳动”成为经济学概念价值的基础；这种等同性并不构成商品生产的自然条件，从而倒不如反过来说，通过作为商品的必需货物一般交换与生产，这种等同性才得以确立，并且在事实上除了表现为商品的“价值”不可能表现为别的东西。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的“价值”还原为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的数量，就已经不是依据于自然科学的，而是那种（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意识的）历史的与政治的前提。“劳动价值”的经济理论产生于社会生产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在此阶段上人的劳动不仅是作为范畴而且也在实际上，不再是同个人或狭小集团似乎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此阶段上在消除行会的限制之后在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特征下，每种特殊的劳动本来就与任何其他特殊劳动相等同。

但是如果说在早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在这方面总算还发表一定的、（由商品交换本身中产生的）关于“自然的”等同性的思想观念，那末无论如何对马克思批判地发展古典劳动价值论所提出的如下幼稚的异议是不恰当的，即将近百年以来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现今通过指出不同的劳动事实上的不相似性，用这种异议阐明客观价值学说“前提”的“不正确性”。当某些善意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者通过如下方式来纠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这种所谓缺陷，即他们试图把在每一特殊劳动产品中所包含的有用劳动，现在实际上阐释为一种在任何自然科学意义上可测定数量；那末这恰如在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讨论中所表现出来那种笑话：“一人给母羊挤奶，另一人则用漏筛接着”（康德）。按照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劳动级别区分的重要部分，虽然“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

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①。姑且不论这点，但为生产各种有用物品所耗费的劳动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事实上是不同的。这种有用劳动的差别性对于商品交换和以此为中介的社会劳动分工来说，是必要的前提。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由于社会需要的和为满足社会需要而从事的有用劳动的差别性，便产生了质的劳动分工的“自然形成的”体系。只有在这种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在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中，有用劳动的质的差别正常地退居于它的仅有数量区别的后面，作为制造全部有用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总额中大小不同的部分数额，并从而开始了在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找到其理论表现的状况^②。不再适应于这种科学思考勇敢精神的追随者在较后时期如此激动地抱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在把商品的价值关系溯源于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量时，借助于“强调夺理的抽象”把不相同的东西等量齐观；那末对此可作这样的回驳：这种“强词夺理的抽象”根本不是首先与主要地产生于经济科学的定义，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实际性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与之相比下述情况显得只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地说无关紧要的结构上的缺陷：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原则，在其实践上并不是在每一个别场合下而至多是从大体平均计算来看得到实现。

同一切在这一或那一情势下散布的对立意见相反，马克思著作的意图从来不是：从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提出的一般概念价值，通过逐渐加入更详细的规定性，最后得出那种商品价格直接的规定性。对此后来瓦尔拉(Walras)和帕雷托(Pareto)提出了他们的百万方程式的幻想体系；为了以数学的精确性计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4页，脚注1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页以下。

算出某一特定商品的价格，人们“只”需要在此体系中加入必要的百万个常数。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极大的误解；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数十年之后在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整个教条主义的论争，围绕在第三卷中包括的关于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与此相联价值转变为商品的“生产价格”的论述，是否和在什么意义上仍然与第一卷里“价值”的一般规定性相一致。马克思早在第一卷出版之前业已讲明，在由不同有机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中，商品按价值规律所规定的“价值”不再直接地（即不在个别场合也不在通常情况下）表现出来，而只不过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同其他一系列因素一起加入其中^①。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理论中价值规律的意义，根本不在于商品的价格由价值来直接决定。（2）在这里存在的问题也不能通过援用价值规律在商品价格的一般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来加以解决。（2）对于这种发展来说，随着资本的不断积聚而日益增长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由此决定的商品价值的经常下降，构成了决定性的因素，（3）相反地人们必须从下述观点出发：即使由垄断的与行政管理的方式取代市场方式决定价格的、（4）不断增强的倾向，越来越多地削弱并最终完全中断价值的这种间接作用，然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实际前提也不会消除。价值规律实际的、历史的与社会的意义，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规律在它最初的、17、18世纪的发现者的论述中所具有的拜物教假象的完全克服而产生。它与完全脱离经济现象的历史与社会基

^① 参见1867年6月2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0页以下。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1894年）后资产阶级批评家“揭露”了第1卷同第3卷之间表面的矛盾，他们用以作为依据的事实真相已由马克思早在36年之前用文字予以澄清了。

础的、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家的观念根本毫无共同之处，庸俗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价值计算”中，也就是在为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里谋求其私人利益的商人的实际估算、或者为一般地操持着增加资本主义财政收入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的经济政治措施而创造任何的理论基础中，看到这种价值规律的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他的价值学说的最终目的无宁说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就是说同时揭示它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卡尔·柯尔施〕”^①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更清晰地讲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露〔在现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卡尔·柯尔施〕一切对抗和剥削的形式，以便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它们”^②。（8）

通常被看作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真正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其在马克思那里出现的完满形式既不是简单地经济计算的范例（它核算出资本主义按规定对工人所进行的诈骗），也不是从道德上利用经济学，要求资本退还工人“完全的劳动收入”中被侵吞的部分。更确切地说，它作为经济学的理论是由此出发：资本主义企业主通过公平的交易“正常地”获得在其企业中由他利用的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在此交易中工人在工资里换进了对于他出卖的“商品”来说完全的等价物。资本家在此交易中的优势不是产生于经济（*ÖKonomie*），而是产生于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他作为实际的生产手段的垄断占有者，可能把为了按其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买到的劳动力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而用于生产商品。在通过在资本主义企业是利用劳动力而获得的商品的价值同为这种劳动力而支付给它的出

① 参见《〈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以下。

②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

衡着的价格之间，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没有经济的或其他可合理确定的关系。可见，工人在其劳动产品中超出对其工资的补偿而创造的价值量，或者说为创造这种“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剩余劳动”量，和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这就是对一定时期和一定国家各时期、适用的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不是经济计算的结果。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结果；正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机制中并没有设置对于提高剩余价值率来说的客观限制，因而这种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一极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在另一极同时的贫困积累，采取越来越尖锐的形式，并最终爆发为公开的革命。

第十节 “社会契约论”

由于完全揭露商品生产的拜物教现象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对立，由革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提出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新的基本概念才获得其充分的意义。当新的资产阶级原则的代表人物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思想时，即“市民社会”同国家和其他上层建筑相对立首先包括新的、商品生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1）这样并不因而（2）就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关系的历史社会性质^①。（2）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中从其开始（在阿拉伯人伊本·赫勒敦（Ibn Chaldun）和在意大利人维科（Vico）那里）直

^①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

到它古典学说的形成(通过18世纪的英国人和德国人),显然的不明确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说它的代表人物把由他们发现的“市民社会”十分清楚地同旧的封建国家制度区别开来,那末他们在这方面更加无所顾忌地把它与新的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他们把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设想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整体,经过社会关系的形式达到理性的人类个体,或者是和谐地以充分自由的形式“缔结契约”(就像社会契约论肤浅的代表者所论述的那样),或者是(像自然法理论较深刻代表人物:霍布斯、卢梭、黑格尔所阐明的那样)按照强者的法律“缔结契约”。(1)

按照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则与此完全相反。马克思这种理论具有对于当代无产阶级的运动来说,正如卢梭完成的“社会契约”理论对于过去历史时代来说相类似的意义。“社会的”关系构成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并且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中“颠倒地”,即以物的伪装表达出来。在这些社会关系中,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到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者所看到的、社会关系的另一种类型。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揭露包含着合理地与经验地对下述问题的解决,即这种问题是18世纪社会理论家根本没有提出的;虽然它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与社会学说(浪漫派、历史学派、有机的国家理论、黑格尔)提出,但是,只不过以或多或少神秘的形式加以解决。黑格尔将这种事实(即世界史是由人们创造的,但是在其中可看到、更加普遍的、并非由任何人事先规划的联系)之间表面上的矛盾,与其说消除,不如说辩证地推到极端(期待着它因而自行破灭!);这种方式被马克思用以当作阐明在商品形式中包含的“秘密”的手段之一。黑格尔曾说过:“在世界史中通过人们的行动还会产生某些根本不同于人们所企求与达到的东西,不同于人们直接意识和希望的东西,人们实现他们的利益,但因此还完

成了深藏其内的其他东西，但它们处于他们意识与视野之外”。①马克思也谈论这种矛盾。它表现在人们将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地和不断反复地作为商品按一定的价值关系进行交换，并且总的说来他们只是为了这种交换而进行生产；他们正因此才在实际上造成了质的与量的社会分工，而这种分工对他们来说表现为物的伪装，即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和一定的商品价值关系。“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②他继续通过如下多次反复的阐释而加强在此表述中所包含似非而是的见解：在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范畴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情理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作为基础的现实不合情理性必然的表现，因而在这些经济学范畴中对于孤立的商品生产者来说，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③。

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见解对于马克思来说也不过是一种手段；借助于它、他使得那些拘泥于资产阶级观念的读者，认清初看起来如此不言自明的和屡见不鲜的物品例如商品及其一般形态中的“秘密”。然而在揭示这个秘密时所涉及的问题不再是黑格尔的任何概念变戏法，而在于完全合理地与经验地说明历史存在的事物。如果说18世纪的预言家们（斯密和李嘉图就是立足于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把摆脱以往时代的自然联系和中世纪封建条件的个人，看作是一切社会生活自然的出发点，那末对于单个的人来说不取决于他意识与愿望而存在的社会联系，则构成新的社会观起点。如果说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经济的”事物与联系对单个市民来说是外在的，即对于

① 参见黑格尔：《世界史哲学》总导论I，第2节：《个性》。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91页。

③ 出处同上，第89页。

他的私人目的来说是作为手段，对于他的行动来说是实际的强制；那末依据新的见解从事各种行动的人们从来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活动的，而这种社会关系是从物质生产当时的发展阶段中产生的^①。这种历史的关系及其历史的发展虽然是由人们自己通过其联合的行动而造成的，但是它们对于单个的人来说是独立地并就此而言是“客观地”存在的，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就是这样。然而在其中不再涉及执行任何超越人世的当局的意志，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按照他的论述，它“既是狡诈的又是有力的”，并通过如下方式来贯彻它的意志：它使得人们在追求他们的私人目的时“一项接一项地无休止工作”，并且没有自己的直接干预仍然使“它的目的得以付诸实现”^②。黑格尔的这种意见从基本上说，无非是从哲学上颂扬资产阶级为自由竞争祝福的、最平凡的观念。与之相反，按照马克思批判的学说在这种所谓的神秘中所涉及的问题，无宁是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缺陷，即这种生产方式与一种不是从头脑中构想出来的、业已清楚地显现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客观发展和现实斗争目标的、通过劳动的直接社会化而调节社会生产的更高形式相对比而言的缺陷。政治经济学的公式是“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③。资产阶级社会的这样的最高理想，例如自由的与自我决定的个人、一切公民在行使其政治权利中的自由与平等以及一切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现今仅仅表现为来源于商品交换的对商品拜物教的补充概念。它们同商品拜物教一起构成了对生产关

① 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里对这种联系作了出色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4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卷第209节。

③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

系一定类型(它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已蜕变为日益觉察到的桎梏)的表现,即构成在意识形态上对有缺陷的社会生产调节的美化。只有排除对当前社会制度实际的社会基本关系的意识,才能在资产阶级世界观中保持这样的幻想: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似乎是由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形式。只有通过以拜物教方式改变这种关系,即在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商品劳动力”以“自由买卖形式”卖给“资本”所有者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才可能谈得上在此社会里的自由与平等。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说过,资产阶级法律“以同样的威严禁止富人和穷人在桥下睡觉”。

第十一节 结论、修正、展望

马克思的批判使得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它言过其实的有效性的要求,并且指明了它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政治经济学便由无条件的和不受时间限制的**科学形式**,被解释为由历史与社会条件限定的形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哥白尼式的转变”正表现于此)。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它是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形式中产生的并构成对它的思想补充。从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产生了由它提出的原理已变化了的作用方式。一方面由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首先是由基本范畴商品与货币所固有的“拜物教”性质,经济学的论述不再直接地涉及实际的对象;经济学知识所认定的“对象”本身只不过是处于它后面的、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进入的一定关系的、由物掩饰的表达。另一方面经济学范畴尽管它们具有“拜物教”性质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性质,而形成这样一种必然形式,即采用这种形式那种标明资产阶级生产关

系特征的不完全的社会性的、特别历史的与历史上过时的形式，便在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出来。所以。经济学范畴虽然不像卓越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于认识经济事物本身来说是永恒的有效形式，然而“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按照这部著作第三卷精确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它们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和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有效的“社会自然规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无产阶级实际的革命斗争仅仅是受到攻击与动摇而不是被彻底推翻；那末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上已巩固的思维形式，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也只能是受到批判而不是最终地被超越。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进行到底；这个革命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在完全进行这种革命后才开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中，随同商品生产的拜物教一起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科学将消溶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理论与实践之中^②。

政治经济学以与其时代相适应的方式，表述了它研究当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物质基础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它为此采用的概念与论断迄至当时尽管带有拜物教的形式，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来说，仍然是它的科学认识的必不可缺的辅助手段；这种社会理论从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立场出发，从历史与理论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马克思作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3页。

②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页以下。

为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家在其理论工作中首先是经济研究者。他没有使经济学湮灭于历史、社会学和空想主义之中，而是相反地为了按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得对社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般的与不明确的形式精确化。马克思在其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发展中前进得愈远，就愈加不愿让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结论中已存在的、对于精确剖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来说特别重要的资料，只是由于缺乏彻底的完善和批判的利用，而白白地存放着，或者由古典经济学的后继者为对资本主义体制作肤浅的辩护而滥加利用。尽管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作了历史的批判，但他对它较之对所谓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处于一种无比积极的关系。这个学派通过对所有确定的经济学概念的解析，阐述了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自我解体与衰退。马克思在他最初的哲学阶段批驳了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的思想方法，并且揭示了在“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范畴后面对劳动者阶级实际的压迫与剥削。同样他在后来的时期虽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概念的“拜物教”形式作了各种批判，但也更尖锐地驳斥了那种肤浅的“社会学的”观念，即它相反地“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①（马克思在70年前用这一简短的评论摈弃了当时仅有几个门外汉维护的、“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的一个观点，这一简短评论在今天或者说正是在现今作为预先对货币主义理论家和信贷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理论观点与实际建议的批判，重新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所有这些观点与建议归结起来，就是把商品的价格和特别是货币仅仅当作肆意的、按习俗的和可随便“处置”的形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脚注32。

式来对待。)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像布朗基这样的革命暴力的实践家无理由加以指责，但是他们在所有适当的场合^①指明这种社会学的“暴力论”在科学上的空泛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理论中出现了那些一般“进步的”或者半社会主义面貌的人的、不知不觉地与历史发展现实推动力相对立的倾向；这些人对经济学完全无知，或者充其量承认某些一般的与不可改变的“经济学自然规律”，并把生产、阶级关系等等形式实际的产生、变化与发展，归结为纯粹的暴力、政治等等，以便最后从他们方面由这种“原始的”暴力诉诸于理性、正义、人性或类似的非物质的与无产阶级的有关当局有组织的力量。与这样的蔑视经济的社会学家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信奉在资产阶级古典学家的经济学价值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分析中已包含的、有关资产阶级社会更深刻与更丰富的历史与社会的认识。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同工人运动过去发展阶段“教条的”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直接相对立地产生的。它始终是一切纯粹“从头脑中”构想出来的结构体系的深恶痛绝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那种至少基于一定的历史与社会事实(1)的经济科学认识，与任何把当前现实的生产形式同仅仅想象的未来生产形式“批判地”相对立比较起来，对于它来说更具有无比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在其论述过程中采用的如下方式，(2)同这种轻视一切仅从理论上构想出来的结构体系的作法是并不矛盾的，即他为了更广博地阐明他的理论立场有时甚至采用将当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其他的、历史过去的和想象中未来的社会生产形式作对比的方式。(2)与此相关联的首先有出自《商品的拜物

^① 参见首先是，恩格斯1878年反对杜林的论战著作中精采的三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73页以下。

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的四个简短段落；在那里马克思为了排除“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使四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相继“出现”：鲁滨逊的、中世纪封建生产方式、农民家庭的农村家长制经营，最后“换一个方面”“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①具有同样性质的是对下述简单的生产组织的详细论述：即那种“原始的、小规模印度公社”之一，在那里“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论述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整个理论来说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这种论述在《资本论》的理论阐述范围内服务于再次阐明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在工场内部的分工同社会内部（通过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之间所存在的矛盾^③。

同他的其他精确论述相反，马克思大多情况下以较不确定的和一般的形式进行的所有这些“对比”，毕竟不过是以类似的方式，即由他同样多次运用的、把经济的“商品拜物教”同“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④所作的对比，再次明确地阐释了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中不仅是经济学范畴，尤其是在其中表达的、这种特殊历史的社会形态的实际关系所固有的“荒谬性”。为了批判地解析这种“荒谬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宗教批判与经济学批判中都需要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满足于“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而是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⑤。借助于经济学范畴的拜物教形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以下，还可参见395页以下。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9页以下。

④ 出处同上，第89、96页以下。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脚注89。

式同时把握它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与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为了对当前历史的发展作唯物主义的研究而利用在其中所包含的认识内容，这种方法也构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马克思在探讨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提出的原理直到它最后的理论结论之后，只在《资本论》中一些篇幅不大但内容重要的段落里，最终完全突破了经济学理论的框框，并且从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在两个经济学范畴“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下实际隐藏的两个社会阶级的对立与斗争的经济和经济批判的论述，过渡到直接的历史与社会的论述^①。

例如与此相关的有在第一卷第八章里的两段，在那里马克思在论述经济上不确定和不可确定的工作日界限之后，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历史上对标准工作日的规定描述为社会阶级的斗争^②并且最后号召工人为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而联合为统一的阶级行动^③。此外与此相关的首先是第一卷末章之前的著名一章《所谓原始积累》^④。如果说，通过对价值与劳动、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积累的经济学分析，关于资本的产生已讲明了从经济学立场可能说明的一切，那末在这里最后仍然留下未予解决的问题：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之前，最初的资本和在进行剥削的资本家同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之间最初的资本主义关系是从哪里产生的？对于这个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未予解决而留下的、从经济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之前的论述中反复不断地进行了研

① 有关下面论述参见科西版《资本论》的导言，柏林1932年，第19页以下。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2页。

③ 出处同上，第335页。

④ 出处同上，第24章（以及实际上与此相关联只是形式上独立的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

究^①，正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同时也是在整部著作的结尾，马克思把它不再当作经济学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在直接的历史研究中得到极为彻底的说明，并且最后不再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获得解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发展为范例从过去与当前的历史中得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将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如果说这种结果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发展中“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产生，那末为了它的实现就需要一种实际的社会行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②正如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资本论》整个的、贯串于三卷中理论的论述与批判，以同样的方式最后归结为鼓动革命的阶级斗争^③。

在这种极度的提高《资本论》理论的革命原则时，更精确地看来并不涉及完全放弃经济学理论，而只是涉及最后提高它批判的运用。资产阶级意识的历史与社会的局限性，使得无产阶级新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可能非批判地利用(3)资产阶级经济学拜物教范畴；这种局限性最终还表现在：以这种经济学形式根本不再可能合理地提出一定的经济学边缘—最后问题，更不必说可能把它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运用一定的范畴，以对他们时代来说理由充分的方式说明了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并且在有限的领域里在较短时间范围内经稍加批判的校正，它们在今天还可对科学地剖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定部分，提供价值充分的手段。(3)这些范畴对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35、711页。

② 出处同上，第831页。

③ 参见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0页以下。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1页。关于由马克思计划进行的、只留下片断的最后一章第52章《阶级》所作的说明。

于进一步扩大的研究，即包括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产生及其衰落，以及它革命地过渡到直接的社会调节生产的更高形式在内的、全部历史发展的研究来说，则是不适合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后期越来越强调指出的那样，对于向后追溯到原始历史和向前延伸到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历史来说，它们尤其是不适用的。

第三部分 历史

第一节 自然界和历史

马克思使包罗万象的、迄至当时由一系列完全不同的老的与新的科学探讨过的经验领域的一切现象，无条件地服从于他在理论上批判的、在实践上革命的社会研究新的唯物主义原则。从一个方面来看，他并不承认一种“更高级的”、脱离历史与社会范围的所谓“精神”生活的领域与现象。所有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观念，所谓意识的整个内容和这种意识一切哲学的伪装，例如客观的与绝对的精神、观念、类的理性、一般意识等等，全部的包括最一般的哲学与科学“范畴”，所有这一切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不断发展的暂时的产物，一定历史时代和一种特别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附属品。对于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来说如下唯物主义的原理是适用的：它们不应（像教条主义的法学与实证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所相信的那样）“从它们本身来理解”，同样也不能（像哲学所认为的那样），“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而毋宁说它们根源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之中。对于全部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说，马克思以双重的对立，即一方面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相对立，另一方面同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对立，而阐明的如下尖刻的反题是适用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克思在他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中，还运用历史的与社会的范畴如工业、“经济”、物质生产，论述了历史与社会的现象本身的整个自然基础。在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中引导出一切发展的最后基础，尽管不言自明地要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②，但它并不表现在任何处于历史与社会之外的自然要素，例如气候、种族、生存斗争、人的肉体与精神力量，而表现在甚至已“历史地被改变了自然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在具有历史与社会特征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当唯物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为了给他的相反观点寻找根据，除了别的还援用了这种说法：“黑格尔……已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注意到了‘世界史的地理基础’的重要作用”^③，那末在这种区别中实际上正表现出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的唯物主义超过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科学进步；后述二者完全像17和18世纪的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那样，把“物质”仅仅认作是无声的、死的——或者充其量说生物学上有生命的——自然界。

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的确“物质的自然界同样影响了世界历史”^④那末马克思伊始以社会范畴去理解自然界。物质的自然界并不是直接地影响世界历史，而是间接地作为一个伊始不

① 参见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这里由马克思修改了的费尔巴哈公式：“思想是来自存在，但存在不是来自思想”，已包含在1842年的《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之中。〔《费尔巴哈全集》，由W·伯林和F·约德尔编辑，第11卷，柏林1904年，第23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以下。

③ 参见G·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斯图加特1910年，第44页。

④ 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言》，《全集》，第9卷，柏林，1837年，第19页和《世界史的地理基础》，同上书第75页以下。

仅在人与自然之间，而且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物质生产过程^①。为了便于哲学家们理解或者说，在马克思严格的社会科学里取代纯粹的、作为一切人类活动前提的自然界(经济学的实物的自然界)，到处是作为社会的“物质”的、以人类的社会活动为中介和被改造过的——从而同时在当前和将来已改变了的和可以改造的、作为物质生产的自然界(经济学的实物的自然界)^②。

这种“社会的自然界”本身，在不同的时代具有特殊的、不同的历史性质；它作为“社会的”自然界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具有阶级的性质。例如像马克思在批驳费尔巴哈时所强调的那样：自然的产物，像哲学家窗前的樱桃树，只是在数百年前通过商业才移植到欧洲地区，它对于现代欧洲人来说并不是自然的生长物，^③由于同样的缘故，土豆对于现代欧洲的穷人来说也不是“自然的”食物，因而或者至多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像现代的食品作假一样，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的产物”^④。同样，现代穷人的棲身之所、不再像动物的洞穴或原始穴居之人的洞穴那样是“他的”洞穴，即这个“自由地给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在其中他感到如鱼得水般的自在；而是别人的住宅，只要他不付房租便会被立即抛到街头^⑤。从简单的商品生产世界得出的原理是：我的住宅是

①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以下，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3页以下。

② 参见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这一情况的详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128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以下与48页以下。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④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4、277、页以下，327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1页。

我的避居所，——这不适合于大城市的简陋出租房，也不适合于在《资本论》里所描述的1860年英国农村工人的住房^①“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现代饥饿，在历史上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另一种饥饿^②。（1）正如现代的饥饿一样，原始人群“正常的”饥饿时期，和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由现代工业而引起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同样“正常的”营养不足，以及新近产生的、所有国家和大陆的具有制度性质暂时的极端饥饿（1），都与下述严重的饥饿有所不同：即这种饥饿给一个由于偶然事件而暂时食品断绝的国家准备了不寻常的头号新闻。

所有这些事物与关系，就像它们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中或者在社会发展任何较早或较晚的时代里存在的情况那样，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们与物质生产各时期的历史形式有着一定的联系，并可能同时随着这种形式而在实际上被改变。这发生于一个可能为或长或短时间、但决不会遇到绝对界限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即产生于同时是人世间实际的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之中。

这种严格的社会科学的观点，或者说在马克思的术语中只是对同一事物不同表达法，即这种历史的实际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遇到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时代思潮的争论中所创立的全新的概念体系中，一开始就占支配地位。作为全部历史和社会前提的、肉体的人和他周遭的外部世界的存在，（2）以及客观的、在大的时期里不取决于人类活动而实现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地理的与宇宙的发展，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了不言而喻的科学前提，但是它们并不构成它的出发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8页以下。

② 参见1857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2页。

点^①。

这一论断通过马克思社会研究的这样的边际概念如“自然产生”(Naturwüchsigen)这个概念，并没有遭受驳斥，而只是再次获得证实，这个由马克思经常使用的术语在他那里具有完全不同于在“浪漫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诗人和哲学家那里所具有的意义；这个学派与18世纪的启蒙学派相对立颂扬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被用于否定地描述所有这样的社会的关系、状况与(2)联系，即它们尚未通过人们的行动自觉地创造出来与加以保持(“再生产”)，或者说或多或少改变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和20年之后同样在《资本论》里，例如谈到了社会分工“自然产生”的形式^②，还谈到了“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世界历史的联系^③，谈到了自然形成的国家形式^④、法律关系^⑤、语言形式^⑥以及诸如种族区别这样的人的类的区别^⑦。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种社会联系的“自然产生”的形式，同其他的或多或少被意识到的与企求的、通过人们的行动而造成的形式相对立；后述形式是这种联系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已采取的或者在未来将采取的。被称作为自然产生的形式因此同时被肯定地描述为(3)一种继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出发点；在此发展中它们或者是以日益自觉的方式无改变地被生产出来，或者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35、36、59、68、73页以下；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395页以下，402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④ 出处同上，第400页。

⑤ 出处同上，第420页。

⑥ 出处同上，第500页以下。

⑦ 出处同上，第498页。

可能或多或少地被改变，也许可能被完全彻底地推翻。(3)人们一眼就可看到，这种思想不仅对于社会认识领域的扩大来说，而且对于在马克思那里与这种认识相联实际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倾向来说，都具有巨大的影响^①。(4)

在这个观点下，已在探讨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时讨论过的“社会的自然规律”这一概念，才获得它真正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同首先纯粹从否定意义确定的概念打交道^②。在这个名义下由马克思论证过的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然规律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的那种肯定的与决定性的意义^③，而且也不具有由较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揭示的、摆脱了封建制度“人为的”桎梏的新的资产阶级生活“自然的”规律，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的那种意义。在这种否定性的规定中，“社会的自然规律”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批判的与革命的科学的科学来说同时存在着肯定的意义。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中并不涉及始终不渝的和最终的自然规律，而仅仅涉及社会经济形态一定的历史时代暂时起作用的规律；有关这一点的论证同时证明：这些所谓的规律在其继续发展中，通过在今天受其压迫的阶级自觉的社会行动可能被废除，并代之以社会生活其他的、更高级与更自由的形式。(5)在这里由马克思引进

① 出处同上，第68页。“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

② 参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中以赞同方式所指引的恩格斯的阐述：“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4页。〕

③ 参见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0页。

的概念的意义也不在于，扩大自然的、作为社会生活前提的必然性的范围，而且恰恰相反地表现在把对于理论与实际的研究来说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界限，作有利于社会的推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运用所谓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希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持续存在，而这种制度已由暂时的社会必然性越来越变成人为造就的、越来越依靠露骨的独裁与暴力支撑的、同时越来越产生阻碍发展与干扰生活的作用的制度。而在这种所谓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后面，远远地伫立着那种全部社会生活的实际的自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被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与实践认作是一切社会发展的(6)自然前提，而且这种承认依然是暂时性的。对于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7)来说不存在绝对的、为整个(7)未来事先划定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一种社会生活的、表面上“自然的”基础，不再可能在理论上被承认是(8)历史地产生的与历史地变化的形式，从而在实际上被改造和也许被完全彻底变革的(8)。“甚至连……天然产生的类的差别，如种族差别等等，……也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①(9)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整个社会科学来说的决定性地位；他于次年在巴黎与布鲁塞尔继续进行了这种研究。出自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顾性报道，阐明了从中得出的一般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8页。

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

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 马克思在这些文句中总结性地阐释了他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经十五年检验之后的原则；这些文句对由(1)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原则(1)在社会生活关系、它的历史发展及其实际的变革之间所确立的联系，提供了最清晰的认识。

这种联系的内容首先在于一种已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的似乎彼此重叠的层次之间静态联系：“一致”(Consensus)、结构的类似性、“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或者说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组织的、从物质生产中直接产生的形式，同其他的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形式之间的“适应”。

然而，这种表面上静态的关系只不过是动态联系的特殊状况；通过这种动态联系把社会生活的各部分领域在其发展中彼此联结起来，在已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上升与衰落的，以及由一种继续发展的社会形态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对它进行革命取代的各个阶段中，那种由我们首先一般称为一切社会关系“一致”的联系不断改变它的形式；并且到一定点上，便由基本上和谐的“一致”过渡到“纷争”(“dissensus”)。(黑格尔主义表明：适应的本身已包含着“矛盾”，通过矛盾的发展在继续过程中生产关系尤其是奠立其上的法律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为它的桎梏。)但是，社会发展的这种动态联系，也不是在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中至关重要的(2)、最终的与不可更改的联系形式。按照马克思的说明，由我们援引的上述文句毕竟只是给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即“对

^① 参见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页。

市民社会的剖解”时^①，提供了“指导”。与此相应地它们把社会的历史发展主要地描述为一个客观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把历史解释为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首先与生产力相适应，然后相“矛盾”，由发展形式“变为”桎梏，在这种表达方式中从未提到行动中的这种发展主体。迄今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被称作社会的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但是尚未把这种社会的对抗进一步明确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使用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表现为“社会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社会的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彻底变革”。在这一彻底变革的时代“人们”将意识到已出现的冲突并为解决它而斗争到底。“人类”给自己提出任务，甚至“变革时代”本身也有一种意识^②。全部发展的目标并没有被具体地与实际地确定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而是抽象地确定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实际联系中，同各时期注意到的形形色色的相反意见相对立，更细详地确定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只有当人们用这种规定去补充上述抽象的论述时，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³⁾才获得完整的意义。

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客观表达方式：

社会的历史是社会物质生产和在其发展中产生与解决的、物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历史。

① 参见1859《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中，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说法进行了尖锐的论争：“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

与此相适应的、出自《共产党宣言》的主观表达方式：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主观的表达方式说明与补充了客观的表达方式的意义。它讲明了从实际活动而实现客观发展的、真实的历史主体。在一定的阶段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当前阶段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也是被压迫阶级的枷锁。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打碎自己的枷锁的被压迫阶级，使生产获得解放。

历史的真实主体在当前发展阶段是无产阶级。

只有通过方法上同时考虑到在社会生活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之间的这种

实际的联系，

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4)的理论表述才可获得其充分的丰富成果。按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法律关系和国家形式”不再构成独立的、应当从自身或者从更高的精神原则来理解的对象，而无宁说它们是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中派生出来的，这一理论的事实同如下实在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在废除一切封建制度的等级优先权和特权之后，在国家与法律领域中被取消的不平等又作为从物质的生活关系本身中产生的社会阶级对立继续存在。通过按唯物主义观点把法律的、政治的、尤其是更加远离经济基础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人的意识形态溯源于社会存在，并对这种实际情况作彻底的说明，社会拨开资产阶级代表所散布的思想迷雾；他们借此使无产阶级偏离对它的实际境况的认识和为改变这种境况而采取的措施。这种说明将会使革命的阶级尽可能长远地防止那种新的幻想，即在最初时期革命的政党由于抱有这种幻想而使自己对由它们采用彻底斗争去解决的冲突的实际内容认识不清。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让无产阶级牢记唯物主义的学说：

它自身摆脱当前时代压迫与剥削它的特殊形式的解放，不是通过纯粹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变革，而只有通过直到触及经济基础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关系所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得以完成。

第三节 特殊的运用

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那种存在于物质基础同其政治与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中介体系也发生变化。因此，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关于这样的联系，例如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或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和这样的一般概念如阶级与阶级斗争①，以及甚至导致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②的一般表述，对于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并且马克思在作这种表述采用过的特定形式，在严格意义上也仅仅对于当前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定历史形式来说是适用的。

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里经济与政治的领域在形式上是彼此完全分离的，工人作为公民是自由与权利平等的。科学地论证在经济领域中事实上继续存在不自由，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具有理论揭示的性质。它揭示了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里存在于共同体“特定的政治结构”同“统治和奴役关系”之间唯物主义的联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6页以下；还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以下。

② 参见马克思1877年底《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在答复俄国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时，对在《资本论》第1卷末尾关于西欧原始积累和由此得出的一般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所作的论述的特殊历史性质，进行了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性质还可参见我与卡尔·考茨基的论争，第53页以下。

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事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① 它给雇佣劳动者阶级指明了在同时为经济与政治的行动中这样的巨大手段，即用它去消除产生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当今形式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自由的特殊形式，并从而同时消除由此产生的、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阻碍与干扰。相反，对这种联系的揭示以其特殊的形式，即马克思在《资本论》所采用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社会则是无意义的；在那里经济与政治在形式上还是彼此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农奴制和人身不自由的其他形式构成被公开承认的社会生产的基础。在这种状况下一种实际的统治与奴役人的关系，不是隐藏于外表上(1)直接存在的和所谓从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中产生的、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屈从下面。相反，在这里物的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通过人身的统治与奴役关系而掩蔽起来；这种关系表现为和可看作是生产过程的直接推动力^②。(1)在这里有关起束缚与阻碍发展作用的幻想应加以揭露的东西，已由资产阶级揭露了；它在它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中，在它取得政权的一切地方彻底揭示和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制的田园诗般的关系。“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③ 它通过消除一切在以往时代阻碍生产发展的观念与关系，为一个历史时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充分地解决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奠立于其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继续的历史发展中才出现：用所谓“对于一切人”的资产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以下。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

阶级的自由与平等，去取代旧的、用宗教与政治幻想掩饰的封建的不自由，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来说只不过是新的、用实物替代用人身去遮盖的压迫与剥削的形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从理论上揭示这种纯粹的“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①。这正如在当前时代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任务，就在于实际上铲除新的奴役形式和与此相联从新的资产阶级的桎梏下解放物质的社会生产力。

由唯物主义社会学说(2)所表述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对于那种较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来说经历了更重大的变化；在那种社会组织里这种联系或者只以极其松散的方式存在，或者像(3)在真正的原始社会中(3)还根本谈不上实际的、可与现今的“国家”相比拟的政治组织。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以在印度在继续存在的、古老的、小规模农村公社的简单生产机体，说明了亚西亚社会的经济结构，它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揭示下面这个秘密的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②。但是，经济与政治的唯物主义联系在这里不再说明，在马克思的社会观点中历史的变化与发展究竟取决于什么。经济基础相对的不变性仅仅说明亚西亚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性质，和由此产生的、对于持续的“在政治的表面上无目的运动”^③的抽象可能性。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再产生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恰恰相反：“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④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9页。

③ 参见马克思1853年6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页。

④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原理，“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原理从完整意义上只能运用于随着原始历史上共同体的解体而开始的历史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后来对由他和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宣言的一个附注中明确指出，这个原理对于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从而在阶级分化之前出现的原始社会的组织来说^①是不适用的。

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出现的形态中那样，在社会组织的未来形态中经济与政治、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联系，将最终采取新的、改变了的形式。如果说在刚刚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里，还带有当前的、奠立于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经济结构大体来说的大部分，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还将继续存在，并且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采取它最尖锐的政治形式；那末在进一步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当前经济结构的残余，即随着“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废止，“国家”和“法律”以及由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产生的一切对抗，也就是说一切社会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也将完全停止^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物质生产仍然是在自由联合体中的劳动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① 参见对《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② 参见1859年《序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以下，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页以下。

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

从这种思考中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原则对于其它的、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和之后的社会形态来说，仅仅在其一般的(4)规定性上和以一种按历史的距离或多或少变化了方式是有效的。按照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的基本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基本观点对于社会经济形态的一切历史时代来说都是适用的。马克思用轻蔑的嘲讽驳斥了如下意见：他的关于经济、政治、法律等等在理论与实际上联系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②。如果说，在中世纪教会、在古希腊罗马时国家扮演了较大的和表面上独立的角色，那末这一事实应当从物质生产当时的形式和由此直接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来作唯物主义的说明。

但是，这种始终存在的物质联系对于每一历史时代来说，都具有特殊不同的形式。马克思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表达方式，经必要的修改后可能利用于科学地研究早就成为过去的时代；并且由于有唯物主义的、同一切空想主义相敌对原则本身为此提出的告诫，它甚至对于从思想上预先确定(5)关于未来的、从当前形式中产生的社会经济形态普遍的基本特征来说，也可能加以利用。但是严格地说，它们仅仅包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脚注33。

括关于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同由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与发展过程之间联系的一定形式的论述。可见，由马克思引入社会研究的新的唯物主义原则，尽管它的内容具有普遍性，但在形式上仍然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当前形式相联系。只有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的条件下，即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物质生产客观上以迄今未有的规模社会化（这个历史时代产生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而实际上它“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①，另一方面物质生产领域完全同社会生活的一切其他领域在形式上分离开来，才能连同从物质生产中直接产生的关系本身一起，把存在于社会生产关系与政治的、法律的以及其他社会生活关系之间的联系，当作批判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最新的历史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特征在于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②。只有在最新的历史时代里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才能认识到，由资本对无产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经济压迫，是伸展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压迫的彻底形式；它并且宣称铲除这种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压迫，乃是铲除一切社会的压迫与剥削的强大手段。

第四节 哲学的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较后的发展中，由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一定历史形式经验地得出的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扩展为教条主义的原则；这种原则竟然要以同样方式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代和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发展。弗里德

① 参见1857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4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6页。

里希·恩格斯还于马克思在世时首次给新的原则加上的后来得到普遍采用的名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①，虽然还不是在这个方面有意识的步骤，但是在他看来在此当中问题仅仅在于：强调研究历史联系的唯物主义原则同那种“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的对立；后者“不认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认识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的表达方式，在严格意义上仅仅运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的研究，仅仅以适当的扩展转用于其他历史时代。而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脱离这种特别的、或者总的说来脱离任何历史的运用，由这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制造一种一般的社会哲学或者说社会学理论。从这种对唯物主义原则严格(1)经验的与批判的含意的歪曲与庸俗化，与下述企图相距仅有一步之差(1)：不仅用普遍的社会哲学，而且甚至用全面的、包括自然界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哲学和一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去论证马克思的历史与经济的科学。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18世纪哲学唯物主义真实的核_心与内容在此期间继续发展达到的一定科学形式，重新归结为“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③。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作为对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严格经验的研究，不需要这种哲学基础。(2)这样的“正统的”马克思解释者随后把一切修正的尝试，(2)即用某种不同于唯物主义哲学的东西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当作对马克思唯物

① 参见《反杜林论》，一、《概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页以下。

② 出处同上，第2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页。

主义的淡化加以拒绝和反对。他们在谋求“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时忽略了：(3) 马克思的社会研究(3) 不仅超过了唯心主义的哲学，而且总的说来超过了任何哲学的思维方法。他们希图借助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解释，来加强马克思科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从而他们只是多余地把他们自己哲学的落后性，事后重新带入已从哲学自觉地前进到科学的马克思理论之中。(4) 并且他们在防止对马克思主义作唯心主义的修正时，最后在一切主要观点上甚至重新陷入敌对者的立场。这种对于马克思正统派同修正主义之间关系来说还在其他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结果^①，表现出近乎荒诞的形式，(4) 即这个派别居领导地位的代表人物、哲学唯物主义者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热衷于探讨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基础的“哲学”时，最终陷入了把马克思主义阐述为一种(通过费尔巴哈摆脱了它的神学成份的)斯宾诺莎主义^②。

如果说从哲学上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派别导致的结果，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同一个哲学体系结合起来，那未在此两派之间在历史与理论上还存在着重大区别：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归结为斯宾诺莎，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早期资产阶级哲学联结起来，而后者尚未意识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后来的对立，并且它在自身中除了未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之外还已包含着未来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萌芽。与此相反，那种现代哲学的即兴编造者希图通过某种非唯物主义的哲学(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狄慈根主义等等)，去填补在马克思体系中在这个地方想象存在

① 参见我与卡尔·考茨基的论争，第4页以下，第111页以下。

② 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为了纠正可参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以下，第165页以下，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2页以下。

的空缺；他们并不认识整个在这里存在的、历史与理论的情势^①。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发展的一定点上起（与在这种倾向上他们开始的领路人费尔巴哈和莫泽斯·赫斯相比更加坚决地）抛开包括唯物主义之内的任何哲学。其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希图通过直接唯物主义的科学与实践超越哲学唯物主义^②。（5）但是，他们随后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不再研究哲学问题时仍然不断把无情地反对任何非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无论它们以何种伪装出现），看作是重要的任务。（5）在他们看来，属于这种非唯物主义的或者模糊不清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的，主要是同他们反对哲学的唯物主义表面上极其相近的（孔德和其他的）实证主义以及那种从休谟哲学中推演出来的“不可知论”；它们于马克思在生之年在英国由托马斯·赫胥黎所代表^③，（6）并且后来（7）它们还作为一种趋向明确的唯物主义认识的其他途径，在“进步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深受欢迎地保留着。（8）

（9）这种反对哲学唯心主义一切公开与隐蔽的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④，这时获得了新的意义。在这种特别的情势下较

① 参见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1930年第21页和出自1923年第一版无修改的重复论述第53页和脚注8。

②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页以下、41页以下93页以下、258页以下；对此还可参见1859年《序言》马克思的叙述，据此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期著作中“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关于整个问题参见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67页以下和第8页以下。

③ 参见马克思1866年12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27页。

④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1—412页。

之某种向一个早已超过的理论观点倒退的情况，更有理由这样去做，即在这时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具有完全科学的与经验的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顾了他的哲学唯物主义青年时期的、早已过去的论争，并且在此基础上面对在此期间新出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各种流派，重新更着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同一般的、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最初联系^①。对于下述激烈斗争来说在更高程度上还存在着由时代所决定的政治的动因，即在后来的一个历史时期由列宁所进行的、反对在哲学上偏离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其他倾向的斗争；按照他的看法这种世界观同历史的唯物主义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②。(10)在这里我们所涉及的、与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等提出的论据相关的东西^③，即不是它们特别的哲学内容，也不是列宁在当时科学的方法争议中所维护的观点的一般进步性或倒退性。下述历史的问题(10)也不再属于我们当前的课题，即这种(不是首先在列宁那里，而是特别已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显然可见的)强调旧的资产阶级的同新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之间共同特征的理论倾向，与由这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俄国革命实践中所维护的倾向的相应特点，有着何等程度的联系^④。在这里起决定作用仅仅是这样的事实：列宁的那种完全以哲学为形式的论战，自始至终是服务于实际的政治目的。他希图借此确保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如下危险时的统一与革命能量：在它自身行

① 出处同上。

② 参见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7页以下。

③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

④ 参见有关新著J·哈佩尔〔安东尼·潘涅库克〕，《作为哲学家的列宁》——对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研究（委员会通讯丛书第一辑，荷兰国际共产主义者小组出版）阿姆斯特丹，无年份（1938年）。

列中出现的、在哲学上以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思想为根据的反对派对它所造成的危险。并且一旦这个政治目的业已达到，他就把这一整个哲学争论视为结束^①。正如像在马克思本人和后来在恩格斯和列宁那里一样，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旧的哲学—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作为基础的倾向，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原则一起，依然活生生地继续存在着。与此相联存在着的还有部分更陈旧的世界观见解，例如启蒙思想、自由信仰、无神论、达尔文主义以及对无限颂扬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的一般信念。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对于现代工人运动的革命阶级觉悟的发展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样具有持久的意义。如果说按此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地从属于其他的、在它之前后出现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流派可能合理地视为无争议的话，那末下述论断则在相当程度上是另一码事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唯物主义以往的某种形式，例如对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或者说对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宗教的批判中直接产生的，并且把它们作为它的前提而依赖于它们。

第五节 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其双亲家蒙受过乌培河谷伪善的虔诚主义的严重压力。关于他人们至多可以说，他经历了通过宗教的道路：从黑格尔主义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对福音书的批判走向

^① 参见载于《活的马克思主义》第4卷5期的我对哈佩尔文章的评论（芝加哥，1938年11月）〔《列宁的哲学体系——兼论》·哈佩尔对列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最近批评〕，特别是第142页。

黑格尔，并且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达到哲学的唯物主义^①。然而出身于自由信仰环境的马克思则意味经历更长远的道路：经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经过17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最后通过独立地批判分析黑格尔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而这条道路从一开始首先意味着通向革命的唯物主义政治的道路^②。当马克思还是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言词激烈地反对《普鲁士国家报》的“下流的唯物主义”时，从这种政治意义上来看他已经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了。《普鲁士国家报》在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向立法者们鼓吹：“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去解决每一个实际的任务。”^③ 当他对黑格尔提出如下指责时，他已经是对实现国家理念的一切形式进行批判的唯物主义批判家，即他指责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而不是在现代“民主制”的意义上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他当时为了把民主制描述为一般的国家形式，在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加上了这样一句话：“现代的法国人对这一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④

费尔巴哈通过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和1842年的《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反对神学的唯心主义并从而同时反对支撑它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和在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中的精辟论证；此外还有于1935年在德国发表的赖因哈特·泽格勒的学士论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晚期虔诚主义者和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宗教发展》（《基督教和社会主义。资料和论述》，由恩斯特·巴涅科尔编辑）。

② 参见马克思的博文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3—285页；和青年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报告了他迄至当时哲学研究的过程，同上书，第8—19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0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2页。

的哲学的唯心主义，达到了唯物主义的突破。这种突破在上述情况下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具有像对于恩格斯，尤其是对于终生没有超出宗教批判阶段的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来说那样深刻的意义^①。出自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著名原理——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②。在马克思讲明这个原理时，在当时普鲁士政府更换后出现的情势下，它除了具有一般的思想意义外，还具有完全确定的政治意义。它揭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家对新政权反动的宗教政治的进攻，是“始于1840年的政治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个运动在1848年革命中结束。这种局限于宗教领域的进攻，失去了对于马克思来说由于如下原因暂时产生的积极意义，即随着“自1843年社会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而结束这个阶段，并且40年代最初几年的迅速高涨的革命运动达到这样一点，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这时甚至政治的运动已变成了在其下面隐藏着社会斗争的透明外壳^③。在费尔巴哈的《临时纲要》出版后的同一年即1843年，马克思在说明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的同一句子里明确宣称：宗教的批判“就德国来说……基本上已经结束”^④。虽然在一年之后他还同恩格斯一起在《神圣家族》里表示拥护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道主义”^⑤，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他被马克思特别是被恩格斯视为必不可少的同盟者。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例如在《神圣家族》中所包含的评论（它在形式上是反对布

① 参见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第4节1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5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39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以下、160页。此外，在同一时期产生的、但当时未公开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前言与正文中，对费尔巴哈进一步的、完全不是如此有限的表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48页、157页以下。

鲁诺·鲍威尔但在实质上同样是反对费尔巴哈的、关于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而非历史与经济的唯物主义的不充分性^①，就表明马克思在这时已远远超过费尔巴哈。他于次年在对仍然停留于哲学基础上黑格尔分子总的论战中，谈到了“对宗教这一独立领域进行的陈腐不堪的批判”。^②这就是说，他从自己方面来说早已超越了宗教批判的领域，并且从“前提”继续前进达到其政治与社会的结论：“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③。由此开始在后来的阶段中进一步批判了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以“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的其他范畴所采取的各种尘世形式。

对于运用唯物主义研究这个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人的世界来说，费尔巴哈主要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开创良好的起端^④。他把人的本质片面地看作“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他“对对象、实际、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把现存的发展中的社会实际从其主观方面去看，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实践”，并从而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⑥。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把“历史的过程排除在外”，因而从来不能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9页。

②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0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④ 参见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的信：“费尔巴哈的警句在我看来只有一点是不合适的，这就是他过多地注重新自然而过少地注重政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页。

⑤ 参见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于1845年，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1888年的《费尔巴哈论》一书的附录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⑥ 出处同上，第3页。

它最狭窄的与特别的领域里解决任务。只有历史唯物主义从每个特别的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出发，才理解“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历史唯物主义还在这种经济—历史和社会的（不只是自然的、生物学的）基础上，按唯物主义探索了宗教观念的根源。“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①

马克思在数年之后已不再是认真地实行“费尔巴哈崇拜”了^②。与这种崇拜相比，17与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方法的发展来说，具有更深刻的和持续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不同的历史阶段所采取的态度，同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与经济学的不同阶段所持的态度相适应。他们轻蔑地摈弃了那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处叫卖”^③与此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脚注89。

②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7页；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件292页；此外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1846年8月19日和1846年10月中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15页，36—40页、63—69页；以及马克思于1865年1月24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中关于费尔巴哈意义的最后评断：“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clair—obscur（朦胧状态）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9页。

③ 参见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9页。

相反，他们把他们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视为那种古典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积极的继续，即这种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构成进步的原则，并且在它的一个流派中当时已直接地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①。不过在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与其说是具体地联系一定的方法与内容上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涉及一般的历史继续。对于他们实际的理论工作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这种由于其富于斗争的革命倾向而被他们评价较高的、过去时代的唯物主义，在他们所处时代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和在现今为唯物主义的研究敞开大门的新领域里，最终只是用处微小的。

早期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对于历史的与社会的研究来说，没有展示出可供利用的开端。它虽然宣称它的唯物主义原则基本上适合于存在与知识的一切领域，并且根本没有预料到那种不彻底性，即后来像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整批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按唯物主义方法行事的自然科学家，在解决他们日常的棘手问题时所带有的不彻底性。这是由于他们（按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们作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同时希望在历史社会的实际领域里，仍然作为“唯心主义者”。但是，它伊始就主要地潜心研究对于现代工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并且把“社会”只是当作次要的、自然世界非独立的部分领域来对待。此外在资产阶级社会继续发展中，在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愈是清晰地被觉察到，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采取愈加明显和愈加带有威胁的形式，那末

^① 参见《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以下。

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只要在此时期仍然继续存在，就会更多地从荆棘丛生的“社会”领域被推回到自然科学研究的“中立”领域。19与20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由于它的青春最初阶段的革命性而忘却其唯物主义性质，那末（一般说来还有可能的话）只能以痉挛般的、反革命的形式把它再生产出来，就像它以帕累托“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使得自然科学革命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伊始就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使历史与社会的人类世界遵从于同一个唯物主义原则。正如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所采取的形式，是批判地剖析延续到资产阶级时代并且部分地以新的形式重新恢复的、中世纪神学形而上学的残余；而历史的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则从剖析新的形而上学而获得自己新的理论形式。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在这期间已转移到被旧唯物主义忽略的历史与社会现象的领域，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达到它暂时的终结^①。

第六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I： 社会的领域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等等(1)以及它们在现象学、哲学全书、逻辑学(1)和哲学史包括更广泛的领域里但同样是“具体的”运用中，青年马克思找到了以唯心主义思辨为形式的、而在以往的和同时代的哲学与科学里无处可找到的东西：对于经验地、唯物主义地研究所谓“精神的自然界”来说的方法论的开端。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科学的最

^① 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初意义在于：在这里把“社会”的领域与历史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和在自身中有分类的研究领域，首次以宏伟的形式同“自然界”的领域与历史对立起来，并且又使二者以与其特殊性相适合的形式最后都遵从于同一科学原则。当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此情况下归根到底致力于通过精神科学的原则去支配对自然界的研究；而批判的国家、社会与历史的研究家马克思则与此相反，他在对黑格尔进行论争中意识到这种差别与对立之前，伊始就从相对立的原则出发。他着手对人类的历史与社会的现实世界进行研究时抱有坚定的决心：对这个迄今被看作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的本性的“精神本性”，以同样的“科学的真诚”去进行研究，即当时自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已用这种科学的真诚研究过肉体的本性。他执行着这样的规划，即这位19岁的、还“汲取康德与费希特理想主义的养分的”年轻人，在他最初过渡到黑格尔哲学时向他的父亲所写下的规划：再次潜入到大海中去，不过这次“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①。黑格尔尽管有其一切思辨的神秘性，但比起那个时期通常的情况（在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有机的”国家理论家和“整个历史学派”那里），还是更多地从经验的、自然科学家旨在“真实于自然”地确认现实联系的态度，曾从事对社会历史和所谓“精神”历史的研究。正是这种情况，使得青年马克思虽然有过对黑格尔哲学正常的抗拒，但最后还是在他一生重要的阶段陷入了这一哲学。基本上说，他总是只信仰他认为已从这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的外衣下揭示出来的、社会科学的自然研究家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人与物的物质联系在表面思辨的概念联系下隐蔽

^① 参见马克思1837年11月10给父亲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5页。

地构成实际内容。当马克思相信能够以直接的方式阐明这种人与物的物质联系时，便立即脱离了黑格尔。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来说重要的、黑格尔的准备性工作就在于：他以唯心主义方式首次看到了这种一般的物质联系，并把它当作哲学—科学论述的课题。

黑格尔哲学体系是那种人文科学“自然的”体系最后的和完全的阐述^①；这种体系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实际与理论的发展斗争中，取代了中世纪的、教会—封建的社会制度的神学—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体系在社会的唯物主义模式方面仍然是处处引人注目的。由于黑格尔把17与18世纪英国人和德国人经验的发现翻译为深奥哲学的晦涩语言，因而他已在同样全面的、只是从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精神世界或历史”当作现实的一个领域而同作为其另一个领域的“自然界”区分开来。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历史的或“精神的”世界划分为一定的彼此重叠的层次。“绝对精神”世界(宗教、哲学、艺术、)居于“客观精神”世界(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之上^②。这种在自身中划分层次的世界在他那里也处于发展之中。只是由于这种赋有特征的分，在黑格尔那里重叠于实际的按时间的发展和较低层次对较高层次实际的物质制约性之上的，是想象的不受时间限制的发展和同样想象的、以相反的方向即从上至下的观念规定性。这种发展也由黑格尔“辩证地”阐述为处于矛盾中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同任何肯定相对立的否定构成向前推进的力量，并且由于这种矛盾而产生的冲突通过否定之否定在更高的合题中被扬弃。马克思把这种被黑格尔“在哲学上”倒立

① 这种说法出自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参见《人文科学导言》，《文集》，第1卷，第379页以下。

②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3卷，第2和第3篇。

的历史社会世界的序列，通过将黑格尔哲学作唯物主义的颠倒而纠正过来。

马克思从黑格尔模式中抹掉了国家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黑格尔那里同时构成了精神达到顶点的结局和整体；这种精神停留于世界并在其中有意识地实现。在这种观念中，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们不应当想象为那种通常的人世间的现象，即仅仅“是作为市民社会的国家”^①。在其中人们应当“看到的不是特别的国家，特别的制度，相反人们必须把观念即这个实际的上帝看作它本身”^②。随着这个实际的上帝被废黜，他的整个帝国便土崩瓦解。正如“国家”与“法”一样，在现实精神的一切“较高级的”形式——宗教、艺术、哲学，也都被剥夺了超尘世的地位，并被降低为依决于物质生活关系简单的“社会意识形态”。

(2) 马克思早在他着手对法与国家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之前，一开始就对社会意识这种更高级的意识形态产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攻击是以对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意识形态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为开端的；并且在此过程中首先是从哲学上对宗教进行批判，然后是从政治上对宗教和哲学进行批判^③。他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原则的继续发展中，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法与国家的现实基础，因而在现时他把那种“较高级的”即在此之前溯源于法律与政治的意识形态，归结为同一现实基础，这不过是不言而喻的。(2) 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发展”概念，经历了同样的“颠倒”。在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实际的历史发展取代

① 参见《哲学全书》第3卷，第523节。

② 参见《法哲学》对第258节的补充。

③ 参见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第102页以下，特别是在脚注67中(第104页以下)的详细论证。

了无时间限制的“观念”发展。黑格尔的“矛盾”被社会诸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辩证的“否定”所替代；而辩证的“合题”则由无产阶级革命和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取代。

第七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Ⅱ： 社会的发展

在改变了的现实层次的结构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在唯物主义的模式中是明确无误地表现出来^①。与此同时在按马克思观点的物质生产力的现实发展同黑格尔观念的概念“发展”之间，在将黑格尔模式作唯物主义的颠倒之后，还存在甚多的类似性。物质生产力在生产任何发展阶段上都是在一定形式（生产关系）中发展的并且然后通过突破这种形式而前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阶段。从形式上来看，这种物质生产力同黑格尔的“观念”只有些微的区别；这种“观念”以一定的形式“外化”，以便然后在随即的更高阶段上它的“他在”的当时形式重新复归于自身。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外观，似乎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尘世的现实中，还以魔术般的手法引进了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的残余。在他从黑格尔观念神秘的自我发展过渡到由现实的人们实现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带有某种任意性为新的、社会发展的物质主体，保留了对于以前的、适合于神秘主体的发展形式。真实的状况正恰恰相反。形式上的类似性可由此来说明：在黑格尔的发展模式中，

^①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模式在涅科莱·哈特曼以及现代精神哲学其他新近代表那里，经受了过分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对这种解释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格·君特作了中肯的纠正：《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一种新的思维理论的基本原理》，莱比锡1933年，VIII以下。

te in

zu

以哲学神秘化的形式已表达了社会的革命发展的实际过程。

几乎在这个世代的所有哲学家那里，存在着以这一或那一神秘外衣掩饰的同样模式；这个时代决定性的事件是法国革命。在康德那里存有这种模式。他的《从世界公民的意图来看一般历史》(«Idee in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 Absicht»)在如下论述中达到了顶点：人们行动的“通常无计划的聚集”通过下述方式“至少大体上形成一种体制”，即人们“到处仅仅注意市民制度和它的法律以及政治关系，二者在何等程度上通过它们所包含好的方面一时服务于提高与颂扬民族(同它们一起的还有艺术与科学)，但它们由于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再度被推翻，然而却把启蒙的萌芽遗留下来，它通过每次革命而更大地发展，为随后更高级的改革阶段作好准备。”^①

历史发展的思想以类似的形式出现在法国国民公会的颂扬者、哲学家费希特那里，出现在浪漫派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Iffölderlin)和诺瓦利斯(Noralis)以及施莱艾尔马赫尔(Schl-eiermacher)那里、所有这些自由哲学思想表面的创造，是现实的革命过程在哲学家头脑中或多或少被动的与不自觉的反映；并且实际的革命认识在当时哲学的发展模式中以一种神秘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甚至这种采取神秘化形式的革命认识，如若不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发展理论中保持下来并且在新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发展为新的、合理的与适用的形态，那末现今在专门学者的狭小圈子之外早就被人遗忘了。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的革命模式同新的革命发展的马克思模式之间，在其内容上的区别比其形式上的类似具有更加重要的

^① 参见在正文中提到的康德的文章结尾的第9句，《柏林月刊》IV(1784年)第385—411页。

意义。正如黑格尔“观念”的“辩证”发展在“国家”中达到了它最后的终结，在康德的模式里社会关系作为发展形式与桎梏（为了把它炸毁需要进行革命）的双重作用，只是明确地宣布适用于“资产阶级制度和它的法律以及政治关系”。相反在马克思(1)的唯物主义模式中，这种矛盾被向下更深刻地推进了一个阶段，直到物质生产。

对于这种从狭义上按唯物主义方式运用马克思的革命发展理论来说，不是在哲学中而是在普通的文献里，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当中，总之(2)在当时(2)的意识形态中已有了充分的开始。这对于这样一个时代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即在这个时代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巨大的、在其客观作用上决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包括向下直到涉及经济领域在内的一切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①；这一过程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了它的顶峰。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力同起先与其相适应然后相冲突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称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无所顾忌地对于经济进步的首要地位的认识，虽然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在其物质与文化得到满足的现今阶段所能冷静地接受的东西。但是他以此在形式上并没有超越这样的口号，即由资产阶级贸易自由的最初代言人在其反对中世纪行会限制和其他对扩展中资产阶级生产力的封建束缚的斗争中所提出的口号；这些

① 参见在黑格尔关于最新时期(1830—1831年)哲学史讲演中的这种印象的强烈反响：“合理的思想、合理的概念现时一下子发挥了效用，对此，不合理的陈旧支柱不能进行任何反抗。因而现今在合理思想的基础上一种制度被建立起来，并且从今以后一切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太阳高挂天空和行星围绕在它的周围，那末就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即人是头脚倒立的，这是奠立在思想之上，并且现实是按照这种思想来建造的。因而这是光辉灿烂的日出。一切思维着的人们共同庆祝这个时代。崇高的情感支配着那个时代，精神的热忱看透了世界，这似乎是现时已达到了神圣的东西同世界真实的和解。”进一步的论证在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中，第2版，第60页以下。

口号在下述呼声中当时找到了对一整个历史时代有效的形式：这就是里昂的商人在回复王国大臣柯尔贝尔提出的有关他们所希望的国家扶助方式的资助问题所发出的呼声：自由放任，听天由命。

老年恩格斯的论述更接近新的革命观点的中心，按照这种论述，“这个新的派别……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①这个论述本身依然是同资产阶级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关于以其现代形式被理解为“工业”劳动的成果、能量和无限的创造力的原始观点相一致的。恩格斯在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专门文集中所维护的、有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决定性“作用”^②的论纲，~~因~~那个著名的、把人视为“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富兰克林定义是毫无区别的；这个定义对于早期资产阶级时代的英雄与先驱者的观点来说是赋有特征的。在这里人们还必然想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如圣西门，把产业资本家仍然称为“劳动者”^③。“社会劳动”的概念运用于当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具体状况所具有的变化了的意义，这可由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劳动观点之间的绝端对立来加以说明。这种对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获得了成熟的科学表述，并在最初时期的哲学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似非而是的文句表达出来：工人受压迫与剥削的真正根源不应在私有财产中，而应当在现今“外化的”与“异化的”劳动形式的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53页；马克思：“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以下。

③ 参见《圣西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84页。

本身中去探求^①。

这甚至同样适用于使现今资产阶级意识备感苦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新的唯物主义原则作出的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出自《共产党宣言》的言论，是对“无偏颇的与无约束的”资产阶级科学神圣化的竞赛规则作了无所顾忌的抨击和最直接的突破。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和着重地说明过的那样，这种言论所包含的东西，从其普遍的形式来说无不是“民主主义者先生们”能够在资产阶级文献本身中，即在梯叶里、基佐、约翰·威德等等的历史著作中和在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著作里，看到作为基本事实表述出来的东西。马克思于1852年3月5日致他的友人魏德迈的信中写到：“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②。英国资产阶级在为了谷物关税而斗争的时期明确无误地谈到了“阶级斗争”，并且也许甚至谈到了“不再许可和解的阶级分裂”；马克思在同一地方作为这种明确性的例证摘引了英国财政大臣迪斯累里(Disraeli)3月1日的竞选口号和1852年3月2日《泰晤士报》有关短评。数十年之后恩格斯更加明确地讲述了同一情况：“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8以下。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①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这时“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引起和发展的。^②

第八节 物质的生产力I：概念

马克思新的革命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是“生产力”的概念。这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在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既不是将以充分经验的认识为前提的黑格尔绝对“观念”作纯粹“唯物主义”颠倒，也不是为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提供基础的社会总发展的自然基础。物质生产力连同它在其中活动与发展的生产关系，构成各个时期的、可由“自然科学精确证实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现实整体。在马克思的这个概念中没有丝毫神秘的与形而上学的东西。“生产力”首先不外是作为活着的人们的、人间现实的劳动力；在利用一定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由此决定的合作方式下，通过这种力量的劳动而创造满足社会生

^①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3—344页。

^② 出处同上。

活需要的物质手段,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状况下制造“商品”。使得人的劳动力的这种效益(从而在资本主义状况下也必然使得剥削者的利润)增长的一切,是一种新的社会的“生产力”。属于物质的生产力的,除了自然界、技术、科学之外,首先还有社会组织本身和在其中通过协作与产业分工所创造的、伊始就是社会的力量。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著作里已经谈到过“生产的劳动能力”由于分工而引起的“按比例的增长”,并且人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社会生产力”这个新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一由马克思极大扩展了的与批判地完善的思想中,有着它真正的起源。^①正如物质生产一方面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自然技术的)关系和另一方面作为人与人之间(历史社会的)关系这种两重性质,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完善与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说构成最重要的出发点;它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同样构成最重要的开端。他在最初论证他的新原则时已经阐明:“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有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合作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的,而这种合作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②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的革命的要点还在于以后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长的“新的力的势能”(neue Kraftpotenz),是从许多力量融合为总的力量中产生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状况下表面是产生于资本的生产率,而实际上

① 参见马克思在最初阅读斯密著作的摘录,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45—146页。

②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是从已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中产生的。^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的工人阶级能够克服从当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产生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通过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取代现今资产阶级分工的不完善的形式，并从而使得在社会劳动中已能动地包含着的、新的力的势能得以完全实现；最后革命的工人阶级甚至可能被视为物质的生产力。“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

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物质生产整个历史发展和奠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形态隐蔽的推动力，不过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里许多其他地方阐明为社会阶级的对立与斗争的同一事物的如实表达。因而新近的马克思解释者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迂腐地把由马克思本人和像列宁这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定的关系颠倒过来，(1)希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普遍“辩证法”中推断出作为纯粹表现形式的阶级对立。(1)因此他们不仅落后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还落后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倒退到纯粹形而上学或者简直是神秘主义的立场^③。

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同资产阶级社会当前形式确定的关系，最初充分地在下述著作中表达出来，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了他们反对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唯物主义见解，并且在其中首次详细地论证了那种自然为其后来的研究提供基础的新观念：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的基

① 参见《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9页以下；关于从“协作”中产生新的、从来是社会的力量详尽而明确的论述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

②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③ 参见我的文章《为什么我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月刊》IX，1935年4月2日，第89页以下。

础；在生产力同它各时期活动形式之间的矛盾，各时期的“交往形式”（即按照后来的马克思术语为“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它的桎梏；从这个基本矛盾和它的“各种次要形式，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最后必然要爆发为革命。“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这就是说在这里超出了新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在当前的历史时代，它以这种形式“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只是现在进入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它“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而同时“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由此可见，也只有在今天即社会当前发展阶段上，才出现“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并且“对这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①。

随着对生产力概念严格的历史与社会的规定，极其愚蠢的如下观念也获得解决：（2）在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所涉及的问题，不外是累遭指责的“技术成果”及其社会的应用之间不断缺乏的平衡”。（2）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同“技术统治论者”的唯心主义抽象毫无共同之处；后者臆想社会生产力脱离一切社会的规定性，可以纯粹由自然科学与工艺学来确证与测定。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属于生产力的除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5页以下。

了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劳动分工的一定形式之外，总是还有“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①。由于资产阶级对技术进步的关心只是间接的，只是以利润为条件，因而智力劳动成果日益增长的一部分遭到废弃；这表现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性质。然而资本主义体制对技术进步可能性的这种压制，只不过总是在其中引起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倾向同社会生产关系的保守倾向之间冲突的形式之一。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的唯物主义，为了消除那种仅仅用精神手段(3)不可克服的(3)物质障碍，纯粹工艺学的认识和“技术统治论”的主张是确实不够的。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4)经济关系无声的权力和其利益在于维持(4)这种关系的阶级在国家中组织起来的权力，就是运用这种物质障碍去阻挡对当前状况任何彻底的变革。“技术统治论”(托洛茨基在对美国的社会主义未来作大胆描绘时说过)“只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实现，如若私有制的隔墙倒塌下来的话”^②。

第九节 物质的生产力Ⅱ：进步的规律

通过彻底地、全面地和始终不渝地贯彻发展思想，马克思首先只是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实际的存在形式。资本的积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必要的存在条件。因而经常不断的进步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不仅是令人高兴的成果，而且完全是它存在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阐明了这个特有的规律和由此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页。

② 参见《文集》第二年卷第10册，1935年6月，第522页。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定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的”^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个特有的规律，由他的思想代表在最初的上升阶段质朴地与无偏颇地表述为进步的规律^②。随后特别是自达尔文以来进步的简单概念被进化的概念所排斥，从而一般进步的原则首先只是得到广义上的运用。经常的、不断进化的概念被提高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想把社会研究阐述为“对其最复杂形态的进化进行研究”^③。后来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从其更高形态的立场讥讽最初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幼稚性。斯宾塞除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9页。

② 参见Ch. 佩罗，《古代与 现代的对比》(《Parallel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巴黎1688—1697。以及在G. 索列尔那里对在他著作中提出的进步问题的重新探讨，《进步的幻想》(《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巴黎，1908年。

③ 参见斯宾塞，《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伦敦1874年，第384页以下，还参见J·B·柏立《进步的观念》(The Idea of Progress)伦敦1920年，和M·金斯堡《在社会学里、在社会学研究中进化的观念》(The Concept of Evolution in Sociology, in Studies in Sociology)伦敦，1932年，以及J·卢姆内《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Herbert Spencer's Sociology)，伦敦1934年，第10、11章，对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进步与发展思想史的综合论述。

了提出由他信守不渝地坚持的、包括作为当然结果的道德较高发展在内的一般进步观念之外，还提出了较之从简单形式到综合形式的进步定义更不刺眼的发展定义^①。赫胥黎(Huxley)在他的关于《进化和伦理学》的讲演中，强调了发展概念在伦理学上的差异：经济—社会进步和道德上进步的无关联性与部分的对立性^②。赫胥黎的这种“多元的”进步理论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中，成为完全的进步怀疑论，最后成为社会的悲观主义，对倒退的颂扬和“西方毁灭”论。

正如在最初的进步观念中表达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上升阶段，那末在它后来转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性的、怀疑论地“无约束的”发展思想则是资本主义生产下行阶段的表现。(1)不断的和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的经济必然性，在这个时代的意识里表现为进步的狂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正是这种经济必然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的)价值和(暂时的)必然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继续发展，随着积累的资本与财富数额的增加，资本家也停止了作为资本积累倾向纯粹的体现^③。在同样程度上(1)现今资产阶级对于它自己以前的进步狂热的悔恨情绪在增长。

被资产阶级科学所放弃的进步的思想，由在当前社会的实际发展中代表进步倾向的阶级接受过来。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圣西门与傅立叶乐观空想的和欧文与马克思唯物主

① 参见在卢姆内那里的论证，第一章，特别是，第242页以下(引文出自基本原理，1862年，第396页，和出自社会学原理I，1876年，第585页，)第269页(引文出自社会的静力学1855年，第30页，和引文出自《进步，它的规律和起因》1857年，重刊于漫笔I第60页，)和第272页以下。

② 参见托·亨·赫胥黎，《进化和伦理学》——罗马讲演，伦敦1893年第31页以下。

③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以下。

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旧的资产阶级进步信仰所进行的批判，是部分地恢复与完善它的合理内核。社会主义以变化了的形式和以巨大扩展的范围再次使物质生产获得解放；资本主义在它的时代和以它的形式曾最终勉强地做到过这点。资产阶级把资本的积累吹嘘为进步的宇宙规律，因而它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意识到它自己发展的经济规律。在无产阶级那里，取代这种意识形态的神秘主义是明确而科学地把它自己的社会理论与实践，针对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再次继续向前发展迄今已发展了生产力。工人阶级必须通过长期斗争的各个阶段，保持起源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原则；在各斗争阶段里它致力于实现它自己的解放并随之创立更高级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力也增长起来，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当前非人化的牺牲对于社会的未来来说才成为多余的，和单轨的“进步”原则才归结为在自由的(2)社会里自由的个人的全面发展^①。现代工人阶级将通过自己自觉的行动去实现各个时代被压迫阶级长久的梦想；这种梦想已由亚里士多德以神秘主义掩饰的方式，表述为从事劳动的奴隶阶级革命的自我解放的现实目的^②。

截至那时，与其说无产阶级是指责资产阶级，仅仅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生产力和在其过程中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进步

① 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以下；以及《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结尾的句子：“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1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4。

承受了巨大的费用和苦难，倒不如说是指责它在其继续的存在中越来越不代表这种进步；这是由于它越来越多而空想地追求它特殊的阶级利益，而这种利益与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是越来越不能相容的，并最终直接地与有意识地破坏一切社会的进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近的成就在于：迫使资产阶级违背其意愿地继续实现它(短暂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在社会革命中炸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构成的、对生产力最强大的桎梏才能实现它特有的进步使命。“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

早在无产阶级在革命起义中推翻占统治的资产阶级并作为统治阶级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正式代表者之前，就在其阶级意识的发展中，在其阶级斗争中和阶级组织中，预先发生了这种伟大的历史主体的变换。在阶级斗争中迫使资产阶级作出的进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进步，而是它自身的事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发展成了无产阶级的行动。(3)这个行动作为正常的与必然的阶段包括了在社会革命中全面彻底地变革现存社会^②。

第十节 社会的生产关系

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被它的思想代表人物片面地仅仅理解为国家制度、立法和一般观念变革，简言之被理解为政治革命；而从其实际上来看它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活过程的变

①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页。

② 参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以下，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以下。对此还可参见我的著作《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柏林1922年，第35页以下。

革。在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家的观念中迄至今日继续存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首先在于：他们把在经济的生活条件上进行的变革还不是看作直接的、通过人们自觉的行动完成的任务，而充其量视为从自觉地实现的政治变革本身中必然产生的“自然”结果。

构成社会革命新的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构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关进步、进化和仅有政治革命的传统观念所进行的整个批判的支点，是如下唯物主义的认识：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同物质生产力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自行发展的，——既不是借助于渐进的社会进化，也不是作为纯粹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它也像奠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如法律关系、国家形式、社会意识或“观念”一样，必须由人们去进行变革。为了实行这种变革，就需要有彻底的、深入到现存社会制度的根底的即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社会革命。

在一个历史时代现存的未改变的（从整体上，从主要事情上未改变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可能出现的唯一“进化”，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对于通过社会革命而取代现存生产关系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来说物质的存在条件，是在旧社会本身内部孕育而成的。不能自行发展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的时期里，直到一定的点上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中还发挥着积极的职能。在它的支配下实现旧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新生产力的产生。

在任何历史时代的最初发展阶段在生产关系未变化的（或者细微的、不是在基础上发生变化的）存在状况下，充满了物质生产有潜力的、可能的、生气勃勃的继续发展。这种“和谐的”发展（一种只是在表面上和谐的、以萌芽形式包含未来冲突的进化），到一定点上也从外表上丧失其和谐的性质。“社会的

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

由于这种物质生产的动态观点，马克思革命的发展理论便与任何其他的发展理论对立起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尽管十分沉醉于能动与发展，然而从基本上说始终是“社会的静力学者”，因为他们没有克服对社会基础的静止的观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在任何时代构成一个确定的整体：生产是以一定形式实现的。全部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就是在这种形式中活动。对于这种实际活动生产力来说，任何其他的“生产力”便成为多余的和未发挥的财富；这种“生产力”在静止的考察中没有任何活动余地。“没有利润就没有工厂开工”（奥古斯特·倍倍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连同从属于它的分配关系，对于在当前资产阶级时代里实际进行生产来说，完全像田地和地产、原料与机器以及从事劳动的“人手”一样，是必不可能的。在严格地进行这种考察的情况下，一般说来生产能够发展到它当前阶段，最终便显得是个奇迹。通过从思想上把实际的变化归结为逐渐的和难以觉察的进化细小的与最小的步伐^②，这一奇迹便被部分地作出伪科学的解释；而另一部分则通过归因于过去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超自然的创造力来予以解答。这种革命炸毁了在自身中再无继续进化能力的中世纪封建经济组织，并且以资产阶级社会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在自身中包含

^① 参见《序言》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在这里所玩弄的变戏法已受到黑格尔批判地揭露《逻辑学》I，《全集》第3卷，(2)柏林1841年，第434—435页。对关于“正在消失的小的”变化的伪变态学说更严厉的批判，包含在后来在改良主义论争中所采用的、“愚蠢的少女”的比喻之中；她以孩童“起初毕竟是幼小的”为由来请求原谅。

无限进化能力的生产形式。

通过使物质生产分解为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灵活的生产力，一定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生产方式”)(1)在整体上所固有的这种表面的确定性，静止性和不变性，(1)便一下子消除了。现在向生产关系提出的问题，不再单纯是在其中是否能进行生产；向它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在其中是否能实现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是形式，通过它生产力的增长或者仍然受到促进或者已经遭受阻碍。相反，关于遭受当前生产关系阻碍的“生产力”的现状与程度，尽管可做各种技术的推算，但只要不通过革命方式打破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限制而为生产力实际的利用与检验开辟道路，那末就不能讲明任何确定的与最终有效的东西。正如在不再是进化论者的现代生物学中物种的变化一样，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变化不是事先完全确定和可以确定的。正如同亚里士德的见解相反，突变^①是“自然的飞跃”，同样在对社会革命的前提与形式作各种唯物主义的规定的情况下，它的实现依然是“飞跃”；虽然这还不是由必然的绝对王国进入自由的绝对王国，但毕竟是由早已凝固的和成为桎梏的确定性的体制，进入到在革命过程当中形成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可塑性体制；这个体制给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余地，并开创了人们积极性的新形式。^②

① “突变”这一概念最初被运用于社会变化，后来才转用于自然科学。人们使用它迄至最近时期去说明在今日被称作“革命”的过程。“革命”这一用语首次于17世纪底被应用于这样一个过程，并且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才获得它现今的充分意义。

②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部分第二节《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92页以下和被引用的文句出自《资本论》第3卷；此外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以下和《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3页。

第十一节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两个阶段(1)

从这种对物质生产力的概念更精确的确定(2)还解决了马克思关于革命的观点迄至当时显得具有的一定矛盾。这种矛盾在于，革命有时完全是从物质生产力的客观发展中推引出来的，有时则同样断然地被阐明为(2)联合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的现实人们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现实的实际行动；这样的实际行动带有各种成功机会和各种风险。正如我们已在关于经济学在马克思体系后来发展中改变了地位的讨论中指出，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和后来阶段(更确切地说：在关键性的1850年之前和之后)对其革命理论所作出的论断之间的差别，并不纯粹是带有形式上的意义。

(3)它们包括了从理论上承认在这个时期实际出现的历史情势的变化，和与这种情势相适应的重点转移，即从直接的革命行动转到建立在客观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只是间接地针对革命目标的工人阶级运动形式。但是，按照某些马克思解释者的心理学处事方法，在这种对有效行动的物质前提作充分强调的后面，觉察出一位在此时期已成熟到了解“纯粹”科学的客观性的思想家，同他早先的革命倾向实行了全面的决裂，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3)这种“解释”的毫无根据更仔细地来看甚至对于这样的极端情况，即对于出自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著名的(被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为他们的目的利用最多的)论断来说也是如此。按此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

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一通过无限制的一般化结论（“决不”和“全部”）而对表面上不依决于人们参与的（4）规律所作的说明，然而对它很不利地同那种比较质朴的形式区分开来，即马克思在数年之前在反对蒲鲁东时说明同一思想所采用的形式；他宣称：“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②尽管如此但仍然一目了然的是：在有意地仅以抽象形式表述的后来的解释中，从马克思的论据里略去了必要的环节；物质生产条件成熟的实际意义一如既往地恰恰在于，它使得能够达到“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和通过这一阶级的行动推翻旧社会。

由工人阶级主体的反叛到客观的“生产力的反叛”这种赋有特征的重点转移，首次出现在这样的文献中，即在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于1850年秋公开地确认了普遍地重新产生的繁荣和由此决定的革命运动的暂时结束：“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把他们从唯物主义地分析客观经济状况得出的结论和由此产生的冷静的展望，以尖锐的形式同一切主观的与感情用事的、任意加速革命过程的希望对立起来；这种形式是与他们当时在实践中反对一切诸如此类的意图所采取的态度相适应的。他们这时由于有了对现实形势的这种冷静的、唯物主义的论断，而永远抛弃了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流亡者“in Partibus[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③ 参见马克思与恩格斯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

围的庸俗民主派”^①所抱有的幻想。他们因此同时在激烈的并
通过整个组织的分裂与瓦解才结束的派别斗争中，实现了同
1850年再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里的唯意志论的、积极“行动派”
的决裂^②。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实际的唯物主义以这种新的形
式，并没有（像在他们的某些“最正统的”学生后来的发展中实际
出现的情况那样）转变为信奉经济力量盲目起作用的机械论；从
这种机械论出发旧的社会形态的衰亡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
过渡，是没有人们的参与而自行发生的。相反，在这时仍然存在
着同工人阶级行动的实际关系。唯物主义理论的新形式是与
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相适应的；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在更广泛的
基础上，作为不再是直接的、而只是从其最后结果朝向社会革命
的、联合在工会和政治组织中的工人阶级的运动在发展着。

强调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对于马克思理论后
来的形式来说是赋有特征的；这种前提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良好
领导、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去取代。在这种
观点下对这种前提的强调⁽⁵⁾只是表现为同时是理论的和实践
的新方针；按此方针马克思为始于1850年的革命工人运动的新
阶段，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反革命的客观教训。就这点而
论，它对工人运动当时的状况来说，就像那种表面上同样是从
理论上对“一切革命的基本规律”的阐述对于类似情势应当具有
的相同意义；在较后的历史时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以这
种阐述方式，将20世纪三次俄国革命关于对于“直接的、公开

^① 参见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

^② 参见载于《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的、在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克思对分裂提案的理由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4页以下。

的、真正革命的工人斗争”^①来说必不可缺的客观前提的实际经验，同从战后头几年直接的革命危机中产生的、在客观变化了的形势下继续存生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唯意志论的情绪对立起来。在这种告诫积极的工人先锋队防止保守地坚持由于客观形势而不再是合理的直接的革命策略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想到，通过纯粹宿命论地相信在应有的等待之后最终会无危险地和以绝对的必然性实现经济的发展过程，去替代工人阶级实际的革命行动。以其行动而处于历史发展长河之中和实际上决定着这种发展的阶级，必须通过事实来证明：正如现存的关系成为了生产力的桎梏，在同样程度上在它的外壳下新的生产力也已经成熟；这种生产力使得向社会经济形态新的进步时代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过渡，成为可能。

第十二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 经济主义(1)

在“社会的经济结构”同它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等“上层建筑”之间——在“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特别的关系是怎样的性质？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间的物质联系是以怎样的确定形式实现？对于用唯物主义研究现存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领域来说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经历过黑格尔学派的革命思想家马克思，在他对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现象进行唯物主义的研究时，借助于包括在最精确的理论认识与最直接的实际认识之间全部阶段的思想方法，有区别地使当时运用的认识形式最确切地适应于当时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领域；这种区分的深刻性与精确性

^①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8页。

后来越来越不被理解了。一种情况归之于这样的误解：按照唯物主义理论基本说来物质的现实性似乎只应属于经济的事实，而一切其他社会现象——国家、法律、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少地具有“现实性”，并且最终地~~地~~为“纯粹的”意识形态^①。

这种从“经济主义”观点缩小马克思革命的社会理论而产生的实际结果在于：只有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其中直接产生的社会斗争的形式(所谓“直接的行动”)，才被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相反一切其他的、同经济—社会行动仅有间接联系的斗争形式，其中特别是政治斗争，被当代工人公然地偏离他们革命的阶级目的来看待。这种经济主义的倾向在马克思活着时在由他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里，由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以及当时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其他“反权威的”、“反政治的”、“反党派的”流派代表着。(2)在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派之间进行的激烈的派别斗争，当时开始以在形式上开除这些流派并以事实上整个组织的瓦解而告结束(2)。这种老的反政治的和经济主义的倾向的直接后继者，是在随后的时期中在各个国家和国际范围里，在现代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派别之旁作为第二个较弱小的派别继续存在的、革命的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派；这个派别(3)自1931—1938年在西班牙革命内部构成起推动作用的力量。这次革命运动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独立的行动^②。(3)

(4)相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自70年代以来政治斗争及其议会主义的后果获得越来越大的与中心的意义，

① 对这种误解的批驳，构成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题。

② 参见我的载于《新评论》(Die Neue Rundschau)的文章，《西班牙革命》，柏林，1931年。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经济革命的倾向现时只起着次要的作用。然而它在此时期作为从来不被正式的党与工会教条承认的、被断然排斥参加新的国际组织(所谓第二国际)的潜在流派,总是继续存在的。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指后来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会运动内部的那种虚假的经济主义流派;这种流派对工人运动中一切在资产阶级经济与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超出纯粹经济的工资斗争的政治行动,即便它们在既定目的上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改良(例如在德国表现为废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的斗争、李卜克内西式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等等,或者说在法国表现为所谓“革命的德雷福斯式”的斗争),由于在此过程中所采用的革命的^{斗争}手段(总罢工、示威游行等等),都从原则上加以反对。相反这个工会流派尽管它抱有“经济主义的”思想体系,却丝毫不去反对由党的领导的改良主义一翼所维护的、在其手段上仅仅限于通常议会制的和其他资产阶级方法的政治行动的形式。(4)(5)这种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在世纪转折之交在国际上表现为“伯恩斯坦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俄国则直接表现为“经济主义”和“取消派”(Liquidatorentum)。作为这种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的对立倾向,在国际上和俄国范围里产生了最鲜明地由列宁所代表的派别;这个派别主张无产阶级一切经济的、文化与思想的运动,无条件地服从于由革命政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6)这个“政治”第一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在当时面临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理当获得它原则的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并且采用从其政治原则中产生的极权主义,去决定迄至今日的俄国苏维埃国家的全部结构与发展。(5/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里在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有个唯一的派别,强调了经济斗争由直接的工人要求上升到争取社会权力的斗争的革命意义,并从而同时反对那种改良主

义的假经济主义和反对单纯政治的，即基本上纯粹资产阶级的、党的领导的假激进主义，维护了革命的经济倾向；这个唯一的派别就是围绕在罗莎·卢森堡周围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翼。这个在德国的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7)激进的无产阶级的(7)倾向，在战时和战后时期最初的直接革命阶段转变为直接反议会主义和反工会的、共产主义的左派激进主义，它同某些地道的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的流派一起，开初强有力地参与建立革命工人阶级新的国际战斗组织，但是随着旧的资本主义状况日益稳固它到处重新陷入不利的境地，并且在激烈的、由列宁本人领导进行到底的派别斗争中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①。

(8)正如这种简略的历史概述表明，革命的“经济”派尽管它在理论上把在社会生活各条战线同时进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归结为这种斗争的基本形式，然而实际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中从整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甚至被像列宁这样极端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间接地承认，即当他在反对这一“极左”派别的斗争中通过下述独特的言论提到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变种更大的危害性：(8)“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② 它在其理论中，虽然仅仅以不充分的和几乎是神秘的、使客观经济发展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中介地等同的形式，但总是坚持着同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整体的联系(9)。

^①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出处同上。

^②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页。

第十三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Ⅱ： 所谓的相互作用

同这种从经济主义观点缩小马克思唯物主义第一个极端倾向相对立的，是更多“社会学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意图在于：通过协调由不同领域彼此施展的“相互作用”或者社会诸领域全面的“互相依赖”，替代那种把一切社会关系与发展“片面地”归结为物质生产。它由于这样放弃了经济学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模式中特别意义，因而也摈弃了新的唯物主义原则的特殊性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显得不再是作为唯物主义科学的原则，这种科学对一切历史事实是从它们同物质生产的联系中去进行研究。唯物主义历史现在最好的情况下还表现为普遍的、经验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它与任何从外部加进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去说明一切事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构成全部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的基础，而仅仅是把由唯物主义历史观以一般的形式为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所阐明的基本原则，运用于特别的部分领域。除了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展现出已阐发形式的唯物主义经济学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作为事实上尚未阐发的、但在理论上同样合理的、唯物主义总体系的其他部分，即唯物主义的政治学、法学、文化理论等等①。

通过这种把马克思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分解于一系列彼此并列的社会学的个别学科之中，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不仅在理论上被夺去了任何确定的内容，而且它实际的革命性质也从

① 参见我的文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柏林1922年，特别是第11页以下，重刊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第125页以下。

根基上同时被消除了。取代对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彻底攻击，是从理论上对如下事物的批判：即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个别方面，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以及其他文化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不再必然地导致革命的实践，而是能够同样顺利地走向（并且在它实际的发展中已事实上走向）各种各样的、基本上不超越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国家的基础的改良企图^①。

(1) 对于恢复马克思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理论与实际上完全的意义来说，构成出发点的是这样的认识：通过引进所谓的“相互作用”，对在此原则中已包含的关于一切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所谓精神的现象的联系，总之整个社会生活过程中贯穿的联系的见解，并未补充任何东西。只有在毫无根据地把马克思这个论点的完整意义（它是从把这个论点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中产生的），归结为以其抽象的阐述单独强调的、关于物质生产的首要意义的基本论断，才会产生这样的假象：似乎这个论点现时为了它的有效性与完整性，还需要这种事后的一般化和“补充”。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时伊始不言而喻地(1)由此出发：“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②

在这里除了在唯物主义模式中(2)表面上单独被考虑到的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版第83页。

^② 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意识的作用，(2)他们还理所当然地阐明了直接从生产本身中产生的统治与奴役关系，“从它方面决定性地反作用于生产”所采取的形式。他们也不把所谓的“精神生产”当作物质生产简单的反映，更确切说，他们用物质生产当时历史形式的特殊观点，阐述了“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①。

他们同样还在经济学本身范围内考察了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总的说来考察了“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②。从黑格尔观点上，也就是在他们制定出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之前，他们就远离下述两种在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等中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一方面远离那种“粗率和无知”的抽象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采用此种方法把生产同分配、流通与消费，尤其是同像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首先或多或少任意地分割开来，以便然后重新扬弃由他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分离，在其中他们“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③；另一方面远离那种同样不充分的形式，例如由哲学家，“社会主义的美文学家”，但还由某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这些不同的领域当作直接同一的领域来看待^④。

他们自己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同领域(它们在一起展现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体)之间关系的观点，确切地符合马克思在某些段落之一，即在那里对这样的一般问题作

① 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4页以下，特别是296页以下。

② 参见《1857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7页。

③ 参见《1857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8页。

④ 出处同上，第744页。

详细表述时，关于物质生产本身各个要素的关系所讲明的看法：“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

(3) 他们的唯物主义原则的所有这些结论，对于经历过黑格尔学派的研究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以致他们在开始和一个较长时期根本没有想过：他们对黑格尔从观念中（这在黑格尔那里一切不过是意味着维护片面的因果联系）推引出全部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思想的现象与发展作唯物主义的颠倒，可能被误解到这样的地步，即虽然政治现象可以从经济现象、分配形式可以从生产形式推引出来，但是在此当中政治对于经济的发展、分配对于生产的进行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只有通过事后引进所谓的反作用和相互作用才能获得这种意义。撇开其他的一切不说，这样的理论观点对于他们说同时还意味着：在社会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仅仅是政治的发展

^① 参见《1857年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748—749页。

依赖于经济，相反，在政治或法律的领域最巨大的变化似乎对经济的发展是无关紧要的。从而他们自己的涉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政治的与科学的著作，对于他们以此所企求达到的实现全面地变革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似乎是变得毫无意义的。(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晚年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著名的书信自从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以来^①，便构成了一切修改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的“改良者”的主要资料。如果说他在这封著名书信中同样讲到了唯物主义模式某种片面性，那末唯物主义历史观共同创始人的这种事后的自我批评对于如下方式来说，即这个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由他与马克思在他们的理论著作中的运用和给他们的实际政治提供基础的方式来说，决不是有根据的。在这里正如在其他由我们已研讨过的问题(例如在必需从“哲理上”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上一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晚年不再在所有的要点上，坚持他与马克思一起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上一世纪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来说所达到的巨大科学进步。他在对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较年轻的追随者例如在弗兰茨·梅林的《莱辛传奇》里^②出现的过分抽象与教条的观点进行友好的(4)批评时，把大部分责任归之于他自己和马克思；当时他说明，“我们大家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③。他以此无意地助长了理论上后起之辈的另一流派；这个流派在反对过于简单化与“庸俗化”地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斗争的借

^① 《社会主义文献》(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I, 斯图加特1903年, 第65页以下。

^② 参见《新时代》X(1892年), 第540页以下。

^③ 参见梅林在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公布的、摘自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他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第93页。

口下，而实际上正如它后来的发展所表明，在当时已经完全致力于通过钝化这一新学说革命的要旨而使它在学科上适合于上流社会的东西。他没有及时地认识到：正是在这一流派反对有时过于粗率的、但整个说来是较忠实地坚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核心的梅林派的斗争中，当时在理论舞台上已清晰地显现出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它后来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党实际的政治与工会运动中竟然占据了优势，并且它经过了1914和1918年阶段在1933年走向了它的彻底破产^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谓的片面性，实际上仅仅表现在他们(5)过分地从哲学上的表述；这种表述对于他们的同时代人，尤其是对于较后的、毫不了解黑格尔的儿辈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正如一切理论表述一样，关于在社会各时期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精神的结构之间(5)联系的原理，和关于这些结构的联系的历史发展的原理，是由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经验地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和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的“主导思想”；它们以其理论的形式必然包括对一定的历史事实和事实系列的总括，它们是由科学的研究与实际的政治从这种事实和事实系列中推引出来的，并又被运用于这种事实和事实系列。如若以或多或少神秘地设想的、实际历史的“经历”的“完整性”，或者还以尽可能详尽地模拟这种具体经历的、纯粹记述历史的

^① 在这里提到的产生于1890—1894年恩格斯书信的收信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像桑巴特的学生瓦尔特·博尔吉乌斯(海因茨·施塔尔根堡)那样，对于马克思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从来没有明确的态度，就是像康拉德·施密特和约·布洛赫那样，从表面上完全希望作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很快发展成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一翼的理论主要代表。这些书信于1903年(在赋有特征的标题《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作用范围》)在数年前开始的修正主义辩论中公开发表。它们的发表对于它们的编辑者爱德华·伯恩斯坦来说，构成了他反对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唯物主义的和革命的特性的政治斗争一部分。

或艺术描绘的方法去衡量它们，那末它们实际上是“片面的”。但是，这种片面性只不过是科学形式的普遍性的另一个名称。如若人们抱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那末他们有同样的理由抱怨物理学家的“片面性”；物理学家让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物体各种各样实际运动，都服从于自由降落的定律（万有引力的定律），而不考虑由他们把全部由次要情况引起的变态吸收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中去。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示了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之间“规律性的”联系，并且它作为启迪性原则为严格经验地、在这里也就是历史地研究社会事实提供了基础；完全像在由技术采用的物理定律时的情况一样，在这种“规律性的”联系中这种规律理论与实际上的有用性正是奠立在它所谓的“片面性”的基础之上。

可见，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着手进行的对唯物主义模式的扩展，实际上并没有克服这个模式所固有的、有缺陷的片面性，而仅仅是损害了它科学的适用性。关于社会各领域(6)“相互作用”或普遍的“彼此依赖”的理论，在由后来的改良主义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判者和补充者所发挥的形式中，在任何情况下不会(6)提供这样的根据：人们是否应当在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中或者在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中，探寻在社会生活任何一个领域中出现变化的原因——也可以说导致这种变化的手段。这种有缺陷的规定性也不会通过下述方式得到弥补：人们以任何不精确的讲话方式把经济基础连同其发挥的作用，称作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性的”因素，相反把上层建筑连同其对基础的反作用，称之为社会发展“第二性的”因素；或者说明，经济关系构成“最后的决定性的要素”，或者实际的关系对于人们的行动来说构成现存的和有条件的环境，在实际的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

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①

第十四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Ⅲ：校正

所有这些论调只不过是这种无用的企图：即面对着19世纪下半叶已变化了的科学思想方法，坚持在黑格尔哲学的“概念”^②中关于实体性、因果性和相互作用的“辩证的”结合。如若向经历过黑格尔学派的较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或者向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分子新一代，提出由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与思想传统产生的问题：“经济关系在何等程度上起到原因的作用……（是否是发展的充分原因、起因、持久条件等等）”^③？那末对它的首要反应则表现在反对这一新世代的潮流中；这个新世代堕落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对辩证法博大丝毫不能理解：“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

① 参见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施塔尔根堡（实际上是致博尔吉乌斯——译者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8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卷，第142—159节

③ 由桑巴特的学生博尔吉乌斯（施塔尔根堡）向恩格斯提出的和由后者于1894年1月25日回答的两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的原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8页。

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①。他们在这种不完全地维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对它的唯心主义神秘化从他们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了最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在这种不完全地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在反对新的（实证科学的、以自然科学为样板确立的）、同时代另一些人的思想方法时，能够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概念”中拯救出来的东西，不再是在黑格尔那里与其他范畴联结为哲学的研究方法统一体的、相互作用的辩证范畴，而仅仅是通过同样抽象的“相互作用”对抽象的、因果性科学概念的补充^②。但是在这种抽象中“相互作用”已被黑格尔轻蔑地当作纯粹的“反思的庇护所”（Zuflucht der Reflexion）来看待，即当作“不充分的范畴”，它对于“观察自然界和活生生的有机体”，尤其是对于“历史的研究”来说已不再敷用了。从这种意义上他嘲讽了当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运用相互作用这一范畴所采取的形式。“假若我们例如把斯巴达民族的习俗看作是它制度的结果，或者反过来把这种制度看作是它习俗的结果，那末这种思考总是正确的。也因为如此仅有这种观点还不能令人最后满意，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既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制度，也不能理解它的习俗……”^③

2.51) 这样，~~通把~~把“相互作用”吸收到唯物主义模式中在自然科学因果联系的思想方法的范围里，同时还要无改变地把哲学的辩证法保持下来；因而这种“相互作用”便成为不伦不类的东

① 参见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91页；还可参见在列宁1914年的警句中完全类似的语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本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② 对此我参见我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二版，脚注56，第98页。

③ 参见《哲学全书》第1卷，补充I，第156节。

西：它既不是神秘而模糊的但内容丰富的黑格尔哲学，又不是现代的、精确的自然科学的概念规定。没有充分精确地从数量上对“多少”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定，没有精确地说明它们这个或那个当时产生的条件，那末正是由于吸收对于因果性来说既应是从属的又应同样是甚为平等的“相互作用”，关于经济基础对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意义的学说便会变为毫无意义的、科学上不适用的空谈。

带有这种“片面性”是伟大的革命的和划时代的新理论所固有的东西。由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在以前历史时期提出的“环境论”，后来被罗伯特·欧文彻底贯彻于创立他的共产主义。这种“环境论”的进步意义恰恰在于它的片面性；它采用这种片面性从历史发展各种各样的因素中，突出了迄至当时未予重视的因素。当人们朝这样的方面对这种理论作“补充”时，即人虽然在一方面是他们所处境况的产物，但另一方面他们甚至共同决定这种境况，就此而论反过来成为了原因即他们所处境况的生产者；这时这种理论便丧失了一切意义，甚至丧失了那种独特性与深刻性的假象。这种假象用一种由泰纳(Taine)这样的反动分子事后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使它表现出来的讽刺画般的形式，赋予这种理论以某种精神丰富的外观。这样的“补充”尤其是对于继续发展了的并以特定内容充实了的形式，即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环境论在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的唯物主义中进一步完善所获得的形式来说，是多余的和有害的。马克思关于财产关系“只是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这一原理，在下述情况便由一种在理论上新颖的和在实际上重要的科学发现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即当人们用新德意志法哲学的完全实证的“无偏颇性”对它作这样的补充时：虽然一方面应当把法理解为对于经济内容来说的纯粹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把

经济关系理解为纯粹的“法的关系的普遍现象”。并因而二者应彼此交互作出解释^①。

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基础”同法律与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具有特别性质的联系和关系。对于确定这种联系与关系的特别性质来说，就这种普遍形式而言无论是哲学上对“辩证的”因果性的概念规定还是以“相互作用”来补充的自然科学的“因果性”，都是不敷用的。20世纪的自然科学已经认识到，在一定领域里活动的研究者致力于探明这一领域的“因果”关系，总的来说这种关系不能以一般的因果概念或因果法则的形式作出精确说明，而是对于任何特别领域来说应“特殊地”进行确定^②。对于这种确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支配着历史社会实际的人的生活领域的特别联系来说，在那个时期是由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哲学形式进行的；后来不再以哲学的但尚未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形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1）唯物主义进行的。在这个领域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获得的成果的主要部分，不在于在理论上阐明了新的原则，而在于将这种原则特别运用于一系列部分在实际上重要的、部分在理论上困难的并迄至当时尚未开始解决的问题^③。

① 参见鲁·施塔姆勒：《从唯物史观来看经济和法律》(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莱比锡1896年。

② 参见菲利浦·弗兰克：《因果法则及其界限》(Das Kausalgesetz und seine Grenzen)，维也纳1932年。

③ 属于此列的譬如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末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9页以下〕提示的、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不平衡发展”的问题：物质生产同艺术生产(和不同艺术品种彼此间的)不平衡发展，美国同欧洲的教育关系，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等等的“不平衡发展”等等。此外列宁关于“在不同国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柏林1931年)第1章中(二月革命)，所运用的“综合发展的规律”，以及由瓦尔加(Varga)和其他人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发展经常落后于物质的发展的“规律”。

较精确地科学确定这里存有的联系，即便在现今仍然是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未来任务；这种研究的重点再度不在于对在马克思著作中内在包含的原则从理论上作阐述，而必须摆在对它们作进一步的运用和检验。在此过程中人们首先不应当谨小慎微地把那些通常仅是形象地表述的惯用语抓住不放；马克思运用它们把这里存在的特殊联系描述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描述为“适应”等等。

马克思在其表达方式中无论对用语还是对各时期加进其中的补充意义，都是自由的看待。例如他把社会的历史发展有时表述为物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有时则描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状态有时当作生产关系同象“国家”与“法律”之类的制度产物之间的关系来运用，有时则直接作为无产阶级同由这个最下层承受的、通过它的起义炸毁的官方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来运用^①。如若有人要调和马克思论点与论据之间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即“阶级的划分”应当溯源于经济，反过来阶级斗争又“反作用”于经济关系的发展，那末这是徒劳无益的钻牛角尖。而实际上这里所涉及的是两种起源相同的、并非彼此推导出来的形式；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联系以及对其进行彻底变革的手段的、在客体与主体上唯物主义的学说中，为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需要而制定了这两种形式。它们可能被无产阶级按实际情况将这一或那一形式或者两者合在一起，当作手段去尽可能最正确地解决各时期考虑到的任务。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马克思的概念，正如在较后的马

^① 一方面1859年《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7页以下；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以及产生于他的最后时期的笔记，《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1—435页。

克思主义者索列尔(Sorel)和列宁最清晰地理解到^①，不是被认作新的教条主义的桎梏，即不是被认作先验确定的、运用唯物主义进行的研究在一定序列中必须完成的前提，而是被认为完全非教条地从事研究与行动的指南。“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

第十五节 结 论

马克思对社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

1. 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于经济；
2. 还从社会角度去理解经济；
3. 历史地判定一切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判定为革命的发展，它的客观基础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它的主体承担者是社会的阶级。

在此三个一般性结论中已经包括了在理论与实际上特别重要的部分结论，例如4.准确地确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和5.把一切所谓“精神的”现象——一部分是被颠倒的（“意识形态的”），部分是对于一一定的历史时代客观上有效的——归结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详尽地分析这种关系尚有待于作特别的论述。

为了赢得这些结论，马克思利用了部分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部分是在吸收当时一切现存新的文化因素情况下独立阐发的参考资料；他自觉地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反对派立场上把这种参考资料称之为他的唯物主义，并且面对一切可能的运

^① 参恩若·索列尔，《现代经济学导言》，1919年第3版。(2)第385页以下和列宁的文章，特别是产生于他的最初时期的同“客观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论争，《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481页。

至当时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他适时地使用一个或许多形容词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从其主要倾向来看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方法。它包含着实际地解决这样的任务的开端，即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按折中主义方式搬用于社会科学仅仅表面上解决的任务。取代把由自然科学家经数世纪之久的工作阐发的并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严格相适应的、而且在大规模的专门研究中有极大差异的方法，完全现成地搬用于社会研究，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把它的任务看作是制定历史社会研究的特别方法——工具论 (eines novum organum)，它必定使得社会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域里，在无成见地研究现实的道路上破除迷信，并且“真实于自然科学地探明”在由“思想”掩饰的无限紊乱下隐藏的现实真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核心就在于此。

但是，从形式方面来看马克思的方法迄至今日却很少发展。正如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始终束缚于特别的自然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同样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完全摆脱它产生时期影响一切的黑格尔哲学方法。它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还没有在它自身基础上发展，而相反地它刚刚从唯心主义哲学中产生出来；因而它在每个方面，在内容、方法与用语方面仍然带有它所由产生的母体即旧黑格尔哲学的胎毒。所有这些缺陷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产生的时代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它连同所有这些缺陷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社会研究的其他流派；并且这种情况在现今仍然如此，尽管在此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形式上完善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创立的方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比较微小。它部分的哲学形式并未曾阻碍它得出一系列重

要的和迄至今日有效的科学结论。

由于以黑格尔为出发点(1)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1)实现了同整个上一时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总和的联接；它采取了同样相对立的形式，即在实践上无产阶级的社会行动在继续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运动时所采取的对立形式。

黑格尔哲学尽管它从整体来看的唯心主义性质，但对于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包括了比较旧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数量更大与形式更展开的、可供利用的因素；这是因为它适应于历史发展的一个进步阶段^①。我们以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学说为例来看，由黑格尔并入他的体系的部分构成要素，是多么松散地同这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整体相联系。黑格尔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以类似的方式毫无疑问地可以按唯物主义而不是按唯心主义去理解。

这种在方法与内容上对黑格尔哲学的成果的继承，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理论来说决不带有受约束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在黑格尔那里联结为唯心主义体系整体的因素，从迄至当时的联系中析出，并把可利用的部分同取自不同方面的其他因素联系起来，结成唯物主义科学的新整体。黑格尔对于他所处时代来说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兼收并蓄的天才，是在理论与实践上渴求不息的“哲学家”；他在其体系中包罗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任何前人无与伦比的巨大领域。尽管如此，由黑格尔所积累的思想资料仅仅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使其流入他们新的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宽阔巨川的泉源之一。他们从各个方面吸取

^① 从这个意义上列宁于1914/1915年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史》时写下笔记：“聪明的唯心主义比起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5页。在列宁看来，“愚蠢的”唯物主义就是与“聪明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聪明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相对立的、未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唯物主义。

东西。他们从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李嘉图那里吸取了从经济学上论证阶级对立；从蒲鲁东那里接受了宣告现代无产阶级是唯一实际革命的阶级；从封建的与基督教的、对由18世纪革命中产生的新经济制度进行指控的人那里，获取了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的无情揭露和充满仇恨的、激动人心的抨击；从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里吸受了对现代生产方式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敏锐剖析；从黑格尔左派始初的同路人特别是费尔巴哈那里，获取了人道主义和行动哲学；从同时代的工人政党——法国的改良主义者和英国的宪章派——那里，汲取了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从法国的国民公会、布朗基和布朗基分子那里，接受了革命专政的学说^①；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吸收了他们所确定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全部内容：全面地变革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以及使国家转变为纯粹管理生产的部门。他们在继续完善他们的理论的过程中，还兼收并蓄了一系列其他东西增添到最初吸收的东西中去，例如19世纪史前史研究的、由摩尔根结束的整个发现时代的成果。

正如马克思的新科学按其理论形式来看首先是严格经验的社会研究，即社会的自然研究，那末就其内容而言则首先是经

^① 参见由梁赞诺夫公开发表于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文学报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创立文献的第一个文献，它是由布朗基主义者茹·维迪尔和亚当，以及维利希、马克思、恩格斯和乔·朱利安·哈尼签署的。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内参与的团体，使得不断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布朗基主义口号对协会具有纲领性的约束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关于马克思对布朗基的态度还可参见发表于《〈新莱茵报〉评论》第3期（1850年夏）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04页以下；以及1850年6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作为《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刊印（新版，苏黎世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6页。

济学。(2)唯物主义的研究家马克思开始是作为对宗教、哲学、政治和法律的革命批判者，他后来越来越多地把他的社会研究集中于经济。以此他并没有把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领域缩小。在《资本论》里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只是偶尔在清晰阐释广泛领域的注解中，得出了有关国家，法律、哲学、艺术、宗教等等的唯物主义新原则的结论。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方法上的出发点是，通过研究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及其历史的变化，就已经研究了一切在当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构与发展中，能构成严格经验的、在方法上“真实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对象的东西。(3)那种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当作一般社会科学领域看待的社会关系整体，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构成客观科学认识的领域，即只有当它受到了、历史与社会的经济科学的研究与说明。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我们早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社会学”之间关系的讨论，用这种表面上怪诞的、但对于最后的和最成熟的马克思科学的形式来说实际上击中要害的如下论断来作补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3)

对于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说的其他学科来说就只留下了由于远离经济基础而使严格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少地涉及的、越来越少地带有“物质性”的、始终是“意识形态的”的领域；而对这个领域一般地说最终不应再以实证的与理论的方式，而应仅仅与革命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密切相联系批判地加以探究。

构成新的马克思科学最后基础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从历史发展的现实中，即从17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和19世纪无产阶级新的革命运动中，获得了它决定性的推动力。对产生过程

的叙述表明：在马克思学说理论发展的任何新的转变中，是多么精确地并同时多么有力地反映出社会的现实历史的新阶段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在这种社会的现实历史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所涉及的问题，决不是现实在理论中纯粹消极的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运动的真实历史中以理论的观点与概念为形式所获得的东西，他们随即以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的形式，并以对这种斗争的展开与提高迄至今日历史地继续产生影响强大的推动作用，把它们又交还给历史。

这种实际地参与历史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概念和任何理论阐述所服从的伟大目的。这个革命的原则迄至在他晚年的文章里构成了他全部的理论著作。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讲明了这个原则，即当他对政治上不充分的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进行粉碎性的批判时，最后以坚强有力的锤击而告结束：“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附 录 I

原稿和带有手迹校对的打印稿。

——刊印出来的是修订过的文稿。

180 萨瑟兰 阿韦纽，1934年9月28日

伦敦 W. 9

亲爱的卢姆耐博士：

我建议，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其社会学序列主要按如下观点来处理：

第一部分

马克思的社会概念(“市民社会”)

I 先驱者

1. “17和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
2. 康德、费希特、谢林、施莱艾尔马赫、黑格尔、黑格尔左派(甘斯，施特劳斯、费尔巴哈、卢格，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莫泽斯·赫斯，弗里德里特·恩格斯)
3. 蒲鲁东

II 马克思社会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

1. 迄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
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在《资本论》中

III 马克思社会概念后来的发展和

1. 向史前史的伸展(摩尔根)
2. 社会的历史最终从宇宙学观点纳入一般的自然史

附录：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社会概念的特殊差异性

IV 关于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特殊要素的丧失与恢复的概况

1. 在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安东尼·拉布里奥拉、伯恩施坦、列宁)那里
2. 在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等等)那里
3. 在法西斯分子和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那里

第二部分：

马克思社会概念的特殊要素

I. 唯物主义的转变

II. 经济基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的“结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序列

III. 上层建筑

1. “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

2. “社会的意识形态”^①

附录：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和一般的意识形态学说（从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至帕雷托和墨索里尼）。

理论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和神话

关于“社会心理学”的附录

IV. 社会和阶级，社会和国家（马克思的阶级与国家理论的一般基础）阶级与国家概念狭义与广义的应用：

^① 这一小段尽可能成为一个特别部分。

1. 应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
2. 应用于“人类的成文史”
- V. 社会的意识和社会的实践
 - 阶级和阶级对立，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

第三部分：

社会发展的理论

- I. 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
 1. 资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
 - a. 概念的规定
 - b.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在德国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那里雅各宾的传统
 - c. 工人政党在欧洲外交政策中的策略
 - d. 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
 2. 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概念的两个发展阶段
 - a. 政治的 = 局部的、社会的 = 全面的革命
附录：关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1900年在修正主义分子与正统派之间的争论中，在卢森堡和列宁那里的“改良与革命”
 - b. 社会的 = 经济的革命
附录：关于马克思对工会和对政治行动与经济行动之间关系的态度
 3.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意义
 - a. 对于《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来说
 - b.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说
- II. 革命和反革命
 - 革命的周期及其阶段。
 - 革命作为客观的过程和主观的行动。

在革命过程的客观内容同“革命者必然的自我迷惑”之间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在革命行动的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解决。

Ⅱ. 马克思的革命专政的理论

1. 马克思的专政学说的历史来源
2. 马克思的专政学说的核心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崇拜专政理论的最初来源
附录：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态度
附录：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专政与“废除国家”问题的态度
4. 列宁于1917年通过苏维埃俄国对马克思的国家与专政学说在理论上的恢复
5.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意大利、德国
6. 消除对马克思专政理论的崇拜

第四部分

马克思社会学认识的理论

I. 领域：“历史与社会实际的经验世界”

附录：关于马克思的自然界与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与统一

Ⅱ. 方法

1.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附录：关于在迄今历史作为“人类社会史前史”的马克思理论中，在史前社会的观点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因素

2. 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附录：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1860年向黑

格尔辩证法逆转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哲学的扬弃”的态度

3. 马克思的方法同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同现代自然科学的经验—公理方法之比较
4. 主体的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的认识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附录：关于哲学和科学的阶级性质

Ⅱ.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

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柯尔施

附 录Ⅱ

原稿连同三份复印稿，原稿是以速记方式作了编辑加工，复印稿则未作校改。

复印稿带有为保尔·帕尔托而写的速记式说明：“1934或1935——早先草稿第一部分。完全没有加工，未作校改，甚至带有笔误。在此时期已用墨水笔作了校对。为您和贝(特)·布(莱希特)提供的正确稿本随后会到达。”注明日期的笔记可能是后来添上去的。

被刊印的是复印的文本，显然的笔误得到改正，拼字的特点保留下来。

关于经济和政治的提纲

(社会学的问题)

- I 马克思的理论还在其作为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充分发展的形态中，也保留了经济学理论

的形式。

- I, 1 它历史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它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产生并构成其思想补充）来进行批判。
 - I, 2 它从社会学观点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从属于它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把表面上物的关系，即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在劳动产品之间以其完成的形态存在的关系（这就是由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商品价值关系），归结为人们在其生产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 I, 3 它宣告实际地消除这种特别的、生产的历史形式，和从仅仅间接地与事后地、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不完全地同社会需要相协调的资产阶级商品生产，过渡到直接地对生产的社会调节。
- II 尽管如此它作为历史与社会的实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仍然是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转变为直接历史的与社会的科学与实践。
- II, 1 马克思的经济学同所谓的“历史学派”较之同古典形式的和古典之后形式（庸俗的）理论经济学相比，处于更加尖锐无比的对立之中。
 - II, 2, 1 正如马克思尖锐地批判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商品派物教一样，他同样尖锐地批判了与此相对立的、在浅薄之辈那里当时和现今产生的这样的观念，即它“在价值中仅仅看到社会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仅仅看到它无实体的现象”。他还纠正了在历史上与实质上不属于这种浅薄之辈而属于古典学家的加

利亚尼(Galiani)那里的同样缺点：“如果加利亚尼说：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那末他必须加以补充，它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他对却步于关于商品的价值与价值量的拜物教观念的资产阶级的古典学家加以颂扬：他们分析了这些形式并揭示了其中所隐藏的内容，虽然这还不是完善的。

Ⅰ,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反对“暴力论”的三节中)还更加严厉地抨击了这样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即他们无视经济学或者充其量承认某些一般的和无变化的经济的“自然规律”，从而把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等等实际的变化与发展，溯源于纯粹的暴力、政治等等。

Ⅰ, 3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唯物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直接地同教条主义的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相对立；后者不考虑资产阶级物质的经济发展，希图从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直接地过渡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完满的社会生产方式。

Ⅱ 一方面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论同社会发展的其他理论相比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它的局限性，就存在于这种经济的形式。

Ⅱ, 1 这种“局限性”不是指理论上的局限性，即它可能被更敏锐的、更冷静的、更全面的、更深刻的、更一贯的思想所超越，而是指一种历史的局限性。

Ⅱ,1,1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历史局限性的存在对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来说，正如对于实际地变革社会的行动来说一样，完全是

理所当然的。

- Ⅱ, 2 正如任何形式一样, 社会理论的经济的形式本身, 既不是肯定的又不是否定的; 而只是在历史的过程中才由认识的发展形式变为认识的桎梏。
- Ⅲ, 2, 1 (同样任何语言, 一种语言的任何相继出现的形式, 首先是思想和行动必要的手段: 思想的发展形式, 它只是不可避免的固定化才变为它的桎梏。)
- Ⅱ, 3 可见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否正确地保持了经济形式。
- Ⅱ, 3, 1 问题在于弄清: 通过这种形式什么东西获得了发展, 通过它什么东西在其发展中 (同一时期或后来时期) 遭受了阻碍。
- Ⅳ 正如(按照我的著作第二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社会理论, 在整体上不是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 而且研究现今的并在此处是唯一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 同样, 马克思的这种社会理论的特别部分以经济学的形式研究了物质的生产, 而构成其研究对象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而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 Ⅳ, 1 但是,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仅仅是研究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研究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产生、发展、衰亡), 和无产阶级争取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斗争。
- Ⅳ, 2 但是仅仅通过这种研究对象的部分一致性, 对于马

克思的理论来说只是说明利用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容的必要性，然而并没说明这样的必要性：即在继续研究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要按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对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本身加以利用。

V 无产阶级的理论虽然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的)范畴，但是它不能通过其他直接社会的范畴完全取而代之，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实际的阶级斗争在那样的发展阶段，即它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和在世界范围里也许现今仍然所处的阶段上，仅仅能够在实际中攻击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形式，但不能完全把它彻底推翻和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形式取而代之。

V,1 马克思在其思想未发展的哲学阶段，把超越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任务宣告为不纯粹是理论的、而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可解决的任务。

V,1,1 马克思在此阶段上以哲学的形式已经获得了一切较重要的革命见解，后来他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纳入他的科学的经济著作《资本论》之中。

V,1,1,1 这些段落构成了资本理论狭义的“批判”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探讨资产阶级古典作家的经济理论(直到他们的最后结论)之后，在上述这些点上还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框架。(参见我出版的《资本论》前言，柏林1932年，第19页以下。)

V,1,2 马克思后来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如若人们愿意这么说的话，从而从“社会学”上表述了它的特性)，在较早的阶段他用黑格尔的“人的自我异化”

的哲学范畴对它们的特性作过表述。

V,1,2,1 如此以唯物主义方式把黑格尔的范畴运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这决不是处于“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之外。由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形式（这时马克思把它阐释为“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已在黑格尔哲学中构成了对于这种特别的、使哲学“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遭受的困境来说的实际基础。

V,1,2,2 哲学的概念“异化”最初确定地运用于货币、价值和信贷这些经济现象，存在于1844年马克思的摘录笔记里对老穆勒（älferen Mill）的著作的评注之中。在这里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论述是：信用业和银行业在当时（在我们当代又重新出现）被圣西门分子和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的庸医们，美化为“逐渐地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为什么它们在实际上仅仅“是如此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作为它们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摘录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贝魁尔（Pecqueur）关于“创造财富的魔力”的文句，这种魔力是通过劳动，也就是通过人赋予死的材料要素的。

V,2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哲学阶段已明确地认识和讲明：为了扬弃在当前实际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观念中表达出

来的现实异化，单纯的理论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首先需要通过社会的行动彻底变革基本的现实状况。

V,2,1 他还提到了将消除这种现实的“异化”的社会主体，工人。

附录Ⅱ

原稿带有手迹的校改。1935年10月底—11月初(柯尔施1935年11月2日致帕尔托的信)校正过的文本被刊印，明显的笔误被改正，拼字的特点保留下来，提到不要保留的注释被删除。

第十节

《资本论》的全部理论，即便在它表面上纯粹作论述与分析的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是革命批判的观点。不过，这种处处可见的现实批判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或多或少展开的形式。人们在类似地运用从哲学中产生的著名区分的条件下，才可以谈得上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超验的、内在的和超越一切范畴的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批判是超验的，实际上超越经济学的界限的，在大量的、在篇幅上显得不大但内容上极端重要的那些段落里，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提出的原理直至它最后的理论结论进行探讨之后，最终地突破了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并且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和隐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经济学范畴对立之下的、社会阶级现实的对立与斗争，从经济学的论述过渡到直接历史与社会的论述。

但是即便在那些地方，马克思通过对经济范畴进一步进行提炼、概括和更彻底地贯彻，显得看到了伟大的资产阶级经典作家的的工作，他的论述也无论如何都包含了批判的倾向。这些

论述服务于把经济学的概念与原理引导到这样的界限，即在那里隐藏在它们下面的历史与社会实际的现实被人们得以看清和遭受攻击。这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或者是把考察的角度从现成的劳动产品转移到为制造它所必要的劳动，或从商品交换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的领域和在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是通过表面上纯粹术语上的改变对传统的、把工资释义为“劳动的价格”的经济学观念，作这样精确的说明，即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为了工资而被出卖给资本主义企业主。

但是，在《资本论》中规范的与典型的批判形式，既不是第一种(超验的)，也不是第二种(内在的)，而是第三种(超越一切范畴的)形式。在这种批判中基本上不是超脱于经济学认识的形式，而只是对它加以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的限制。政治经济学被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待；它从属于生产的一种特别的社会形式，即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并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补充。这一点的实现一方面是通过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首先是商品与价值这些基本范畴所固有的“拜物教的”性质；这种拜物教性质在于：在范畴中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商品的价值关系)的迷人形式。另一方面它的实现是通过证明：经济学范畴尽管它们具有的“拜物教的”性质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性质而表现为必要的形式；通过它那种特殊的、历史的和历史暂时的、不完全的社会性形式(这正表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而它最一般的性质由康德制定的用语“不合群的社交性”(ungeselligen Geselligkeit)作了最出色的说明)，在这一时代的社会意识中表达出来。因此，经济学范畴虽然不如伟大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于认识经济事物本身来说是无时间限制的有效形式；但它们确然“对于这种历史

上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来说是社会有效的从而是客观的思想形式。”它们作为这样的形式，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则(第十一节)，与这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物质现实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只要这一生产方式通过无产阶级实际革命的斗争仅仅是受到攻击与动摇而不是被彻底推翻，那末资产阶级时代的这种社会现成的思想形式因而仅能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批判，但不会被它最终地超越。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始的从理论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它进行到底；这一革命在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现实的同时也改变从属于它的意识形态。一旦社会的生活过程即物质的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们的产物而处于他们的自觉监督之下，那末政治经济学这一拜物教科学便会随着商品生产的拜物教，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直接的社会的理论与实践。

附录IV

原稿带一份复印稿片断。原稿以速记式手迹作过加工，复印稿则未作校改。1935年12月中(柯尔施1935年12月16—17日致帕尔托的信)。

复印稿文字被刊印，明显的笔误被改正，拼字的特点保留下来。

第十节 经济和政治(社会学问题)

马克思的理论虽然在其形式上是经济学和经济学批判；但是，它在其充分的发展中事实上不再是经济的、而是历史与社会的科学，在其实际倾向上则是革命的科学。作为历史的科学它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物质生产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来

进行研究。它同时从而还把“政治经济学”本身明确为社会意识的特别的历史形式。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它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并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补充。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包括作为它们全部范畴基础的最一般的范畴“价值”在内)，是历史的，这就像用它们所指明的并(从历史上进一步发展了的无产阶级理论的立场来看不完善地)阐述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历史的一样。

由此出发，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还开辟了认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特殊社会形式的道路。正如以往一切生产方式一样，现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形式。虽然从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理论的立场来看它并不是完美的，但同时与以往时代相比，尽管在此时代产生了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它却是最发展的社会形式。然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这种实际的社会性质在这一时代的社会意识中——无论是在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代表人物“前科学的”意识中，还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的”意识中——都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颠倒地”表现出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社会的批判，把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条件下以其完成的形态存在于劳动产品之间表面上物的关系，还原为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它以此同时从特征上把作为政治经济学基础的范畴——商品的价值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经济学概念：资本、工资、货币、纸币、信贷、利润、地租、雇佣劳动等等，表述为“拜物教的”观念。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和在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买与卖)中产生的并且在发达的商品生产中还决定着它们的生产和不生产的价值关系，决不表达出物的特性或关系，而是表达了在物的外壳掩饰下的、以一定方式进行合作的人们在其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

系。资产阶级社会是特殊的历史形式，在其中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基本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正是在事后才以这种颠倒的形式当作物的关系被意识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的特殊的历史方式，表明其特征的是这种合作的特别形式；这种合作形式开始是由参与者无意识地实现的，并且对于他们及其科学即政治经济学来说，只是，在事后和颠倒地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的价值关系中它才被意识到，在制造一种物品时一般地说从事着“社会的”劳动（为他人的劳动），这一事实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出具有这样的特征：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作为商品具有“价值”（交换价值）。这一点取决于产品具有对于他人来说的使用价值（社会的使用价值）。反之，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在原则上问题不再在于有用劳动的质的区别；在部门众多的、通过商品交换为中介的社会分工体制里通过这种有用劳动，创造出不同劳动产品的、特别的“使用价值”，这种特别的使用价值，这种有用劳动质的区别，退居于它们纯粹量的区别之后；这种量的区别就是“社会的”，即社会有用的、造成任何社会使用价值的劳动的总额中大小不同的部分量。只有这种量的差别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表现为商品的价值。顺便地说，资本家在通过由他们购买的雇佣劳动者的有用劳动生产有用物品（社会的使用价值）时，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这种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仅仅在于由他们在生产商品时支付价值量同在出卖商品所获得的价值量之间的差额，亦或更加确切地说，在于由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为买进特定的商品（人的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量同通过雇佣劳动者活的劳动所创造的新的价值量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说其实质在于“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

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看作是最终获得的并对

一切时代有效的、理性的和合乎自然的经济制度。虽然它分析过商品的价值关系和把价值量归结为制造每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但是它从来没有发问，为什么这种内容采取了哪种形式。它的杰出的和最彻底的代表人物认清了价值和价值量的经济内容(并且不像那种浅薄之辈当时所做的那样，把“价值”仅仅看作任意的、习俗的、随心处置的社会形式)，正是他们把这样的实况，即劳动在价值中，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相对的劳动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中表现出来，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关紧要的事实〔原文照录〕。他们虽然把现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借助这种(已由亚里士多德运用于古代的商品生产)区分，并没有为认识作为生产的特别社会形式的资产阶级商品生产，赢得可供利用的出发点。他们没有发现隐藏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种两重性后面的、“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政治经济学“没有在任何地方强调和带有明确的意识把表现在价值中的劳动，与表现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同一劳动区分开来”马克思把这一点当作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Pivot)，从而他同时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社会性质和这种社会生产的特别形式……

附 录V

原稿带两份复印稿。

原稿和一份复印稿带有校改和速记式的补充，没有注明日期。

按原稿被校改过的正文刊印，明显的笔误被改正，拼字的特点保留下来；指明不要保留的注释被删除。

第十节 经济学和社会学

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它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并构成它的意识形态的补充。因而它连同它的包括最一般的经济学范畴价值在内的一切范畴，只是特别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社会意识的形式。带有历史性的不仅是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价值的派生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货币、纸币、信贷、利润、地租、工资等等，而且是作为它们全体基础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本身。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产特别的历史方式是由如下标志表明它的特征：在其中劳动产品是当作商品被生产出来。通过有用劳动，劳动产品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部门众多的、社会分工的体制中被创造出来。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这种有用劳动的质的区别退居于它们纯粹量的区别之后；这种量的区别就是社会劳动总额中大小不同的部分量。只有这种量的区别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买和卖)中表现为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

政治经济学把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看作是最终获得的并对一切时代有效的、理性的和合乎自然的经济制度。虽然它分析过商品的价值关系和把价值量归结为制造每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但是它从来没有发问，为什么这种内容采取了那种形式。它的杰出的和最彻底的代表人物认清了价值和价值量的经济内容(并且不像那种浅薄之辈当时所做的那样，把价值仅仅看作任意的、习俗的、随心所欲的社会形式)。正是他们把这样的实况，即劳动在价值中，由劳动时间长短来衡量相对的劳动量在产品的价值关系中表现出来，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和无关紧要的事实。他们虽然区分了现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是他们借助这种(已由亚里士多德运用于古代的商品生产)区分，并没有为认识价值形态的，即商品形态的，亦即作

为社会生产一个特别历史阶段的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真正性质，赢得可供利用的出发点。他们没有发现被马克思当作理解政治经济学枢纽的、“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政治经济学”没有在任何地方强调和带有明确意识把表现在价值中的劳动，与表现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同一劳动区分开来”。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中，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当作是历史的、因而是历史暂时的、社会生产的形式。他通过揭露“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发现了隐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形态后面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通过贯彻这两个批判的观点不仅给经济的事实与概念添加了其他的、历史与社会的规定性，而且还从倾向性上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整个说来变成直接的社会科学。

在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中产生的“价值”关系，在发展了的商品经济中还决定着它们的生产和不生产；这种价值关系不是表达了物的特性或关系，而是表现出在他们生产中进行合作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是特殊的历史形式，在其中正是这种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基本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只是在事后以这种颠倒的形式作为物的关系才被意识到。商品和以奇特的形式发挥一般交换手段职能的特殊商品——货币，此外一切由此派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资本、雇佣劳动、信贷等等，表现为人们交往的这种非人化的形式。马克思在他的黑格尔—费尔巴哈时期正是把这种状况称作是“人的自我异化”，并且这种状况事实上已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于哲学“观念”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遭遇的特别困境 (extremity) 来说，构成了实际的基础。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为了扬弃在当前资产阶级社会制度里存在的、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异化”观念中表达出来的现实的异化，纯粹的理论认识是

不够的，而是为此首先需要通过社会的行动彻底变革作为基础
的现实状况。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批判的这个最初的哲学阶段称之为人的自我异化的东西，他后来在《资本论》和在他唯物主义科学时期的其他文章里从社会学上把它表述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马克思指出过，虽然不（如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然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旦劳动产品不是直接地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作为“商品”出卖被制造出来，那末商品便普遍具有一种奇异的特性。这种奇异的特性既不是产生于商品的质料，也不是产生于它们特殊的有用性，也还不是产生于耗费在每个商品中劳动的特殊质。只要劳动产品具有某种社会的使用价值，从而耗费在其中的劳动一般说来就成为社会的有用劳动，那末这就唯独依决于制造每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的量。在其中表明两码事：一方面事实上在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表面上互不依赖的、在不同场所耗费于制造不同商品的劳动，尽管它们相互间存有质的差别然而事后在现成商品的交换中被强制性地等同看待，并且被当作仅仅在数量上不同的、通过它们的相加而产生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额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劳动事实上的社会性质在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中，并不是伊始直接地表现为明显的和合理的形式。它只是事后间接地在难以捉摸的和不合情理的形态中实现。

附 录VI

原稿和一份复印稿。

原稿和复印稿都被以速记式手迹作了加工整理。

原稿带有一个为保尔·帕尔托写作的速记式说明：“第一

个短小的、关于某些思想的笔记对于整个这一节来说是不充分的〔一个句子无法辨认〕。——〔1935〕，12月15日（参见1935年12月16—17日柯尔施致帕尔托的信）。

按原稿加工过的文字刊印，明显的笔误被改正，拼字的特点保留下来。

第十一节 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意识形态

对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批判中的经济学概念的探讨，包含着对于理解关于意识的唯物主义理论的钥匙，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学说，或者像同一领域新近还被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模仿者称为“知识的社会学”（曼罕）来说的钥匙。

从“健全人的理智”和哲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如下做法显得是前后不一致的或者甚至是矛盾：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方面揭露经济学概念是“拜物教的”观念，通过这种观念人们的社会关系以一种物的关系的“颠倒”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仍然容许这种观念的存在并甚至明确地称之为“有效的、客观的思想形式”。从而便产生了对于形而上学者来说不可容忍的状况：在同一种理论中两组彼此排斥的概念与原理对立存在着；这完全像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具有对立的、相互矛盾与排斥的利益的不同社会阶级对立存在着一样。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下述做法并不是解决办法：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概念解释为社会的和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对于这种历史特定的、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来说，是社会有效的、也就是客观的思想形式”），并且提到资产阶级意识的局限性在于：对于它来说“在这种形式的额头上写着，它们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即在其中生产过程支配着人们，而不

是人们支配着生产过程，这就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是无需赘言的自然的必然性。”

马克思说明，在这些经济学概念中对于生产者来说(并且同样对于只是把生产者的前科学观念改编为科学形式的科学来说)，他们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它们现存的东西”(“这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自身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相反地表现为个人的物的关系和物的社会关系)”。然而对于形而上学者来说这样的观念是不可实现的，即随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他们准备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特殊的社会形式，虽然他们在此过程中无意识地恰恰从最一般的形式的规定性中排除了暂时性)，那些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曾经是正确的原理本身，可能变成不正确的(或者说毫无意义的)。把暂时的事物称作是“现存的东西”这一原理，在他们看来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有效真理并始终是真实的，即使对象正在衰落。

与此相反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谈论有关社会的以及从而有关历史的事物的见解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有效性，这是充满矛盾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把这种见解本身阐释为社会的(并从而也是历史变化的)事物。“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基本原理在马克思那里(这时他早已把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和一切其他哲学问题置之不顾)，并不是指形而上学论者对它所理解的东西。

它不是对形而上学地探讨在意识本身同与之相对立的、被它认作对象的存在本身之间关系问题的回答。这无宁说预先就已明了：被意识的存在(das Bewußtsein—Sein)只不过是那部分未被意识的、部分已被意识的社会的(并从而也是历史的)存在领域中的部分领域。问题仅仅在于：在存在的不同形式(法

律与经济、国家形式与经济)之间，以及同样在被意识的存在同未被意识的存在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决定的或者被决定的关系。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在那种“社会存在的”狭窄的范围里(按此而言总是“社会的”意识作为特别的组成部分也从属于这一范围)，存在着意识对存在的另一种类型的依赖性。它完全不同于在被思考的对象与对象的思考之间存在的依赖性；由于这种依赖性思想作为现实的一种形式所谓客观地同作为现实的另一种形式的被思考物区别开来(更确切地说就像法律关系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类型同一的依赖性)：结构的关系，发展的关系；在“单方面的”关系中，一个领域里的变化引起在另一领域在数量与质量上显著的变化，但并非反过来也是如此；或者在一个领域里的变化在另一领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反过来仅仅导致一次性的、短暂的、暂时的作用，等等；

在不同领域里的变化对于整体状况的相对的重要性，即更精确地说，在一个领域里的变化转移到相当多的和各种各样的其他领域产生作用，同时反过来这些其他领域之一中出现的变化仅仅对相对少的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没有在一个其他领域中(先前的或同时的或者很快随后相继的“相应的”)变化(或者相类似地说，企图不顾其他领域的变化，无改变地保持一个领域)，那末在一个领域里作某些改变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改变之前，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发生变化。可见并不像形而上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由于经济学概念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作为对象，而是由于它们本身作为实际的对象属于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正如现实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在它们的结构上由那个世界现实的决定、影响、保持和巩固一样，因而经济学概念不

可能通过纯粹理论的批判而被破除和获得重大的改变。形而上学论者的误解除了别的还表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可以设想在其他时间(或者说原始时期)先行存在的或者在空间上毫无关联地在遥远的世界地区存在的或想象未来的、不过是资产阶级形式的非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鲁宾逊，李嘉图的原始猎人和原始渔人)；并且甚至在倾向上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家在此过程中都没有超出模糊的与抽象的观念。

[速记式的补充：]此外还表现在：对生产关系同样的依赖性，甚至在强大的程度上还在[资产阶级?]观念中再度发现，这些观念不涉及作为它们的“对象”的“经济”关系，而是涉及法律、政治和“更高级的”，即与它们物质的经济基础相距更远的意识形态。

附 录 VII

在遗物中只存在图书目录德文本的未完成的草案。这里刊印的关于作为论述基础的原始资料的一览表，基本上同在英文版第237页以下由柯尔施公开发表的一览表相一致。

它在必要的情况下由编辑者翻译成德文，并且同德文本有所变动的资料状况相适应。

图书目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截至1848年的文章和他们二人之间于1844年—1883年的全部书信，均按照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第一部分第一、二卷和第三部分第一至三卷由梁赞诺夫编辑，柏林1927年至1930年；第一部分第三至六卷和第三部分第四卷由V.阿多拉斯基编辑，柏林1931年至1932年。关于他们后来的文章提供最

全面与最可靠的情况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由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汇编，莫斯科1934年；对于恩格斯来说是古斯塔夫·迈耶尔《资料与论证》，《恩格斯传》第二修订版，海牙1934年，第一卷373页以下，第二卷533页以下。所有在《MEGA》中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都是按最初版本摘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生之年未出版的手稿和文献等等，则按照其最初发表的形式摘引。

马克思的文章^①

《MEGA》I—[1]：

1.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博士论文)，1841年。
2. 《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莱茵报》1842年，第221号的附页)。
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莱茵报》1842年，第298号附页—第307号附页)。
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手稿)。
5. 1843年的通信(《德法年鉴》1843年)。
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法年鉴》1844年)。

《MEGA》I—1, 2：

7. 《致父亲的信》1837年11月10日。
8. 《致卢格的信》1843年1月25日。
9. 《致卢格的信》1843年3月13日。

《MEGA》I, 3：

10.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前进报》，巴黎的德文杂志，第63—64号，1844年)。

^①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文章，则在题目前加*标明。

11. 摘自摘录笔记：关于斯密；关于穆勒(手稿，1844年)。
12. 关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带有结尾一章关于黑格尔哲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13.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法兰克福，1845年。
14. *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手稿，1845—46年)。
15.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手稿；恩格斯把它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的附录首次公开发表。)《MEGA》I, 6:
16.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巴黎—布鲁塞尔1847年。
17. 《工资》(手稿，1847年；后来作了加工整理和以别的标题公开发表)。
18. 《雇佣劳动和资本》(《新莱茵报》，1849年，第246期以下，4月5日—11日)。
19. 《摘自摘录笔记》：关于魁奈；关于布里索(手稿，1845—1846年)。
20. * 《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年。
21. 《1849年4月4日〈新莱茵报〉社论》(第18和21号由恩格斯于1891年加导言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书名重新发表)。
22.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1885年作为恩格斯出版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附录重新刊印)。

2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1850年3月。
24. *《第五、六期合刊，1850年11月。
（第23和24号文章由恩格斯于1895年以书名《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并加以导言重印发表）。
25. 《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革命》，不定期的刊物，纽约1852年；作为书于1869年在汉堡重新刊印）。
26.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带有导言和附录由恩格斯重新发表哥丁根—苏黎世1885年）。
27.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1857年；刊印：《新时代》XXI—I，1903；摘引作为1857年导言）。
28.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摘引作为：1859年序言）。
29.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柏林1859年。
30. 《资本论》第1版序言，1867年。
31. 《资本论》第2版跋，1872年（摘引作为73年跋）。
32. 《资本论》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1版1867年；第2版1872年；第3版由弗·恩格斯编辑出版，1883年（摘引按由弗·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4版，汉堡1890年，简称为《资本论》第1卷）。
33. 按1872年第2版全文由卡尔·柯尔施编辑并作序的版本，柏林1932年，摘引时简称为：《资本论》第1卷（柯尔施版）。
34. *《资本论》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汉堡1885年。摘引按第2版，汉堡1893年，简称为：《资本论》第二卷。
35. *《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汉堡1894年，摘引按第4版，1919年汉堡，

简称为《资本论》第3卷。

36. 政治经济学批判准备工作，第6—15册（手稿1861—63年，由卡尔·考茨基编辑出版，书名为《剩余价值理论》第1—3卷，斯图加特1905—10年）。
37.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伦敦1864年。
38.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1865年1月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1865年，第16—18号）。
39.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手稿，1875年刊印于《新时代》IX—1，1891）。
40. 对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发表在《祖国纪事》1877年第10期上的文章答复的草稿（手稿，1877年，首先以俄文发表于1886年《民意道报》第五期上；德文发表于1887年6月3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41. 经济学概论（手稿，1881—82年，作为《资本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1932年莫斯科版的附录刊印）。

恩格斯的文章

4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巴黎1844年（《MEGA》I, 2）
43.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报》第14号，1859年8月6日伦敦。
44. 《论权威》，《1874共和国年鉴》，写于1873年（德文发表《新时代》XXXI, 1. 页三七以下）。
45.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丁根—苏黎世1882年。
46.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莱比锡1878年（首先发表在《前进报》1877年1月到1878年7月）。
4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哥丁根—苏黎世1884

- | | |
|----------------|-------------|
| 70. 马克思致安年柯夫 | 1846年12月28日 |
| 71. 马克思致魏德迈 | 1852年3月5日 |
| 72. 马克思致库格迈 | 1868年7月11日 |
| 73. 马克思致库格迈 | 1870年6月27日 |
| 74. 马克思致比斯利 | 1871年6月12日 |
| 75. 恩格斯致弗·阿·朗格 | 1865年3月29日 |
| 76.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 1884年5月23日 |
| 77. 恩格斯致滕尼斯 | 1895年1月24日 |

在本书被摘引的作者著作

78.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柏林1922年。
79. 《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柏林1922年。
80.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1版莱比锡1923年，第2版莱比锡1930年。
81.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卡尔·考茨基的论争》，莱比锡1929年，摘引简称为：同考茨基的论争。
82. 《西班牙革命》，《新评论》，柏林1931年。
83. 《黑格尔和革命》，《反对者》1932年卷，第3册。
84. 《〈资本论〉(柯尔施版) 导言》
85. 《桑巴特的〈易于理解的国民经济学〉》，格林贝格文库，第15卷(1931年)。
86. 《为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现代月刊》，IX，2(1935年)。
87. 《列宁的哲学体系——对J·哈佩尔最近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批评的几点评论》《活的马克思主义》IV，5(1938年11月)。

异文参考资料

第一部分：资产阶级社会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

(1)P(巴黎稿本，下同)：……社会的 发展和 新的需要
……

(2)P：……而是从它当前的发展和向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更高形式的革命过渡的立场出发。

第二节 历史的论述

(1)A₁^c(美国稿本1^c)：〔速记体补充：〕这里指出1. 新的更可靠的重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原始草稿)1857—5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39年；2. 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在巴黎稿本的同出处第375页以下和在标明为“附录”的第2卷，莫斯科，1941年。

(2)P/A：……从整体来说是重要的……

(3)P：尽管具有这种重大的意义，然而这种较老的资本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只不过构成这个时代的基本形式的“派生形式”即补充形式；工业资本在生产的基本过程之前与之后在流通领域中——在货币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有时就采取这些补充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把它们当作这些形式来探讨。(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2篇第4章《资本论》第2卷，第1—4章)

历史的事实……

第三节 历史的论述(续)

(1) A₁^c〔速记体笔记：〕或“政治的运用”，论争的？

(2) P：在讨论历史的论述原则对于形成经济与社会研究的精确方法的理论意义之前，首先应当借助于一系列其他的、这次主要不是取自经济而是取自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事例，指明下述实际的意义，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科学的这种新的理论原则，对于在辩证的即维护现存制度的派别同社会批判的在倾向上是革命的派别之间进行的政治论争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我们为此利用这个回答，……

(3) A：……还有一种直接实际的……

(4) A：……这种论争的适用性……

(5) A₁^c〔速记体笔记〕与此相关的其他引文，魏特林等等。

(6) P〔在标题页上速记体的加工笔记：〕18—32也许使一切作其他安排，资产阶级的研究和马克思的研究对照，或者至少27—31作其他安排？

〔8-26〕符合本书正文的§§2-3，带有说明对P稿来说的异文；27—31在E稿（页45—47）变为P稿的§，这在A稿中则被删除；

暂且撇开一切实际的结果不说，马克思新的研究原则同资产阶级社会研究通常的思想方法纯粹在理论上的区别，奠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如下情况而变得困难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其包括几个世纪的发展中和在其当前传播的形式中尽管有某些连贯的共同性，然而从整体说来却不像马克思主义科学那样表现出如此统一的性质。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复杂情况：被马克思所批判的缺陷，即对社会现象不是按其各时期的历史特殊性作特殊的理解，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中。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开端赋有特征的是，无偏颇地概括资产阶级的原则。后来在19世纪“庸俗的经济

学家”那里，这种无偏颇的处事方法变成了或多或少自觉的倾向，即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同政治相对立，或者至少是把作为这种经济的基础的当前特别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同分配相区别地描述为一般的和不可改变的形式。最后，现代的、不再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而只是“纯粹的”和“理论的”经济学的创立者，以及“一般的”和“正式的”社会学的相应流派，把非特别地对待它们的对象甚至当作它们新的、所谓严格的“科学性”的独特准则。

另一种复杂性则产生于：我们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后来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中，一般说来无法确切地说明，它在何等程度上应理解为无产阶级攻击的反应。在这种最新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少可由它同马克思理论的直接论战确凿地表现出来。从德国最近两代的社会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中我们首先可提到特尼斯(Tönnies)和施塔姆勒(Stamm-ler)，麦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特勒尔奇(Treoltsch)，谢勒(Scheler)和曼罕(Mann heim)，在经济学家中虽然没有最卓越的人，但可提到这一整个派别的典型代表韦内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这位德国学者随着政治与社会的情势的变化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转变国家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内容广博的著作，以有文字依据地较之他表面的坦率信念，把在它们之中所包含的一切好的东西归功于马克思^①。他在1928年苏黎士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作为“个人的忏悔”表露了这样的事实：他于1894年曾是“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时在他的此种信念同

^① 参见桑巴特的主要经济著作《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第3卷导言，1927年，页XIX。

他的作为“皇家普鲁士大学教授”的尘世生活地位之间存在的矛盾，论证了整个的、号称由他首先提出的、社会学科学所谓的“价值自由”^①。

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占主导的倾向是无条件地承认和或多或少有意识地美化资产阶级制度；除此之外也偶而表现出批判的征兆。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当前发展的阶段上似有可能对自身及其对象历史地进行理解与批判。人们首先同样不应当把某个资产阶级文学家或哲学家任何偶而悲观主义地、或者嘲讽地或怀疑地对世界的否定，看作是资产阶级这种自我批判的表现。在这种把某些细小的“在（资产阶级）文明中的不舒适”，夸大为世界或“西方”的衰落中，表现出来的不是资产阶级严肃的自我批判，而无宁说是特别明

① 在德国学院式科学特别的生存条件下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采取了支离破碎的和扭曲的形式；桑巴特的发展特别清晰地表明了这种形式。关于他的发展我们注明如下：

1894/95/97：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讲演、杂志文章、书籍，其中有载于《社会立法文库》（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VII）的对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最初的科学评价。（《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n 19. Jahrhundert）一书的第1版，1897年。

1900年：《尽管如此！来自工会的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历史》（Dennoch！Aus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gewerkschaftlichen Arbeiterbewegung）一文的出版。同时公开出席了拥护德国政府的海军方案的工人集会，他和老的“讲坛社会主义者”瓦格纳（Wagner）、“社会和平”的预言家施莫勒（Schmoller）、由“冯·哈雷”重新命名为海外爱国者利维（Kolonialpatrioten Levy）、十字报教授文克斯特（Kreuzungsprofessor Wencksfern）肩并肩地在一起（参见《新时代》XVII，2，第778—779）。

1924年：《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10版、全新修订版，以改变了的书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版。

在希特勒上台后一本新书：《德国社会主义》和其他。

关于截至1900年桑巴特的情况参见罗莎·卢森堡的文章，《在工人背后的“德国科学”》（《新时代》XVII，2，740页以下）；截至1930年他的情况参见我的文章，它发表于格林贝格《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XV，436页以下。

显地表示资产阶级对历史地理解它自己社会的存在方式的无能。它们部分地产生于资产阶级一小部分的沮丧状况，部分地产生于在战后或在经济危机中较大部分资产阶级暂时的忧虑。随着繁荣与萧条的变换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周期性重复出现的对“危机”交替的否定和绝对化，既不包含历史的也不包含批判的见解。它充其量可以被看作工业周期当时实际经历阶段上的次要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迄至今日尚未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各时期总的经济状况变动的危机理论；这一事实不过是再次证实了资产阶级社会不能特别地理解它自身的衰落。这种衰落不是作为绝对的衰落，而是作为向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发展和过渡。这就需要精确地分析所有这些思潮，以便证实每个思潮中的那种特别形式，即以这种形式在那种对个别人来说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先验决定的、产生于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与阶级立场的前提下，既没有深入研究的方法与结论，也没有深入钻研由理论提出的概念与原理。

我们通过所有这些理论上的限制条件，试图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同马克思的社会研究之间的对立，就其与现今从事的历史论述的原则相关联而言，从其最一般的特征作出阐明。

第四节 发展的理论I：虚假的发展

(1) A—1^c：〔这一节二者择一的标题〕发展I：非批判的观点

(2) P/P^c：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比他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深入得多地涉及史前历史，他在旅行日记中还写下：

……

(3) A—1/2^c〔部分速记体的异文：〕

……取代“那存有各个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新的、不再有“对抗的”社会形态，从而这仅仅是继续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发展的“物质”条件已经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来〔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66—467页、489页、491页和在1959年《序言》中马克思阐述他的“一般结果”最后的文句〕。——异文，1947年柯尔施。

第五节 发展的理论Ⅱ：现实的变化

(1) A-1^c〔这一节二者择一的标题：〕发展Ⅱ：批判的观点

(2) P：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第一个重要进步在于……

(3) P：……他实际上通过颠倒方式扬弃了它们的形而上学的性质。

(4) A-1^c〔删去；速记体笔记；〕删去是1847年的异文〔原文如此〕？——柯尔施。

(5) P/P^c〔在这里紧接着被标明为页三一的正文并象A稿继续下去：〕马克思……

(6) A-1^c〔速记体校正：〕最高的

(7) A-1^c：它在新的、如在马克思的社会研究中出现的“合理的形态”上，情况则与之相反……

第六节 革命的批判

(1) P：〔这一节在那里与第9—11节相吻合〕

(2) P：人们可以与例如在“资产阶级观念学”的科术创始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里的赋有特征的表达方式相对比：在“古老的时期”（这就是说在截至现今的“法兰西时期”的以往时期）“社会的性质”对如下情况来说还不是充分完善的，即为了“使它的国家具有更高文明的状况和这种牢固的组织，而它们可确保民族的现实文明的存在”……

(3) P/P^c: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分裂为两个流派。主要为理论的派别(作为哲学、理论的国民经济学、法与国家学说;一般的社会学等等), 从事一般地剖析社会及其形式; 与此流派相对立的——起初要求独有的支配地位, 后来仅仅作为参与竞争的第二种形式——是主要为历史的派别。这个流派首先(作为历史学派)从事研究封建的中世纪社会, 后来越来越多地研究尽可能向后追溯远古的社会制度, 即所谓文化、艺术、经济等等的“开端”(正如马克思讥讽地说“它要求船夫不沿着河航行, 而沿着河的起源航行”)。这两个流派从自身出发远远超越于一切迄今的倾向, 发展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理论派内部, 一方面在从亚当·斯密至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的继续发展中, 另一方面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的发展中, 获得了它富有特征的表现。

A-1^c[部分速记体的改正:]

这种批判现今作为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大体展开了的形式由外部对资产阶级的观念提出来。但是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在较短期间, 它还是在资产阶级理论本身的内部出现。这种在资产阶级原则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原则结论的批判的完成形式,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和它的好学的门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两个最后的伟大体系中表现出来。——这是1947年的异文, 柯尔施。

(4) P: 与经济学领域里最后的古典的李嘉图体系的情况相类似, 它发展了它所有的批判要素并更加尖锐地强调, 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内在“矛盾”, 这种矛盾已经由孟德维尔、弗格森、亚当·斯密、康德等人阐明, 但是在他们那里它们总是在一种“更高级的”或“更深刻的”统一中重新被消除。

(5) P/P^c: 正如对待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的第一种形式

一样，马克思对其第二种形式采取了同样无偏颇的态度；这种批判在此期间同古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相对立获得了发展。马克思把实际的性质……

(6) P/P^c〔这里立即转入标明为41—43页的正文；〕但是他还承认由这一历史学派为了继续发展社会的研究在纯理论方面所赢得的进步。它首先揭示了批判的和指明未来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逆转之中……

P；〔然后更简短地结束了这一节；〕然而，因此可预见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与那种原始社会制度不具有最起码的类似性。完全同样，正如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今所谓“自然民族”(Naturvölker)的“原始”制度，或者由弗洛伊德揭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人们心理结构的当前“未被意识”部分，同对他们来说形式上在一定意义上“相适应”的原始社会制度，以及同未来的、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都不需要彼此相一致。

P^c〔结尾同A稿本完全一致〕

(7) P；……同整体有某些矛盾……

第七节 革命的理论

(1) P；〔这一节与那里的第七—八节相吻合〕

(2) P；马克思社会科学的第二个巨大进步在于：制定了社会科学的概念构成的新类型。

P^c〔在标题页上速记体的加工笔记；〕I—44参见英文本

〔英文本73页写道：在论及马克思有关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考察的实际含义之前，我们还应探讨前几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主要方法论原则所引起的一个纯理论问题。我们业已证明“历史的论述”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批判和研究的根本基础，而强调这种“历史的论述”是同从根本上需要一定程度的综合相

一致的，因为综合必然同每一旨在进行真正的科学论述的努力是密切相关联的，而且无疑是马克思所承认的。

新的文稿大致是：

严格地贯彻历史论述的原则，就要求制定社会概念构成的新类型。马克思本人没有明确执行他的这一部分任务。他满足于反复不断地批判地指明旧类型所固有的缺陷，此外他则仰赖在这个方面由黑格尔所从事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的基本成果在他（和对恩格斯以及后来对列宁）看来，通过在黑格尔论述中所经历的“思想神秘化”而遭受歪曲和非正常化，但是却在实质上已包含了正确的解决办法。

A：〔在A-1和A-2中附上，在A-3中缺少〕

对I-47的1947年异文

第七节 革命的理论

在我们转到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批判；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内容上最重要的问题之前，在我们论述的这一部分还需要解决两个较普遍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把上面彼此分开探讨的、马克思社会研究的原则（历史论述的原则、现实的社会变化的原则、革命批判的原则），概括为理论的统一体。然后我们还必须较前面的论述更完整地阐明这种有意识的联系，即通过这种联系在新的马克思科学中一切理论上的论断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倾向，结合为一个革命的统一体。

A-1^c〔速记体补充：〕

对S、I40（较早的编号）的1949年注释。

问题在于，把马克思的历史的相对化搬用于现代科学的相

对化。在其中后者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视了即使外表上最任意的新的总额、定义、处事方法的历史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派生体系的历史性。而马克思却认定在历史的存在与生成同概念的存在与生成之间存有简单的同一性，这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虽然二者在原则上还把这种关系解释为历史的）。

(3) P: ……对于革命的科学来说它构成了可供利用的批判原则。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固定不变的、已成为科学认识的桎梏的抽象，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去进行批判，即把在其中现今所包“具体东西”与之相对立。这样人们就可以消除对当前资产阶级错误的（观念）美化，并且把它的客观的现实同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新的无产阶级存在的内容对立起来。在这种“具体的”，这就是说现实的、社会的、经济的、阶段的现存社会关系的内容，同它们的抽象形式的对立中，和在极大部分未形成的、无产阶级生成中的内容同资产阶级存在已完全形成的内容的对立之中，已存在着一种新的、革命的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倾向。

(4) A—1^c〔部分速记体的改正：〕

（这样做将是不切实际的：把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看作是可以随意不按唯心主义而按唯物主义“运用”的方法；然而毫无疑问（撇开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一切其他唯物主义要素不谈）、在这种“具体的”，这就是说现实的、社会的、经济的、阶级的现存社会关系的内容，同它们的抽象形式之间“辩证的”对立之中，在无产阶级生成的、极大部分未形成的内容，同资产阶级存在已完全形成的内容之间的对立中，包含着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批判的唯物主义倾向）

〔速记体笔记：〕1947年的修改可能要重新删去。卡尔·柯尔施1948年。

(5) A—1〔部分速记体的1947年的补充，较后的笔记：〕可能是1847年(原文如此—译者注)出色的修改〔原文如此；改变的文字是：〕

在其中社会劳动过程的这种专制组织以其现存的形式，实际上从来不能实现积极的目的，即对生产实施普遍的社会调节。

最高指挥权的统一调节在具体的现实中仅仅对于个别企业和社会生产中个别工业局部的联合才存在；社会生产在整体上是无调节的，通过许多孤立的商品生产者的竞争才在事后实现必要的平衡。

(6) P：人们甚至能够制订共同的准则，……

(7) P：为了积极的应用，马克思以论述的合理原则取代了黑格尔夸大的假设：真理必然是具体的。马克思在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中，把这个社会的一切关系和它发展的一切阶段阐述为历史特殊的。他使自己首先限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扩展为对历史发展一般的唯物主义的见解(参见本著作第三部分)；并且在其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特定的历史形式，进展到更一般地确定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时代”的系列。即便在这里特别的观点始终保持着。被真正关注的不在于“社会经济形态”这个一般概念本身，而在于通过它们把每个历史特定的社会同一切社会的共同特征从总的方面区分开来的典型特征，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表现何在。此外这个历史地概括的社会概念从另一方面来看总是特别确定的。在适当地扩展首先从资产阶级社会中揭示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的意义的情况下，它实际上被表述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唯物主义社会研究者的志趣在于，通过经济基础特别地确定每个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从它

方面来说不被视为“经济”一般，而被看作物质生产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8) A—1°〔部分速记体的改正：〕

对于积极的运用来说黑格尔的假说，即真理必然是具体的，在实际上是不可实现的，而在理论上则是夸大的。因而它被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为从理论上论述历史—社会实况的新方法；在其中一切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同样在对它们从概念上作概括时），不仅在哲学上，而且还以合理的科学形式保留下来。

〔此外一部分修改重新抹掉和带着？所作的笔记：〕

尽管有这种对特别的历史性质的保留，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论述是真正一般的论述，并且由它们所构成的概念与规律

……

〔最后是比较晚的加工笔记：〕

1847年〔原文如此〕的这种修改几乎没有改变。柯尔施。

第八节 革命的实践

(1) 经验的科学

(2) P：理论上批判的

第二部分：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1) P：当马克思从他一般的革命立场过渡到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时，他伊始就赋予政治经济学以……

(2) P：……这位由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研究者，直截了当地过渡到由经济科学迄今发展所流传下来的成果。

(3) A—1°：……利用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撰写的部分草

稿，去继续出版当时计划的、后来由《资本论》所替代的他1859年出版的著作……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1) P: 从实际上来看经济学始终是论述全部……

(2) P: 蜕变; P^c/A : 贫乏化

(3) P: 继续发展 P^c/A ; 继续退化

(4) P: 通过流血的失败、严酷的镇压、有效地破坏一切现存的工人组织而必不可免地导致无产阶级运动暂时的挫折应适于……然后由它最初强有力的开端发展为规模越来越大的、卓有成效的、明显的和有威胁的形式，发展为在许多战线上同时开展的、有时在公开暴动中爆发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持续的战争。

(5) P^c [边注:]原子核力量，原子弹! 卡·柯

(6) P/A : 作为劳动

(7) P: 独特的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

(1) P: 政治的

(2) P: 进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3) P[这句话缺少]

第四节 哲学的和科学的批判

(1) P: ……哲学论争的形式

(2) $A-1/2^c$: 它还表现为旧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为了“扬弃人的自我异化”的斗争(转自唯物主义的)继续。他谈到蒲鲁东时说，“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他把经济学的概念同黑格尔哲学的概念相对比；他说，“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

(3) P/P^c〔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的第五节〕

第五节 马克思经济学的两个阶段(原文如此,与目录略有区别——译者注)

(1) P/A, 不同的阶段

(2) P, 当时许多革命的推动力在其实际作用上遭到暴力的压制;这些推动力在革命的理论阐述中获得了具体的反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论述……

(3) P, 但是这确实涉及革命行动的一定改变;这种行动是由唯物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这一发展阶段预先指明的

(4) P/A, ……狂热的、空想的、唯意志论的、积极的……

(5) P, 这种“唯物主义的”醒悟构成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后来的历史作用的重要因素(“被打败的军队易于汲取教益”);这种醒悟除了具有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于50年代一切革命运动完全停顿所引起的特殊原因,还具有更为一般的历史原因。“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同“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主义的与英雄的第一阶段相比,是作为现代总的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正如马克思多次对它的特性所作的描述那样,它表现为不再是令人沉迷的、幻想的、而是清醒的与唯物主义的、达到了它自身内容的运动。因而在现代工人运动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一部分那种更为一般的清醒认识,即这种醒悟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首先由第一批法国反革命的理论家,然后由德国的浪漫派所宣告的;它特别是通过黑格尔给马克思以强烈的影响。正如我们将在讨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学说时看到,人们可能还远远后退到一个阶段,并且已在(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始终称颂为最高的政治智慧与能量的典范

的)革命的国民公会的政体中,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与1789年热情奔放的第一阶段相对立的、“冷静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

(6)P: 世界历史性的胜利

第七节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1) P/A: ……阐明为物质生产特别的历史发展阶段;它的赋有特征社会形式,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从而对于资产阶级意识的科学形式——政治经济学来说,在表面的商品价值关系中……

第八节 价值规律

(1) A: 法西斯主义的

(2) P: ……和发展

(3) P: ……预防危机的手段……

第九节 价值和剩余价值

(1) P/A: 从这里还产生了……

(2) P: 它充其量表现在商品价格的一般发展中, ……

A: 价值规律也不是间接地,像某些拘守于商品世界拜物教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表现在商品价格的一般发展之中……

(3) P/P^c: 但是归根结底,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意义总的说来并不表现在:为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里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人的实际盘算,或者为一般地操持繁荣资本主义理财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的经济政治措施,创造某种理论的基础。按照马

克思的看法，他理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现代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这就是同时揭示它历史发展的规律”。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更加清晰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揭示在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对抗与剥削的一切形式，以便有助于无产阶级去铲除它们”。

(4) A：在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中……

第十节 “社会契约论”

(1) P/P^c ：正是从这个物质的方面来看，只要由于经济学概念的拜物教性质而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即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本身不能获得承认，那末资产阶级的理论就不能获得首尾一贯的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论中伊始就存在着关于新构成的概念界限的重大的不明确性。如果说理论家们已充分明确地把他们的“市民社会”同旧的封建的国家制度区分开来，那末他们为此就更无所顾忌地把它同新旧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他们把市民社会或者国家想象为社会关系的整体，通过这种关系的形式达到理性的人类个体或者是和谐地以充分的自由（正如社会契约论的肤浅代表所阐述的那样），或者在以往的生死斗争之后（正如这种自然权利理论的较深刻的代表霍布斯、卢梭、黑格尔所阐明的那样）按照强者的法律“缔结契约”。

(2) A：……拜物教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还没有被克服。社会的观察方法只有通过使它在社会本身的经济基础上加以运用，才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同样……

第十一节 结论、修正、展望

(1) P/A ：……即使以不充分的形式

(2) P: 这甚至适用于那种将当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历史上其他过去的、想象中未来的社会生产形式作历史的对比; 马克思为了更广泛地阐明他的理论立场在论述的过程中有时也采用了这种对比。

(3) P: ……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运用特定的范畴以一种在当时充分的方式, 科学地阐明了正在产生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 排除了为新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 [资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历史与社会的局限性] 最终还表现在: 以这种经济学形式根本不再可能以深有意义的方法提出, 更谈不上解决一定的经济学边缘—最后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 通过一定的批判修正, 在有限的领域和较短时间范围内为科学地剖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一定部分, 提供有充分价值的手段, ……

第三部分 历史

第一节 自然界和社会

(1) P: ……因而也是对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补助金的失业者来说恢复了的、原始人群“正常的”饥饿时期……

P^c/A : ……因而也是对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部分人民来说恢复了的、原始人群“正常的”饥饿时期……

(2) P: ……自然的、在较长时间范围里不依赖于人类行动而自行完成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客观发展, 对于这种体系来说虽然构成理所当然的科学前提, 但是它并不构成这个体系的出发点。这一事实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像“自然形成”这样的、马克思社会研究的边缘概念中表现出来。这个由马克思经常使用的词语开始具有否定的意义。它表述了这样的社会状况、条件……

(3) P: ……社会的形式是历史地产生, 因而在当前和未来是历史地改变的, 并通过人们的行动而彻底变革……

(4) A-1^c; [对脚注部分地速记体补充:]另一方面按照上面摘引的马克思的说明(《资本论》第1卷,第46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自然形成的”、不是自觉造成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在遥远的未来也是存在的。

新的物质存在条件是长期发展史的自然形成的产物。

自然产生具有所谓的阶段。一些自然产生的东西被“文明”所消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3页以下),但是一切自发产生的东西只有通过完全发展的共产主义才能消除(同上书,第77、79页)。然而这种完全的“消除”或者“克服”一切自发性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马克思以一种令人回想到费希特的唯心主义方式把有意识创造的发展形式同自然形成的形式相对比,称之为较高的发展形式;而法国反对革命的分子和德国的浪漫派相反地在其中看到的是对神圣形式的亵渎。参见在马克思那里的摘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0页)菲埃魏(Fiévée)等人的观点。在法国革命中由自觉的“意志”弥补了时间。

(5) P: 调节的形式……

(6) P: ……未改变的社会之前的事实和……

(7) P: ……原则上不是先验的,对于一切……

(8) P: ……在理论上可能被承认纯粹自然产生的、也就是社会的并从而也是社会变化的形式,并且然后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被改变和彻底变革……

P^c/A: ……在理论上可能被承认纯粹“自然产生的”、也就是历史的并从而历史地改变的形式,并且因而在实际上被改变和最后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得到完全彻底的变革……

(9) P/P^c[在此之后是经再三加工的、在A稿中最后删去的一段。我们刊印的P稿文本,恰如柯尔施在第二个编辑笔记中

所宣布的、这一段第二部分的新文稿]

P^c[编辑笔记:]暂时删去和在带有■14的新的页上继续，在加入被修改过的4页以后又出现了■14的编号。

P: 这种严格历史与社会的、从而同时在理论上是批判的和在实践上是革命的、社会存在的一切所谓“自然条件”的观点，是马克思在他最初的、主要还是哲学的著作中以一般形式宣告的，在他的较后时期他作为经济的社会研究家将它到处运用并使之获得彻底贯彻；对于这类观点来说，在《资本论》中对“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论述提供印象最为深刻的例子。在这里马克思首先也是“完全撇开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它们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把这种生产过程的自然要素，同时当作现今生产时代那种社会制度的特定方面；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是作为自己的劳动力的出卖者而出现的”。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实现的同一过程，首先就其两种表现形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被表述为“劳动过程”，然后被表述为“价值形成过程”（商品生产）和“资本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生产——最后概括为“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①从这些方面的每一方面产生了完全确定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过程的实际社会性质的新要素；这个过程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对立面即庸俗的社会主义者，片面地一会儿表述为使用物品的生产，一会儿相反地仅仅表述为价值的生产或者简单的谋取利润。但是只有当人们把这一过程看作“在这样的社会里，即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5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和我出版的《资本论》的导言，柏林1932年，第14—15页。

实际的生产物品作为资本和实际的生产者作为商品劳动力进入由资本家支配的生产过程，借助于有用物品的生产而生产价值，借助于价值的生产而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能从它充分的历史与社会的规定性上对这一过程加以把握与批判，并使之易于遭到实际的彻底变革行动的攻击。

P^c[编辑笔记:]从这里起由Ⅱ11—13页的附件来替补，这些附件就其作为笔录来说最好删去。照此看来，新的一节是从Ⅱ14页开始——柯尔施。

P: 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科学按其整个范围来看是历史与社会的科学。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科学也完全融合于这个整体之中。由经济学所探究的事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并不像自然界、技术和人的躯体存在首先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另一方面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等)，只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从同时涉及它们的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作唯物主义研究的特别观点看来，才构成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对象。更确切地说，经济的关系就像政治与法学以及全部所谓“精神科学”，按其整个内容来看是社会的关系。它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关系，甚至是当前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从资产阶级经济学“拜物教”观点来看，“经济的东西”是同“社会的东西”相分离的，科学只是在事后通过如下方式把“相分离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即它(在由“纯粹的”经济学过渡到应用于社会的经济学时)把社会的东西看作是由经济的东西决定的；而依据马克思批判的观点，经济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是直接地结合在一起。从物质生产中直接产生的“经济—社会的”关系，同“政治的”和从这个词的广义上包括所谓的“精神的”关系在内其他的“社会的”关系相对立，恰恰构成“社会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社会这一概念在现今文明的(即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的所有语言中,在谈论“社会的问题”、谈论“社会政策”或“社会运动”时都得到应用。只是借助于人为的努力才使得现代“社会学”做到了,使由它在广义上确定的“社会”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不幸的结合。“社会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于这个社会的所有阶级来说,由于现代工人阶级的登台到处成为热门的问题。它们作为这种热门问题一方面是社会调节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民主制国家里“社会改良”的提倡者要克服阶级斗争,或者像在现今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中要彻底消除阶级斗争;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在那些地方所谓的克服与消除阶级斗争,本身就表现为阶级斗争。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阶级之间的争论,从而同时无产阶级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理论论战,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坚决进行。只要回顾一下当前时代革命意识的历史发展(和对在马克思革命的社会理论形成中这种一般的历史发展作简要复述),那末我们就可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如若我们向前看,那末相反地反对宗教的斗争,则是间接地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同样,对资产阶级法和国家的批判还没有抓住“真正切合实际的世俗问题”。这一点只有通过批判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它的敌人以其一切行动和全部幻想实际地站立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找到它的敌人才能做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抓住了资产阶级社会、它的法与国家、它的艺术、哲学和宗教实际的根本。一切社会的批判在全部批判的这种最彻底的批判中、获得了它们物

^①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质的基础。

[在这里以最后加工形式复述的东西不属于手稿]

从页Ⅱ，11中间至Ⅱ，13新的文稿：

由这个事例特别清晰地表明，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社会的体系里，^①像自然界和技术以及人的躯体与所谓的精神的存在这些表面上以经济、历史与社会作为前提的事实，是怎样被包括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研究之中并使之服从于它的特别观点。这种具体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处于双重的对立：一方面与那种完全空洞的抽象相对立，即迄至最近时期某些“经济哲学家”和“精神科学家”，采用这种抽象把经济关系表述为纯粹精神的现象；另一方面与那种同样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幻想相对立，即老的（和一些较新的）经济学家借助于这种幻想，试图把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况归结为外部自然原因的直接影响。这样，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就不存在直接的“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在《资本论》的有关章节里^②，马克思并不满足于批判从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③在这个地方他尚未进展到指明那种较多的更加积极的作用，即按照他的看法由剥削的形式转变为不再是“对抗的”形式的“剩余劳动”，在社会经济形态某个时代所发挥的作用，直到它最终在完全发展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真正的自由王国”）里作为这种剩余劳动本身便完全停止。^④相反地，他通过极其精辟地阐明对于“剩余价值”来说“自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8—5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3页。

^③ 对此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927页。

然限制”的意义，充实了对下述补充规定性的更具体的研究，即那种首先撇开从“简单的劳动过程”的角度所确定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作出的规定性。

此后人们才谈得上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但这仅仅是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的。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上解脱出来并转嫁给别人^①。第二点，对于剩余价值的量来说自然限制的意义同样是否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它对剩余劳动便产生影响，“但仅仅作为自然界限，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但是由于所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②。对于历史的考察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例如在一切迄今所研讨的情况下，在这里也是这样，自然的限制成为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③。

正如马克思在同一场合的一些脚注里所作的与其说阐述不如说是提示的那样，这些论据也适用于迄今由某些社会学的和政治的著作家们所主张的、所谓“国家的自然基础”。国家的政治表现就象剩余价值的经济表现一样，完全不是产生于不变化的天然条件；前者在实际上甚至仅仅是由后者派生的表现形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9—560页。

② 出处同上，第561—562页。

③ 出处同上，第562页。在这里这虽然首先仅意味着通过消除自然的界限而扩大了资本对劳动者剥削的可能性。然而后来（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马克思加以补充：由于与此相联的“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表现于此。

式^①。完全象有用于人们的需要和通过人们的劳动而制造出来的物品，并不天然就是“商品”，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商品，例如金与银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货币；同样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并不是由于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只是通过一定历史的和历史地变化的条件的强制才得以存在。革命的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同所谓的“自然主义的”国家理论和从相反的观点出发坚持这种理论的现代强权政治家的虚假唯物主义，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P；……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2—4)P；历史观

第三节 特殊的运用

(1)P；……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物的“统治”，而是反过来通过人身的统治与奴役关系（它表现为生产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掩盖着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物的“统治”。

(2)P；历史观

(3)P；……在真正的原始社会里……

(4)P；最一般的

(5)P/A；科学的

^① 在马克思那里二者的发展完全是平行的。对于国家的压迫者职能的完全形成来说，随着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在封建时期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便消退了。正如赋予摆脱了它的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剩余劳动”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样赋予摆脱了它的资本主义阶级性质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它在充分发展了共产主义社会里完全“消亡”之前，以更为积极的职能。对此可暂且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以下。

第四节 哲学的唯物主义

(1)P: ……对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经验科学的和批判的意义〔的歪曲与肤浅化〕, 不过是达到在今天或者正是在今天重新视为必要的观念的一步, ……

(2)P: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最重要的进步, 后来被这样的“正统”马克思解释者误解了, 即他们把一切修正主义的企图……

(3)P/A: ……体现在马克思的社会研究中的那种唯物主义科学最高发展的形式, ……

(4)P: 以几乎是荒诞不经的形式表现出马克思正统派的这种历史命运: 在他们防卫修正主义的进攻时最终在一切主要点上站到了敌对者的立场, ……

(5)P: 当他们在自己的科学著作里不再研究哲学问题时, 他们就无情地反对任何非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无论它们以何种伪装出现)。

(6)P^c: [对脚注的补充;]

现今在美国同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其他变种最接近的哲学家、自然与社会研究家, 其中有约翰·杜威和由他传播的学派, 以其对“自然主义”一词的偏爱标明了他们的立场。

(7)P: 今天

(8)P: ……喜爱。

(9)P/P^c[这一节的结尾十分不同;]

因而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 当“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 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 以某种形式在复活”时,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充分的历史权利, 同样后来列宁在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唯心主义哲学各个流派当时充分表演的蒙昧主义倾向, 重新强调唯物主义科学、马克思主义同一般的、

从而在确定意义上的哲学世界观的联系。

由此看来，如果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属于唯物主义最坚定的派别，可以合情合理地看作是毫无争议的，那末如下论断则可说是另一码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哲学唯物主义的某种形式，例如从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或者从左派黑格尔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宗教批判中直接产生的，并且把它们作为它的前提而依赖于它们。

Pc：当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甚至在德国，以某种形式在复活着”时，这种马克思主义反对哲学唯心主义一切公开与隐蔽形式的斗争，获得了新的意义。在这种特殊的时代情势下较之在理论上倒退到早先曾超越的哲学观点的情况，下述作法就更有根据的了：在这时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具有完全科学与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顾了他哲学唯物主义青年时代的、早已成为过去的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面对着在此期间新出现的、唯心主义哲学各个流派的蒙昧主义倾向，重新强调了唯物主义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同一般的、从而在确定意义上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本来的联系。并且还在更高程度上存在着这种由时代条件所决定的、对于下述激烈的哲学斗争来说的政治动因，即后来的一个历史时期由列宁领导进行的、反对所谓“经验批判主义”和其他模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斗争；这些斗争这次不仅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而且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引起了令人惊异的强烈反响。

由此看来，如果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属于唯物主义最坚定的派别，可以合情合理地看作是毫无争议的，那末如下论断则可说是另一码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哲学唯物主义的某种形式，例如从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或者从左派黑

格尔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宗教批判中直接产生的，并且把它们作为它的前提而依赖于它们。

(10) A; ……，在那个时期在由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范围内出现的问题。在这里不是讨论当时由列宁反对“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所采用的论据，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和适时性的地方，或者历史的问题……

第六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I： 社会的领域

(1) P; ……和在它们再次通过逻辑学的重叠中……

(2) A-1^o: 马克思从别的前提出发，早在他对法和国家进行唯物主义的批判之前，就已对资产阶级意识的宗教、艺术、哲学的这些形式进行了无情批判。他通过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这些“较高级的”观念的彻底批判，而对现存的世界秩序进行了攻击，在此过程中他首先从哲学上批判了宗教，然后从政治上批判了宗教和哲学。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他现时在他批判原则的进一步发展中在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法和国家的现实基础；这时他使那些“较高级的”意识形态溯源于同样的现实基础，而他在此之前却使这些意识形态溯源于法律与政治。

第七节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II： 社会的发展

(1) P; ……，它把物质生产力同首先与其相适应、然后相矛盾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称作是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推动力，……

(2) A-1^o: ……他的同时代人……

第八节 物质的生产力I: 概念

(1) P: ……希图把阶级对立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矛盾暂时的、局限于一定历史时代的表现形式；这种辩证矛盾是作为基础的、极其一般的或者根本不受时间限制而普遍存在的。

(2) P: ……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不过是看作技术的成果及其社会运用之间的区别。

(3) P: ……不可克服的……

(4) [在这个地方采用了P稿的行文，对它没有作任何修改；A稿的原文是——也许是由于抄写的错误；]

……这种旨在维持……的无声的权力……

第九节 物质的生产力I:

进步的规律

(1) A-1/2^c[部分速记体的改正；]

如果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资本积累不断地和间断地提高的经济必然性，在这个时代的意识中表现为进步的狂热，那末随着资产阶级这种进步思想的前提的消失便会在理论上遭受破灭。越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家积累的资本与财富的数额增多，而停止成为资本积累倾向的纯粹体现，那就越加……

——也许原有的行文更好？——柯尔施1949年

(2) P/A: 解放了的

(3) P: [这一节的结尾]

第十节 社会的生产关系

(1) P + A: ……这种生产的非决定性、静止性和不变性……

P^c: ……整个说来物质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种表面的非决定性、静止性和不变性……

第十一节 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两个阶段

(1) P [相关的第十二节有极大的差异，因而我们在此把它全文刊出：]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联合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的现实人们，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的真正实际行动；而这种真正实际行动带有各种各样的成功希望和危险。出自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句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决不像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从较早的马克思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实际的唯物主义立场，过渡到宿命论的革命观，即把革命当作纯粹经济的、由参加的主体受强制地按照客观规律实现的发展。马克思对于陷入反动与懊丧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使他能够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彻底变革实践的积极鼓吹者”变成“对现实历史发展的客观的科学考察者”；在此之前很久，他就讲明了唯物主义的认识：“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同样的思想以新的形式出现在较后的马克思著作之中。这种新的形式仅仅通过更为抽象的表达方式而同上述较早的论断区别开来。论述上的区别是根据在此期间出现的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从而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实际的继续发展来说变化了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采用尖锐的形式把他们用唯物主义分析客观经济形势得出的结论和由此产生的冷静观点，同一切对任意加速革命过程的主观与直觉的希望对立起来。这种尖锐的形式是与他们在此时期实际上对一切诸如此

类的意图所采取的态度确切相适应的。从强调革命阶级斗争的主观因素到强调客观的经济发展的明显转移，首次出现在这样的文献中，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秋公开确认了到处恢复的繁荣和由此决定的革命运动的暂时结束：“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他们这一次以这种对现实状况清醒的、唯物主义的论断，永远摒弃了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流亡分子的、“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有的幻想。他们从而同时在激烈的和只有通过整个组织的分裂和衰亡而结束的派别斗争中，实现了对于他们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更有决定意义的事，即同在1850年重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唯意志论的、积极的“行动派”相决裂。但是以这种新形式马克思实际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像在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较后的发展中事实上出现的那种情况，转变为信奉经济力量盲目起作用的机械论；从这种机械论出发旧的社会形态的衰亡和向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过渡，是没有人们的参与而自行发生的。相反地现今仍然存在着对工人阶级行动的实际关系。唯物主义理论的新形式是与阶级斗争的新形式相适应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作为联合在工会与政治组织中的工人阶级运动而继续发展；这种运动不再是直接地而只是在其最终结果上朝向社会革命。马克思的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句话，十分强调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而这些前提是不能通过纯粹良好的意愿、正确的理论或者有战斗力的革命家组织去替代的；在这种观点下他的那句话只是表现为走向行动的提示；在其中马克思

为以1850年为开端的、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新阶段，总结了1848年欧洲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客观教训。它是那种“一切革命的基本规律”的先声；按这种基本规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较后的历史时期以类似的策略态度，针对由战后最初几年直接的革命形势中产生的、在变化了客观境况中继续存在的、“左派”共产党人唯意志论的革命情绪，总结了20世纪三次俄国革命关于工人阶级严重的革命斗争必不可缺的客观前提的经验。在这种对工人阶级积极的先锋队进行告诫，防止保守地坚持由于客观状况而不再有根据的、直接革命的策略时，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未曾想到，要以纯粹宿命论的信念，即相信在适当的等待之后最终会无危险的和以绝对的必然性实现经济的发展过程，去替代工人阶级实际的革命行动。以其行动处于历史发展长河之中的并实际地决定这种发展的阶级必须通过事实证明：正如现存的关系成为了生产力的桎梏，在同样程度上在它外壳下新的生产力已近于成长；它使得有可能过渡到社会经济形态新的进步时代更高级的生产关系。

(2)A：……从物质生产力概念对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意义中还解决那种表面上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在这个理论中一个基本上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引导出来的过程，同时作为……

(3)A：他表明了注重点从直接的革命行动到基于客观经济发展的并仅仅间接地针对革命目标的工人阶级运动形式的实际转移，然而这种变化完全奠立在客观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如下看法是十分荒谬的：按照某些马克思解释者的心理学式的方法，在其中觉察到某种在此期间成熟为“纯粹的”科学客观性的思想家同其以前的、唯意志论的倾向全面的决裂。

(4)A：……独立的客观的……

(5)A：……不再作为同以前唯意志论的态度的决裂，而

是……

第十二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I：经济主义

(1) P/P^c[这一节和下一节构成第十三节]

(2) P：……在激烈的派别斗争中，这一斗争是以这些派别形式上被开除和整个组织事实上的解体而告结束。

P^c/A：在它们同马克思主义派别及其部分由完全不同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倾向支配的同盟者之间所进行激烈的派别斗争，当时以形式上开除这些派别和整个组织事实上的解体而告结束。

A—1^c[速记体的补充：]这一点还要提到，也许是在一个脚注里——卡·柯尔施1949年

(3) P：……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于1936年在西班牙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次大规模武装起义。

(4) P：与之相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现今即在第二国际时期政治斗争及其后果议会主义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和中心的意义；在这种运动的内部经济革命的倾向只起着次要的作用。现在，“经济主义的”倾向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运动中这样的派别来代表；这个流派从原则上反对一切在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超出纯粹工资斗争的工人运动形式，即使它们的出现在那里是服务于最有限的资产阶级目标，例如在德国是作为废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法的斗争、作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李卜克内西式的斗争等等，或者在法国是作为所谓的“革命的德雷福斯式”的斗争；这是由于在斗争中已运用了“革命的”斗争手段(总罢工、示威游行等等)。

(5) P：(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通过鲜明地强调革命的政治斗争，反对这种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即在世纪转折

之交在国际上作为“伯恩斯坦主义”、“修正主义”、“取消派”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派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P°〔修改没有完结：〕

这种改良主义的“经济主义”，在俄国于世纪转折之交国际上作为“伯恩斯坦主义”、“修正主义”、“取消派”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派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作为这种经济主义的对立倾向，由于其他的、当时尚未完全清楚认识的动因，出现了特别由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所维护的、对革命的政治斗争的尖锐强调。

(6) A：这一布尔什维克派在当时面临的1917年俄国革命中理当赢得它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并且在整个由此引起的迄至今日的苏维埃俄国的发展中，留下了它清晰的踪迹。

A-1°〔速记体的补充：〕或者：按照它的形象造成了苏维埃俄国迄至现今的整个结构和发展。

(7) P/A：……左翼激进的……

(8) P：正如这个简要的历史概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流派尽管它在理论上缩小了全面的唯物主义的、在社会生活的各条战线同时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思想，然而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总的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甚至被列宁这样伟大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地承认；他在自己反对改良主义派和中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歪曲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创造了这个独特的用语……

P°/A：正如这个简要的历史概述表明，革命的“经济主义的”流派尽管它在理论上缩小了全面的唯物主义的、在社会生活的各条战线同时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思想，然而在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中总的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甚至被列宁这样如此伟大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地承认；当他在反对

这种“激进左倾”派别的斗争中，同时通过这个独特的用语回顾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蜕变的更大危害性……

(9) P^c/A：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第十三节 基础的上层建筑Ⅱ：

所谓的相互作用

(1) P：对于恢复马克思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完全的理论与实际的意义来说，构成出发点的是下述见解：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的意义这一基本论断，对于它的有效性来说根本无须通过所谓“相互作用”加以补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其唯物主义的原则时不言而喻的是……

(2) P：……唯独被强调的作用……

(3) P〔缺少这一段落〕

(4) P/A：有根据的

(5) P：……抽象的论述。关于在……之间联系的理论表述……

(6) P：……无论如何不会提供……

第十四节 基础和上层建筑Ⅲ：

校正

(1) P：历史的

(2) 〔由柯尔施摘引的版本无法确定。被提到的讨论存在于索列尔著作之中，《……导言》，巴黎，1922年修订增补第2版，该书中有一篇日期为1919年10月的第三版出版预告。

第十五节 结论

(1) P/A: ……无产阶级理论新的唯物主义……

(2) P: ……经济学。就此而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还是“经济学的”唯物主义。

(3) P: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我们以前关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同现代“社会学”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下述表面上悖谬的、但对于马克思科学最后的和最成熟的形式来说实际上是中肯的论断来加以补充：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中的那种社会关系的整体，被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当作一般的社会科学的独立领域来对待；这个整体按其客观的和可以科学地确定的内容来看已经由历史与社会的经济学科学进行了研究和说明。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一批书目

1.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美]悉尼·胡克 著
徐崇温 译
2. 历史和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 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张西平 译
3. 交往与社会进化 [德]哈贝马斯 著
张博树 译
4.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美]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韦 冯瑞荃 译
5. 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 [南]尼科利奇 编
赵培杰 冯瑞梅 孙春晨 译
6. 论国家 [法]列菲弗尔 著
——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李青宜等 译
7. 单向度的人 [美]马尔库塞 著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张 峰 吕世平 译
8. 批判理论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著
李小兵等 译
9.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王南湜 荣新海译 张 峰校
10.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英]G.A. 科亨 著
——一个辩护 岳长龄 译
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著

第二批书目

12. 实践哲学 [意]葛兰西 著
徐崇温 译
13.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 [德] 马克思·霍克海默 著
特奥多·阿多尔诺 著
洪佩郁 蔺月峰 译
14. 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衣俊卿 译
15.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奥]威尔海姆·赖希 著
张 峰 译
16.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美]罗伯特·戈尔曼 编
赵培杰 李 菱 邓玉庄等 译
17.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欧力同 张 伟 著
1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李青宜 著
19. 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 徐崇温 著
20. 社会民主与未来 [德]维·勃兰特
[奥]布·克赖斯基 著
[瑞典]欧·帕尔梅
丁冬红 白 伟 译

第三批书目

21. 卢梭和马克思 [意]德拉-沃尔佩 著
赵培杰 译
22. 理性和革命——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美]马尔库塞 著
程志民等 译
23.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德]哈贝马斯 著

- 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 洪佩郁 蔺青 译
24.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德]哈贝马斯著
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洪佩郁 蔺青 译
25. 否定的辩证法 [德]阿道尔诺 著
张峰 译
26. 自然的控制 [加]威廉·莱斯 著
岳长龄 李建华 译
27. 历史和结构—— [德]施密特 著
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 张伟 译
28.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南]马尔科维奇
彼德洛维奇 编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29.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 [匈]卢卡奇 著
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德]本泽勒 编
白锡望 张西平 李秋零 等译
30.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 [匈]卢卡奇 著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德]本泽勒 编
白锡望 张西平 李秋零 等译
3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论 余文烈 著
32.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陈学明 著